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一 2023.07

小小鳥

黑暗森林 | 田野中国

关于小鸟合作社以及 6 月的三个见闻 | 小鸟问答

唰地一下，她的生活频道就切换到了缅甸 | 接力访问

伊塔洛·卡尔维诺 | 新书推荐





小 说

新书试读 | P11 在小人物跟前，观察，呼吸，存在 志贺直哉 /
P19 中国城 费涅
发现经典 | P25 “玩笑是人与世界的一道屏障” 米兰·昆德拉

非虚构

田野中国 | p29 一个执念于意义的自由主义者 | 三个人的政治光谱③ /
p35 郭星 | 黑暗森林① /
p41 “工业党人”和“公知” | 黑暗森林② /
p49 你现在的观点是怎样的？ | 黑暗森林③ 伊险峰
新书试读 | p55 了解那个讲故事的人，他叫卡尔维诺 让 - 保罗·曼加纳罗 /
p61 那一夜，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帕维尔·巴辛斯基 /
p73 “这世上没有外来者，只有不同版本的自己” 托妮·莫里森

专 栏

接力访问 | p83 051 赵晨曦：一个说“时尚属于老百姓”的时装设计师在想什么 /
p89 052 子津：一个关心工人的人如何思考自己该干什么 /
p93 053 黄卫平：“你不要把我写成一个浪子回头的人” /
p99 054 萧勇：一个网红店主的日常“战场” /
p107 055 苗苗：一个高速发展时代的进取青年在一切慢下来之后 /
p111 056 小饼干：“不仅仅要有审美，还得是个好人” /
p117 057 曲栋：现在聊完了，你能理解我的“乐观”吗？ 杨樱



题图为电影《你的鸟儿会唱歌》(2018)剧照

小鸟问答 Vol.31

小鸟 | 小鸟问答

七月。暴雨和热浪将交替而至

i

不景气

最近有不少作者表达自己的困境，找工作，还是写东西。这可能是就业不景气的一个很边缘的例证，另一方面可能说明写作与记录这件事的不景气。很多人在感慨看不到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这其中也包括前写作者们，大约认真写点东西着实是太吃力了，需要整个时代来做心理建设，所以宁可在微博和小红书带货，在酒局上感慨世风日下，去写标价几千块钱的定制软文，去给拍短视频的人打灯赚个一千块钱（一天，还不错欧！）。

ii

档案

曾经与一位大学历史系治当代史的老师探讨他的治学难题，越是身边的事越难以被记录下来，他的终极之问是：未来，我们是要靠什么来做史料？

这句话包含以下内容：

我们不能完全靠现在留下来的东西，尽管看起来互联网上留下了海量信息，但我们也知道这不是全貌，甚至它不是真实的；

我们还知道它随时被修改，包括你的记忆也不想被放过；

当某件事发生，所有事件相关人的大量信息被删除，以不曾存在的方式消失在互联网上。

历史教授的想法是能有多少民间记忆就留下多少，但以前有信件有日记甚至有报纸，现在有多少留大数字世界并被保存，我们其实是不知的。

想一想吧，你邮件收件箱和发件箱里的文字，你即时通讯软件里大段的对话或者独白，你的博客……有多少消失在互联网上。虽然你总是被告知“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实际上你倚赖的技术并没有任何保障。

我们很希望把更多的“互联网记忆”固化下来，还在想合适的呈现方式，也许是一个新栏目。

iii

小鸟合作社

关于“田野中国”的一些进展。之前招聘过研究助理，后来我们在和应聘者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事情，比如说：

1、学术论文是田野调查最大的输出端口，不过这个过程中，一个田野原本有的公共性会被削弱，这也是学术现状和它本身自带的一些属性决定的；

2、与此同时，学术论文不能消化田野过程中所有发现。最大的缺损是具体的人的生命故事，记录这些不少学术的目的，但并不代表它毫无价值；

3、如果一个田野作者希望进行一些有公共性的表达，ta 很有可能缺乏参照体系和学习路径；

4、在过去 20 年里，简体中文世界的原创田野作品屈指可数，大家提起的经典还是 2000 年代初的那几本；

5、随着媒体边缘化和碎片化，田野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社会记录的功能，并且在思考的纵深方面做得更好；

6、这种叫做非虚构写的文章确实有读者市场。

我们在这些讨论之后想了一些问题，决定建立一个叫做“小鸟合作社”的小群。它的功能是找到某种方式，让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被记录下来，让想作记录的人有动力去作记录，还有一点，是让愿意做这些事的人彼此之间有一个交流渠道。

从小鸟的立场来看，拿到好文章来发表，自然再好不过，不过时至今日，这可能更像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目的——理性一点看只能如此，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世界让人烦心的事太多了，大家总是把写一篇自己想写的文章的优先级排在最后。这真是悲剧——小鸟扮演的是一个接近于孵化器的角色。以我们的经验，提供一些公共写作的建议和服务。

我们更希望这个合作社，更接近于自我学习的小组织，如果有想写的选题，大家可以互相督促一下，也可以在彼此的课题里找到共鸣之处。我们还在摸索它如何行之有效地推进，目前已经开过第一次合作社工作坊，主题是“各种各样的女性”。

如果你也是一个记录者，可以联系 info@aves.art，记得说一说你写的具体是什么。

iv

6月的三个见闻

一个是一次内部纪录片放映会，主题是草根音乐人。这次观影会是久违的情感冲击。冲击一来自于这个纪录片的发起人，也是一个不允许被看见的音乐人，看到一个不允许被看见的人还在平和地做事，而且认为自己理应如此；冲击二来自数十位来自各种地方、各种家庭的素人音乐创作者，他们的人生困境和创作力，让人觉得被穿透。

一个是胡安焉，《我在中国做快递》的作者。他的文字准确而富有表现力，却不像修饰，与此同时，对自己所在的世界始终保持极为冷静的观察和自省。不仅这本书是这样，在为这本书回答各种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样。

每天发生的事情亿倍于此，一些恰好为胡安焉所捕捉记录，这是时代的荣幸时刻。

比如，要描述当代的北京通县，除了胡安焉，如果你还知道有别的成体系的文字，请一定要告诉我们。

第三是一个女生。小鸟去参加北京 abC 艺术书展，女生是一位陌生访客。走过摊位，翻看文章，我们照例介绍我们制作的“档案”内容，“这些是非虚构，描述过去三年的一篇随笔，一些人的田野笔记，这是一些人物故事”……她突然说起了过去的七个月。愤怒，呐喊，敲门声，恐吓，离间，黑色头套，转场，脚镣，五个月；被离职出城汇报，无所事事……

我们注意到她几乎不受控制的倾诉欲。她不是我们的读者，此前也不知道我们的存在，那一刻应该也没产生什么认知。一种无差别倾诉。也是觉得被穿透的一刻。

v

终身会员

我们计划把年费制修改为会员制。

588 元年费会员目前享受到的服务为“买一年送一年”，实际上是两年的阅读权限。

我们计划将它调整为终身服务。

会员可以享受到：

- 所有文章阅读权限；
- 小鸟图书馆权限；
- 下载每卷以及增刊 PDF 文件。
- 未来小鸟的其他活动

同时，保留 12 元解锁三篇收费文章的选项。

请注意，小鸟文学 App 和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里的文章并不完全同步，尤其是绝大部分付费文章。

vi

本卷封面小鸟

斑文鸟，它还有个名字，叫“鱼鳞沉香算命鸟”。

vii

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阿拉特采访的时候，说：“我和巴尔加斯·略萨的看法一样：作家永不妥协，不管他身在何处。他的作品就是自不断抗争的状态中诞生的。这与不同社会秩序孰优孰劣无关。当完美的秩序到来时，作家依然不会满足于现状：人世间的事总会有改进的余地，作家也就总会有理由创作新的作品。”

马尔克斯还有一个观点，即他的作品并不属于魔幻现实主义（这确实是后期发展出来的一个名词，起码在《百年孤独》热销之初还没有出现），而是现实主义。他只不过把拉美的现实写了下来，这些现实很多人看来十分魔幻（比如国家发生了瘟疫，而独裁者的对策是让人用红布把所有的路灯包起来），然而它确确实实发生了，不是在小说里，而是在现实中。

viii

联系我们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Al Soot on Unsplash](#)

小说

在小人物跟前， 观察，呼吸，存在

志贺直哉 | 新书试读

日本“小说之神”志贺直哉代表作

《朝颜》是日本“小说之神”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 21 篇，由翻译家楼适夷译成。首次以《牵牛花》为题出版于 1981 年，此次为时隔 40 余年后再度出版。《朝颜》既收录了作者以第一视角对日常碰触的人、事、物加以幽微白描的私小说，也囊括了一些情节跌宕、情绪克制的历史小说与戏剧等。志贺直哉是一位稀产的大家，夏目漱石曾评价他道：“不是有自信的作品就不发表。”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的两篇，分享给读者。



仙吉是神田一家磅秤铺里的学徒。

有一次，当淡淡的秋阳，从褪色的蓝布檐帘下，静静照进铺前的时候，铺子里一个顾客也没有。掌柜的坐在账台边懒洋洋地抽着烟卷，对正坐在火钵边看报纸的小掌柜说：

“喂，阿幸，是你喜欢的鮓鱼上市的时候了。”

“是啊。”

“今晚上收了铺子一起出去吧。”

“好吧。”

“在外豪上电车，只消十五分钟就行啦。”

“是呀。”

“只有那一家的好吃，这附近一带，可没有好的。”

“对啦。”

学徒仙吉，正在小掌柜后面，保持适当距离的位置，两手插在衣衩里，很恭敬地坐着；他听了他们的谈话，心里在想：“啊，他们在谈鮓鱼饭店了。”京桥有一家叫作 S 的同业，仙吉时常被差到那边去，那家鮓鱼饭店的地址他是知道的，他只想自己早点升为伙计，便可以谈谈这种内行话，自由自在地去当那种点心铺的顾主。

“听说与兵卫家的儿子，在松屋百货公司附近新开了一家，阿幸，你知道么？”

“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松屋百货公司？”

“我也不大了解，大概是今川桥的松屋吧。”

“啊，那家也很不错么？”

“大家都这么说。”

“招牌也叫与兵卫么？”

“不，不知叫什么，叫什么屋，听过忘记了。”

“有名的点心铺竟这么多。”仙吉听着想了。“说是滋味好，究竟怎样好法呢？”这样想着，偷偷地咽了咽口水。

二

几天后的傍晚。仙吉被差到京桥的 S 铺去，出门的时候，掌柜给了他来回的电车钱。

从外濠搭电车到锻冶桥下，他特意绕过鮓鱼饭店的门口，望望那铺子门口的布帘，想象掌柜他们很神气地撩开布帘走进去的模样。

这时候他肚子有点饿，油腻腻黄沉沉的鮓鱼饭团映到想象的眼中。他想：“能够吃它一个也好。”一向他拿了来回的电车钱，只坐单道；回去的时候就步行，这一次也还剩四个铜子装在衣袋里锵锵地响。

“有四个铜子，可以吃一个，但不能说只要一个。”他这样盘算着，断了念头，从店门前走开。

在 S 铺办完了事，他拿了一只装着几个小铜砝码的重沉沉的纸板箱，走出了那家铺子。

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吸引，他又走回到来的那条路上，自然而然地想绕到刚才看到的那家鮓鱼饭店去，不料却在十字路对角的那条横街上，忽然发现一个挂着同样招牌名的布帘的卖鮓鱼饭的摊子，他就呆木木地向那边走去。

三

年轻的贵族院议员 A，时常在同僚 B 议员那儿，听说吃鮓鱼饭团，只有在摊子上用手捏的才有趣味；他就想几时有机会到摊子上去站着吃，便问明了那所最好的摊子。

有一天，天色快黑的时候，A 从银座走过京桥，就顺便到那家卖鮓鱼饭团的摊子边看看。那儿已经站着三个食客，他稍微踌躇了一下，就把脑袋钻进布帘里去，为着不想挤进站着的人列中去，他就站在布帘底下后一点的地方。

不料旁边来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学徒，学徒擦过他身边，挤到他面前的空位里，两眼忙碌地向排列着五六個鮓鱼饭团的木盘子上望。

“没有紫菜卷的么？”

“啊，今天没做。”肥胖的摊主人，一边捏着饭团，一边愣着眼向学徒直望。

学徒打定了主意，做出老内的神气，伸手抓了排在一起的三个鮓鱼饭团中的一个，可是当他把手缩回的时候，却不像刚才伸出来时那么神气，不知怎的忽然有点迟疑。

“一个得六个铜子啦。”摊主人说了。

学徒突然沉默了，又把那饭团放回木盘上了。

“手里拿过又放下，真讨厌。”主人说着，把拿过的鲟鱼饭团放近自己的手边。

学徒没有吭声，脸色愣愣地，不知怎样才好。可是一会儿又鼓起勇气，掉过头向帘外走去了。

“现在醋鱼饭也涨价啦，当学徒的人可不容易吃呢。”摊主有点不高兴，这样说着，把一个饭团捏好，就把学徒拿过的一个，丢进自己的嘴里，吃了起来。

四

“你说的那个摊子，我去吃过了。”

“怎样？”

引用可是当他把手缩回的时候，却不像刚才伸出来时那么神气，不知怎的忽然有点迟疑。

“很不错。我还看见大家都把手指装成这模样，把鱼肉放在下面，一下子放进嘴里，这样才是内行的吃法么？”

“啊，鲟鱼饭团都是这么吃的。”

“为什么把鱼肉放在下面？”

“如果鱼不新鲜，舌头挨到就马上明白了。”

“这样说，你的内行也不可靠啦。”A笑了。

于是，A就谈起那个学徒来。

“真有点可怜，我真想请他吃一顿。”

“那么你就请他得啦，让他吃个痛快，一定很高兴呢。”

“他自然高兴，可是我却得冷汗浃背啦。”

“怕人注目，没有勇气么？”

“不管是不是勇气的问题，不过做不出来。马上带他到别的地方去吃一顿，也许还做得到。”

“人就是这样的。”B同意了。

五

在幼稚园念书的儿子，眼看着一天天地长大起来，想从数字上知道他成长的程度，A打算在浴室里预备一只称体重的小磅秤。有一天，他偶然走到神田的仙吉的铺子里。

仙吉没注意A，A却是认识仙吉的。

通到铺子横头深处去的三合土地上，顺次放着七八架从大到小的磅秤。A拣了其中最小的一架，模样跟车站和运货店里的大磅秤一样，不过小得可爱。他想女人和孩子见了，一定会欢喜。

掌柜拿了一本老式账簿说：“送到什么地方？”

“啊……”A想了一下向仙吉望望，“这位学徒有工夫没有？”

“哦，空着的……”

“因为有急用，就跟我一起去好么？”

“可以，可以，那就装上手车送吧。”

A因为那天没有请这学徒，今天存心要请他一顿。

“那就请你在这儿留下台甫和府上的地址。”付了钱以后，掌柜又拿了另一本簿子要他写。

他愣了一愣，原来他不知道，照规矩，凡是买磅秤的，都要把姓名住址跟磅秤号码一同登记。请这学徒吃一顿，让他知道自己的姓名下落，同样有点不好受，没有办法，想了一想，只得写了一个假的姓名和地址。

六

A在前边缓吞吞地走，仙吉拉着装磅秤的小手车跟在后面，相隔五六丈。

到了一家人力车行前，A叫仙吉等在外边，自己进去交涉，一会儿磅秤就搬到雇好的人力车上。

“好，你先拉去，车钱到那边拿，我在条子上写明了。”这样说着A从门口出来，笑着对仙吉说，“你辛苦了，跟我来，请你吃点点心吧。”

仙吉听着这口吻很亲切，也有点难受。总之，他是欢喜了，恭恭敬敬地点了几下头。

面铺子走过了，鱼饭铺子走过了，鸡铺子也走过了。带我上哪儿去啊！仙吉有点忐忑不安了。走过神田车站的高架电车的旱桥，到松屋百货店的横头，越过电车道，那客人在横街的一家小醋鱼饭店门口站住。

“你等一等。”客人说着先走了进去，仙吉放下了手车的把手，站着等。

一会儿，客人出来，后边跟出一个年轻的气派很好的女老板说：“请进来。”

“我先走了，你多吃点吧。”这么说，客人像逃走一般很快地向电车道走去。

仙吉在这铺子里吃了三客醋鱼饭，恰如饿狗上灶，一会儿工夫，吃了个精光，没有别的客人，女老板故意用屏风遮住了。仙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肚子装了个挺饱。

女老板倒了茶来，笑着说：“再吃一客吧。”被这么一说，仙吉有点儿脸红了。

“不，够了。”他把头低下了，站起来准备走。

“下次再来吃吧。付下的钱还多着呢。”

仙吉沉默着。

“你同那先生以前认识么？”

“不。”

“啊……”女老板这么说着，就对走过来的老板打了个照面。

“这人倒有趣，那么，下次你要不来吃，我们就没法办啦。”

仙吉把木屐穿上，只是胡乱点头。

七

A别了学徒，心里恰如被人赶着似的，走到了电车道。叫了一辆恰从身边驰过的空汽车，立刻向B家开去。

他心中觉得很黯然，自从那天见了这学徒，从心里发生了同情，存心找机会使他满足一下，而终于在偶然中实现了这个心愿。学徒是满足了，自己总该也满足吧，使人家喜欢不能算坏事，自己当然应该感到欢喜的。可是为什么，心里却奇怪地觉得黯然，不好受。这是什么缘故，从何而来的呢？好似背着人偷偷地做了坏事一样。

也许他是菩萨，要不然就是神仙，说不定还是稻荷菩萨哩

他想：难道是自己觉得自己做了好事，这种特别的意识，却受了本心的批评和嘲谑，所以感到了那种黯然的感觉的么？如果把这件事稍稍看得轻松点儿，也许不算一回事，而自己却在无意地执拗着。可是总而言之，到底并不是干了丢人的事，至少总不该留着不快的感觉吧。

因为预先有过约会，B在家里等着他。到了晚上，乘了B家的汽车，到Y夫人的音乐会上去。

A很晚才回来，自从见了B和听了Y夫人动人的独唱，他那黯然的心境，几乎已完全治好了。

“那架磅秤真爱美人。”果然妻子很喜欢那小磅秤，孩子已经睡了，妻又说了孩子见了是怎样高兴。

“还有，那天在醋鱼饭摊子上见到的学徒，又遇到了呀。”

“喔唷，在哪儿？”

“就是那家磅秤店里的学徒。”

“多巧呀。”

接着A就讲起了怎样请学徒吃鲟鱼，怎样地又觉得心里有些黯然的感觉。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这倒怪了。”贤惠的妻子很担心地皱皱眉头，她好似沉思了一下，“啊，我明白了！”忽然说了：“那样的事是有的，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我也有过这种心境的。”

“啊。”

“真有这样的事，B君他怎么说？”

“碰到学徒的事，我没有对B说起。”

“可是那学徒一定很快活的，在无意中大吃一顿，谁都会觉得快活的，就是我也很想吃，这醋鱼饭能打一个电话去叫来么？”

八

仙吉拉着空车回到铺子里，他的肚子胀得厉害，肚子挺饱的时候从前也常常有，可是吃

这么美味的东西吃得这么饱，却是没有过的。

他忽然想起几天前在京桥摊子上倒霉的事来。一想起这件事，就想到今天这一顿美味，好像同那次有着连带关系。他想，也许那客人那天恰巧见到了我。可是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地方呢？这可怪了！而且他今天带我去的那一家，恰巧就是前几天掌柜们说的那家。这客人难道连掌柜的闲谈都听到了么？

仙吉越想越糊涂了。他绝不会想到 A 跟 B 他们，也同掌柜他们一样，谈起那些有名的醋鱼饭店的。他想，那次他们的闲谈，一定这位客人也知道，所以他今天特地带我到那儿去。要不然，为什么在这以前，走过好几家同样的铺子，他却头也没转一转地走过去了。

越想他越觉得那客人绝不是一个凡人。知道自己在摊子上倒的霉，又知道掌柜们的闲谈，而且看透了自己的心，肯这么请自己大吃一顿，……这毕竟不是凡人能做的事。也许是菩萨，要不然就是神仙，说不定还是稻荷菩萨哩，他想。

他之所以想到稻荷菩萨，因为他有一位伯母，信稻荷菩萨信得发疯。稻荷菩萨一附到她身上，她就浑身发抖，口吐预言，说出在远处所发生的事来。他曾经有一次见到过。说那客人是稻荷菩萨，却似乎太漂亮了一点。但是总之，越想越觉得这不是一回平凡的遭逢。

九

A 的那种黯然的感情，过了几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他总觉得再没有勇气走过神田的那家磅秤铺门口，而且那家醋鱼饭店，也不想再去了。

“这反而好呢，叫到家里来，大家都能吃了。”妻笑了。

可是 A 没有笑，他说：“像我这样窄心眼儿的人，连这点小事也做不成啦。”

十

仙吉越想越忘不了“那位客人”，他是人还是神，现在已不当作问题了。他只是衷心地铭感不忘。

他虽然受了那家店主夫妇再三的叮咛，却总不想再到那儿去吃醋鱼饭了，他不敢再去了。他害怕吃惯了以后没办法。

当他悲哀，当他苦恼的时候，他总是想着“那个客人”。只有想起他时，心中就感到安慰。他相信，总有一天“那客人”会带了意外的恩惠到自己面前来的。

作者写到这儿就搁笔了。原想再写那学徒为着要知道“那客人”的真相，从掌柜那儿问了登记的姓名地址，特地跑去一看，这地方并没有住家，只有一个小小的稻荷庙。把学徒骇呆了。——可是这么一写，对这学徒未免太残酷了一点，因此作者就在上边搁笔了。

1919 年 12 月

清兵卫与葫芦

这是一个叫清兵卫的孩子跟葫芦的故事。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清兵卫和葫芦就断了关系。过了不久，他又有了代替葫芦的东西。那便是绘画，正如他过去热衷于葫芦一样，现在他正热衷着绘画。……

清兵卫常常买了葫芦来玩，他爸妈是知道的。从三四分钱到一毛五分钱一个的带皮葫芦，他大概已有十来个了。他能够自己把葫芦口切开，把里边的籽掏出来，技巧很好，塞子也是自己装上的。先用茶汁一泡，把气味泡干净了，然后就把父亲喝剩的淡酒装在里面，不停地把表皮擦亮。

他对于这爱好异常专心。有一天，他在海边的街上走，心里依然在想着葫芦，忽然眼前看见一件东西，使他吓了一跳。原来路边背海一带都是摊户，这时候忽然从一个摊户伸出来一个老头子的秃脑袋，清兵卫把它错看作葫芦了。“这葫芦真好！”心里这么想着，有好一会儿没有看清楚——再仔细一看，连自己也吃惊了。那老头子昂着光彩奕奕的秃脑袋，走进巷子里去了。清兵卫觉得好笑，就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不住地笑着，一边跑过了半条街，还是忍不住地笑。

因为他热衷得这么厉害，所以他每次上街的时候，走过古董店、水果铺、旧货店、糖食店，以及专门卖葫芦的铺子或仅仅门口挂着葫芦的店铺，总是呆呆地站在门前望。

清兵卫是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学生，每天学校里放学回来，他也不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常

常一个人上街去看葫芦。一到晚上，就坐在起居室里收拾葫芦；收拾好了，就装上酒，用手巾包好，放在罐子里，又把罐子藏在火炉箱中，然后去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立刻又打开罐子看，葫芦皮上冒出了许多水珠。他永远不倦地看着，看过之后，很郑重地系好缰绳，挂在朝阳的檐廊下，然后上学校去。

清兵卫居住的小镇，是个商业码头，虽然算个市镇，其实是很狭小的，一条细长的市街，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完了。所以卖葫芦的店铺纵使怎样多，像清兵卫这样几乎每天都跑去看，大概所有的葫芦，也都已被他一一看过了。

他对于旧的葫芦，没有多大的兴趣，他所喜欢的是还没有开过口的带皮葫芦。而且他所有的大抵都是葫芦形很周正的平凡的东西。

“真是小孩子呢，不是这种葫芦他就不喜欢。”来看望做木匠的他爸爸的客人，看见清兵卫在一旁很专心地擦葫芦，就这样说。

“是呀，一个小孩，却喜欢这种玩意儿……”他爸爸很不高兴地向那边望了一望。

“阿清，这些并不见什么好，再去买几个奇特点的来呀。”客人说。

“这样的好呀。”清兵卫只是这样回答了一句。

清兵卫的父亲与客人就谈到了葫芦。

“今年春天开评品会时，有人拿出了马琴的葫芦来作参考品，那才是出色的呢。”清兵卫的父亲说了。

“是一个很大的葫芦吧。”

“又大又长。”

听见这样的话，清兵卫偷偷地发笑。他们所说的马琴的葫芦是那时候一件很有名的东西，他也去看了一看——他不知道马琴是什么人——立刻觉得并不见得怎样好，就掉头走了。

“那种葫芦我可不喜欢，不过大一点就是了。”他插嘴说。

听了这话，父亲就圆睁着眼呵斥：“什么话，你懂得什么，也来多嘴！”

清兵卫沉默了。

他永远不倦地看着，看过之后，很郑重地系好缰绳，挂在朝阳的檐廊下，然后上学校去。

有一天，清兵卫走后街，在平时不大注意的地方，一家闭了门的住房前，有一个老婆婆摆着一个卖柿子橘子的摊子。他发现摊子后边的店板门上挂着二十来个葫芦，就立刻说“让我看一看。”说着走近去一个一个地仔细把玩。其中有一个，约五寸高，看那模样是很普通的，他却喜欢得什么似的。

他心头发着跳，问了：“这个葫芦卖多少钱？”

“看你是个小哥儿，就便宜点算一毛钱吧。”老婆婆回答了。他喘着气：“好，你别卖给别人，我回家去马上拿钱来。”急匆匆地说定，就跑回家去。

不多一会儿，他红着脸，呼呼地喘着气跑回来，买了葫芦就跑着回去了。

从此，他片刻也不离这个葫芦，还带到学校里去。终于因为在上课的时候也偷偷地藏在桌子底下摩擦，给级任教员看见了。恰巧上的是修身课，所以教员更加生气。

这位外来的教员，对于本地人爱好葫芦的风气心里本来就不舒服，他是喜欢武士道的，每次名伶云右卫门来的时候，平时连走过都不大高兴的新地的戏院子，演四天戏，倒要去听三天。学生在操场里唱戏，他也不会怎么生气，可是对于清兵卫的葫芦，却气得连声音都抖起来，甚至说：“这种小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于是这个一心热衷的葫芦，终于被当场没收。清兵卫连哭也没有哭一声。

他脸无人色地回到家里，靠在火炉边发呆。

这时候，教员夹着一只书包来访问他的父亲，父亲恰巧不在家。

“这种事情，家里应该干涉他……”教员对清兵卫的母亲这样说，母亲吓得只是战战兢兢地不敢出声。

清兵卫对于这位教员的顽固，恨得什么似的，哆嗦着嘴唇，在屋角里缩作一团。在教员身后边的柱子上正挂着许多收拾好了的葫芦。清兵卫心头别扭地跳着，怕他会注意到。

训斥了一顿之后，教员终于没有注意到葫芦，回去了，清兵卫透了一口大气。清兵卫的母亲却哭了起来，唠唠叨叨发了许多没意味的怨言。

不多一会儿，清兵卫的父亲做工回来了，听了这话，立刻抓住正在身边的清兵卫，使劲揍了一顿。在这儿，清兵卫又被骂了“没出息的孩子”。还说：“像你这种家伙，赶快给我滚蛋吧。”

清兵卫的父亲忽然注意到柱子上的葫芦，就拿起锤子来一个一个地砸碎；清兵卫只是脸色发青，不敢作声。

教员把在清兵卫那儿没收的那个葫芦，当作脏东西似的交给老年的校役，叫他去扔了。

校役拿了来挂在自己那间煤污的小屋子的柱子上。

约莫过了两个月，校役恰巧因为没有钱花，想起这葫芦，准备多少换几个钱，就拿到附近的古董店里去看。

古董店老板横捧竖捧地仔细瞧了半天，马上摆出一副冷淡的神气，把葫芦向校役一推：“要卖就算五块钱吧。”

校役暗暗吃了一惊，可是他是乖觉的，连忙板起脸回答了：“五块钱可不卖。”古董店马上加到了十块，可是校役还不肯答应。

结果是五十块钱成了交——校役从那位教员手中好像平白地得了四个月的薪水，心里偷偷地高兴。他当然不曾告诉教员，对清兵卫也隐瞒到底。因此这个葫芦的去处，终究没有人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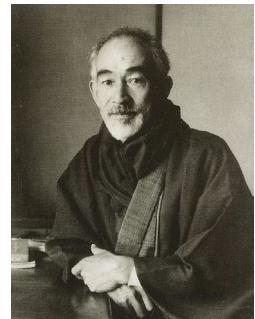
可是凭校役怎样聪明，也不会想到古董店把这个葫芦卖给当地的富家，价钱是六百块。

……清兵卫现在正热衷于绘画，自从有了新的寄托，他早已不怨恨教员以及用锤子打破了他十多只葫芦的父亲了。

可是他的父亲，对于他喜欢绘画，又在开始嘀咕了。

1912年12月

志贺直哉



日本小说家，“白桦派”代表作家，被誉为“日本小说之神”。志贺直哉 1917 年发表的著名中篇小说《和解》，写他与父亲发生冲突而终于得到和解的经历。作者从此进入创作旺盛时期，其代表作包括《在城崎》《佐佐木的场合》《好人物夫妇》等名著，以及历史小说《赤西蛎太》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Craig Whitehead](#) on Unsplash

我住过两回中国城。第一回，五洲超市尚未歇业，有个潮州打工妹每次都与我搭话。讲她一位朋友叫小梅，专门上门理发，其他不规矩的事情不做，单纯理发，五欧一次。潮州打工妹现在 KOK 做工。KOK 是中国城唯一一家卖牛肉粉的，汤头不甜，无论谁坐下来，先送盘煨得极烂的牛腩，这也是企鹅 273 最常去的 pho 店。潮州打工妹仍然爱搭话：今天喝什么？三色冰？清补凉？咖啡奶冰？KOK 吧台做饮品大体胡混，虽说 pho 一定要配三色，我们还是只要瓶自来水。玻璃瓶口积了水垢，不干不净的，水杯也是用一块脏兮兮的毛巾擦干的。KOK 就这样，污秽的红色桌布，堆在吧台上一叠叠盘子里摆着豆芽薄荷叶金不换泰国芫荽，水滴滴答答流到地上；放了大半天表面已风干的腌洋葱、柠檬、小米辣、蘸酱，随意取用，可能是北越的作风。我找小梅理过发，小广告贴在五洲超市门口，与陪同看病、办居留卡、黄色按摩、走私香烟之类的挤在一起，确实规规矩矩。名叫小梅，然而已是个中年的妇人，进了门，先由小推车里取出一叠旧报纸铺开，指示我站在中间低下脑袋，又变出只喷壶朝头发上喷了喷，十分钟剪出个狗啃似的发型。几年后，我听说小梅练熟了刀法，给人开起双眼皮了，都是人家上门找她做，也在中国城。她还兼职外卖热菜，一番结合，开双眼皮送地三鲜。中国城这种地方，住过一回的便不想再住，尤其对于在伊夫里 (Ivry) 和舒瓦西 (Choisy) 那两处高楼里生活过的人：一个公寓分隔成六个隔间，公用浴室洗手间洗衣机，垃圾通道屡屡爬出蟑螂，隔壁室友总在换，甚至有一间是四个铺位的临时旅馆，洗盘子的斯里兰卡人、西藏人、泰国僧侣、南国背包客来来去去，一晚十欧。我在中国城街上真正认得些人，已是第二回居住时，伊夫里高楼之间的公园空地上开了赌场，赌泰国骰子，花花绿绿一张纸，押点数。小梅居然也赌。潮州打工妹在脏兮兮的草地上席地而坐，和庄家的家眷们唱南国歌谣，吃腌螃蟹木瓜沙拉，喝狮牌啤酒，看到我，热情搭起话来，讲泰国流行歌曲很好听，录音机里正在播的是国民歌星滑病 (Ilslick)，堪比周杰伦。我打开 YouTube，果然每一首的播放量都好几千万。这是二〇一六年的夏天，赌摊上的每个面孔都对我微笑着，像认识我很久了，只有小梅记不得她曾帮我理发，专心于三颗骰子每一次的跳动。他们就是用那种放腌洋葱的小碗倒扣在放豆芽薄荷叶金不换的盘子上摇着骰子，塑料碗盘克啷啷地直响，上头印着五福捧寿花纹。一开，小梅押着四六点的五欧元就被收走了。她又押一次三六点，仍是不中，便抬起头来，略有些尴尬地看向四周，好似围观者中有人要嘲笑她连续输了两次小钱。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滑过去，并未停留，也对，我现在都找越南阿姨理发啦，而且，我一直是极单的单眼皮。

我都是在早晨十点去找越南阿姨理发。那个钟点理发店地上的淡绿色方砖格外清爽，洗发池里也没有上一个顾客留下的碎发。仅越南阿姨一人在，她涂了涂指甲油，坐在高高理发凳上，脚踩着方砖，配合着九十年代金曲，缓慢地转来转去。十点开始播放的是黄乙玲的《忧愁》，之后一首赛一首苦闷，不提也罢。其实我也只是一个月去一次，偶尔我会问，阿姐，能不能换个歌单。越南阿姨说，别唤阿姐，叫我阿曼。她帮我理发时也会照镜子，叹道，每回照一下便一吓，我好老。我又问，阿曼，你在托比亚克 (Tolbiac) 做了多久事？她带我去洗头池，放水，挤了一手心经久不换的杏仁味洗发膏，长长的指甲避开，用指腹揉起我的头发。我知道有人就是爱洗头，头发越长越喜欢在理发店里洗头，约会到早了，便要洗个头吹个头发打发时间。但只要别人用手在我头顶心招呼，我便会脚底发痒，浑身不自在。阿曼还问，水热不热，冷不冷？我遂回她，没事，快点洗完就好了。烧燃气热水出得慢，一股半冷不温的水浇上来，人就清醒。我盯着天花板，总想问阿曼一些十三区传说，比如亮哥亮哥的事。似乎我也问了，她也答了，每次零零碎碎，阿曼的中文我有点不懂，她讲广东话、潮州话、客家话、越南话、法国话和一点点普通话。大体开头是这样的：亮哥亮哥，厉害吼，砰砰砰。我也配合她，学了点黄乙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代志啦。往往还没听完，头就理完了。阿曼告诉我，她做了三十年工。有空我们去小锌咖啡馆喝一杯，吃一块清心糕，慢慢说。我要一张纸巾，擦擦耳朵里的头发，站起来掸掸衣领，讲，好哦。阿曼又夸我是个干净学生，怎想会赌博？清心糕是广南泰饼家做的，广南泰，Banh Tan Tan，让人很有些费解，我学过一些南洋拼音，知道“陈”拼做“Tan”，故而陈氏兄弟超市写成“Tang frères”。Banh Tan Tan 是怎么回事呢？不过，我熟小锌咖啡馆，它就夹在法国巨人超市 (Géant) 和巴黎冻品店之间，斜对面是潮州城大酒店挂满烧鸭的玻璃橱窗。开始赌博后，我老看到赌摊上的几个熟脸在那儿喝咖啡，其中有一个白发胡子飘飘的白天赌马，晚上赌骰子。他们瞧见我，也略点头。——总之，我与阿曼从来没有约过，也不晓得怎么约。等我现在又想起十三区诸事，再去理发店找她，别的理发师告诉我，她已休工不做了。好吧，既然来了，还是理个发吧，洗发膏味道没变，杏仁的，只是音响里换成了法国电台“老歌大联播” (Nostalgie)。



十三区的气氛一日多变。十点二刻理发毕，广南泰头批糕点出炉，火腿面包、蛋挞、清心糕、杏仁饼；烧腊店挂出鹤鹑烧肉烧鸭；一百多家餐厅齐炸红葱酥。由小陈氏超级市场门口的电扶梯可上至潮州会馆（须注意入口处的下水沟，脏水漫溢，不小心就溅一腿）。会馆连着混合小庙，前厅上供奉黄大仙，进了里殿，则为释迦牟尼与十八罗汉了。大香炉中散漫地插了几炷香，应是买菜妇人与赌马的已先行拜拜。我脱了鞋，跪蒲团，磕了头，捐五欧元，祈愿早日拿到长居。所谓长居，就是一张一年更新一次的学生居留卡，我加入无纸人（sans-papiers）行列已有大半年，连学校也很少去，只时不时到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装模作样找东找西。里殿放了些折叠椅，信众们周三周五晚上要念的经就搁在椅垫上。地上也铺了地毯，每天居士出来用大吸尘器将人落下的各色灰尘同香灰香烛味一道吸走。这会儿香炉中又开始冒出今日的檀香味。释迦牟尼旁边不知谁摆了个长生娃娃，脸上也贴了金箔，与佛一大一小地闪着光，一刻晦暗一刻亮。没旁人，只有最头顶的椅子坐着黑大哥，可能累得狠了，光着的脑袋顶着墙这么睡着，一个大块头，以头为支点，双脚踏地，卡在折叠椅里，保持着奇怪的平衡。很快到十一点，餐厅便纷纷开门，他要去后厨上工洗碗盘，放李锦记海鲜酱和是拉差辣酱的小碟最麻烦。不过，对面香香餐厅的才哥不会刁难人，洗快洗慢没那么紧要。才哥是个胖胖的财主样子，三个儿子分管吧台、收账、上菜，他乐得轻松，前两个月刚在小公园草地上办过六十岁生日会，铺一张大草席，找了乐团吹小号萨克斯，开了几十瓶红酒，在场大家无论赌徒还是在路边摊就餐的，都跑来喝一杯。小公园空前热闹，傍晚时分，日落高楼，有一片玻璃窗反射红彤彤的日光，反而照得枯草地、垃圾堆、破床垫和污水等历历分明。几个塑料袋在高楼风中好似永不会坠下，飘飘荡荡，随着音乐起伏。就连仓库后门处的道友也从光照不进的地界中挪动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上前，讨要一欧元硬币。几个白人又喝酒又打针，才哥不想过问，给每人倒一塑料杯勃艮第打发了去。老婆姨来得比较慢，由于在腿上打针，两条腿都坏了，两块草皮走了十多分钟。她还担心家当被人夺了去，拖着小车来了，小车上捆着数个大购物袋的杂物。才哥给她一张红色十欧元票子，讲，马头将军吃 K 仔好好的，打针人便坏掉。老婆姨回，是唔。拿上钱，并不喝酒，更不吃东西，着急去买今日的药了。才哥望望她，来不及叹气，又有熟人来敬。我也敬了一杯。边喝边用几个硬币单押一个点数，赢了十几欧，所以闲下心来，买单香茅烤鸡肉，听了会儿生日歌。

有空我们去小锌咖啡喝一杯，吃一块清心糕，慢慢说。

阿辉迎我，让我坐在外卖打包位，才哥要稍后到，目前不知在伊夫里还是舒瓦西或是马塞纳（Masséna）上溜达。我说，阿文，先来壶茶。阿辉和我说，我是阿辉啊，带客人的。为了区分，他留了两撇小胡子，可我忘。才哥亦觉得儿子多得有点乱，一眼冒出一个仔，往往并不理他们，专门溜溜地转着与客人讲话。自从认得才哥，我便不再去隔壁清心小馆吃饭，不然他要走出来，转到清心的桌台边与我说，好吗？他知我是无纸人，便问我被警察抓住怎么办。我说，我又不做工，警察才懒得查。他更担忧，不开工怎么办呢？我手一摊。他遂指示我去潮州会馆香炉旁拿白条。白条是张警察局放的白纸，专门给无纸人的临时做工许可。潮州兄弟会在局子里有人，其实十三区市长也是讲潮州话的华人啦，月头拿十五张白条来，先到先得。每日早晨五点招工的也来，我望过一次，陈氏门口扶手梯入口锁了，得从托比亚克大街上爬上高楼之间的天台。天仍是黑的，密密麻麻的窗户仅有数个点亮，空气飘来隔壁 94 号工厂两只大烟囱的灰味，果然，抬头看，烟囱已吐出两条灰白龙，堆入黎明的厚云中。喷气式飞机飞过，划了一条更直更长的线，不一会儿天亮，这条线也变亮，又变透明，一天中少有的振奋时刻。已聚着几十个等工的人，大部分穿着灰色工装，裤腿上沾着白色泥灰——工地上招人最多。其余是临时洗碗工，多半是斯里兰卡人在做，如果手快亦可以一试；极少文书类，这一次正巧发到：中华圣母堂本周寻代课书法老师。我没有拿白条，遇到检查可能会被遣返，做力气活儿的已散了，剩数人立着，与我一般踟蹰。一个臃肿的影子过来，我在黎明些微的光中看到她的侧脸，认出她了。有段时间，在 KOK 食 pho，她常来桌边拉一段小提琴，不知是哪一支曲子，偶尔有人给一两个硬币。她不开口说话，我以为是聋哑艺人，但某天她抬手拿琴弓，碰翻斯里兰卡人兜售茉莉花的铜盘子，两个人吵起来，一齐被潮汕妹赶出了店子，她又回头骂了句极为恶毒的脏话。店外下着小雪，正是过年时分，马路两边挂上了中国城才会有红灯笼，咏春团由文华酒家出发走上舒瓦西大街排演舞狮子，器乐闹闹，我本想追过去给她一个两欧硬币，那脏话实在让人震惊，我一愣神，她已随着狮子混入人群。眼下初夏，她仍穿着几年前的灰色大衣，头发很久未

洗，眼神定定讲，我会书法。招工目光由我身上扫过去，问，有没有其他人做？我赶紧望向远处去，喷气飞机的轨迹已涣散，掺到其他的云里了。

小公园赌场，其实是一个个桌。天暗折叠桌撑开，每一个放一只装电池的白灯，铺上赌纸，一人摇骰子，一人算赌账。由外面马路往里看去，似白水母漂浮，本该透明的白水母又伸出一些黑色的触手，是围住桌的赌客。又似高楼间的亮蘑菇，吸引一群大蚂蚁，包裹住它吮吸汁液。大蘑菇发射菌丝，笼罩巨人超市红蓝霓虹与日式烧肉绿色自助餐广告牌的射线，大家忽而在海底，忽而在林中，赌到晕头。突然地，白水母亮蘑菇花花赌纸骰子声硬币响人的喊叫瞬时消失，众人立于昏暗，头顶数千户密密灯光如星星复又显现，是警察来了。警察摸黑在小公园中巡察，一个个桌早已折叠藏在草中，遂装样喝问，你等这许多人在做咩事？赌摊老板答，晚餐后散步啦。赌客答，练咏春啦。警察拿警棍拨弄一下白灯与五福捧寿塑料碗盘，再喝问，这是何物？赌摊老板答，晚餐后散步又聚餐啦。十分钟后，警车开走。闪出放哨小童，要二十欧报酬。二十欧去舒瓦西路桥下的废弃铁轨处可买两副偷来的雷朋墨镜。怕警察杀回头，大家仍要站立片刻，却已没那么紧张，相互聊起天来。一个穿黑皮夹克的用手肘捣我，喂，我见过你。我正欲辨认，白灯亮，骰子声一响，“开”，他便再也无心交谈，拿刚刚还没来得及押的十欧，摆在十一点（也就是三个骰子点数加起来为十一，一赔十一），只十秒，钱便被收走了。

他随即掏一张五十欧，仍押十一点，又输。我和他讲，十一点概率太低，四五十开之后才会碰一两次，但凡庄家手一偏就归零。现有十次没有出现两点，不如单押两点，胜算大。他没回头，只答，太慢，我凭预感。我预感这把就中，遂摸摸夹克内袋，再掏出一张五十欧。我问，今日工钱？他不置可否，唯眼睛紧紧盯着“开”的手。我们看庄家的手便知羸面——这双手凶险，右手断了中指，按住碗时，使人错以为中指透入其中，抚摸着正跳跃的三粒骰子，如此轻轻弹拨一下，我们大大小小的硬币钞票便被收去了。可赌徒不爱挪步，怕跑了运气，选一摊便站定着赌。也有像我这样凭概率的，换摊得从头再赌十多把。其实，再凶险也不过一双手，它既然老练，必然稳定，即使摇动间有细微调整，也须服从于概率。庄家根据台面上的赌注分布来作弊，也并非无迹可循。赌纸上有大小、十一点、单数、双数、三数，押单独一个数总归有得赢。我默默计算，等待着手来揭示。所有人都在等。庄家故弄玄虚，再三以残手扶住碗底，每每又放开，弄得嘘声一片。终于叫“开”，人群尚未反应，他忽地也大叫了十一点十一点中了！庄家表情不变，旁边算账人数出十二张五十欧递给他。众人啧啧羡慕，他嗯嗯出声，有了活人的神色，连黑夹克都闪闪发光，明星一般对左右皆笑，将钱揣入怀中后，又瞥了我一眼，拖长嗓子，今——天，收工。三步并作两步，隐入高楼去了。两点亦中，却没有这么大的传奇性，我收起只赢一倍的十欧元，正欲离开，迎面走来四楼生命之粮的陈牧师。

赌摊设两种赠饮，十点前送三趟咖啡，十点后送四趟威士忌。自十点起不再接受一两欧元小注，最低十欧起押。赌客们偏爱大注与威士忌，饮威士忌后便要下更大的注。摇骰子的雇得一个女人，捧一只红色冰桶，专往塑料杯里加冰块，有人喜欢薄荷叶，嚼一两片叶再呷酒，赢得有纹有路；也有人押大注之前需要镇静大脑，将冰块混酒倒在头顶。女人并不在意种种举止，穿梭着上了发条似问，冰、薄荷叶，glaçon, menthe, 收一两个硬币小费。我与陈牧师说话时，还未到十点，女人托来满盘子的 G7 速溶咖啡。外区人若到此地，我一定会推荐他喝赌摊上的 G7，其实它叫 Trung Nguyen 咖啡，中文名作中原咖啡。一位越南赌友告诉我，应写成阮忠，他名为阮忠山，同种拼法，不过他不似我认为这是十三区最好喝的咖啡——就是三合一嘛，trois en un，他在等过十点饮酒，半杯酒半杯冰，一饮而尽，喝完即走，回家好睡。冰未化便倒在草地上，如骰子滚动着。阮忠山问我读不读越南诗人，我摇头说不读，他掏出本 Huu Thinh Nguyen（阮有请）诗集送我，英译本，题为 the Time Tree，《时间树》。他赌博时带一本诗集作何用？这诗人文名为何？没追问，阮忠山总爱说：再押一欧，一欧到十点。说罢，便背着手，伸头等“开”，无任何读过诗的迹象。

由外面马路往里看去，似白水母漂浮，本该透明的白水母又伸出一些黑色的触手，是围住桌的赌客。

G7 三合一香甜普通咖啡馆机器打出的 espresso 似刷锅水，长咖啡 allongé，意为加水，则更不堪入口，咖啡底中加了半瓷杯水，就要收三欧五，坐吧台便宜些，两欧五，只有十点半即开始赌马赌彩票的老赌鬼们才要去小锌咖啡馆消磨。陈牧师与我皆取一杯 G7。塑

料杯被热水烫了一下，微微变形。冲三合一粉，水量至重要，冲太短仅有甜无香，冲太长又变淡，奶味显得假，要恰好在杯子三分之一多一点。陈牧师手指捏住杯口晃晃，嗅一嗅香气，他必是个 G7 的行家，深知 G7 给人一种即时享受的快乐。他也是 Lok Lak 饭的行家，我帮他写完稿，他都请我去吃客 Lok Lak 饭。裹着黑椒汁的骰子形状牛肉粒、红色番茄米饭、白醋泡过夜的红白萝卜片、锯齿状黄瓜，一欧五加只蛋。他每次皆重复，Lok Lak (k 轻声停顿送气)，就是小方块的意思。小方块牛肉饭。他还是个钢琴的行家，团契时钢琴伴奏让兄弟姐妹们读故事：电光石火间，慈爱的父开口与我说话。他讲，这段你没写好，节奏不对，与我的钢琴曲不相配，应是：电光石火，慈爱的父啊，说与我听。

4

中国城有三批人抢垃圾。赌博到凌晨一点，散步于舒瓦西街上，见高楼下现了两只影，丢出旧床垫微波炉拆开的书架等，随即开来一辆白色面包车，跳下罗姆仔，挑着那只床垫，一抬一抛进后车厢。这床垫要卖到北边，住久皆知，那里名为贼赃市场、垃圾中心：如山的床垫、旧唱机耳机电源线、地铁里窃得的墨镜、钱包卡片洗劫一空的旧手袋（名牌手袋已卖入二手精品店）、洗衣机、移动燃气灶，废旧品之海。斯里兰卡人由铁箱中掏旧衣旧鞋，他们使条长钩，钩出皮衣大衣先披在自己身上；皮鞋用油打亮，鞋底上补丁，在小陈氏超市前的下水沟那儿出售，一双摆一只，要定再由袋中取出另一只，即便警察来了抛在地上，也不会被人捡去。还有位黑大衣老者，在伊夫里地铁站口摆摊，坐在高楼风中并不懂遮蔽，别人都说他是傻的。他的两只衣袋中塞了许多干花生，我见他用手捏开壳，花生衣落得满身。一块塑胶皮上摆有掉漆搪瓷锅、布满污渍的淘米篓、塑胶把手烧化的意式咖啡壶。他喝得醉了，一缕头发落下来遮住左眼，别人便又说他的左眼瞎了，只是很难验证啦。地铁站口一群灰鸽子打转，因为总有小山似的过期面包倒在那片草地，几只飞去啄他衣袋中的花生，屙屎在他身上。某天，摊子上有一个不太旧的穿纱丽的印度娃娃，娃娃脸上点了粒红点，小纱衣服上滚了金边，在那堆旧厨具中格外鲜丽。穿黑色皮夹克的想送给他的女儿，花一欧买下了，顺手将娃娃插在内袋中。他敞着怀，好像带着女儿在赌。

天光仍在。黑皮夹克问我有无贏钱，我讲，赌摊旁就是食摊，卖排骨粉、熟地黄鸭腿粉、烧牛肉粉、pho、鸭蛋活珠子、香茅鸡、金不换牛、炸小鱼、腌生螃蟹木瓜沙拉、油条、肉设、猪肉碎粿包。好有一餐，不好有一餐。赢过五欧便有一餐。他又问我有没有做工。我讲，赌即是上工。他颌首表示赞同，每日放工再上工，做一夜白工，白日做工的钱也输掉。我问，前几天不是刚中十一点？他回，输啦，统统还给他们。说话间，那头在叫“开”，我们已赌了几把，押过一两欧小钱，今日颇得聊天的心情，就边看边讲，并不再押注。赌摊人并不多，离天黑尚有半个钟，此时赌徒最为休闲，晚工还未开始，我们称之为“观局”，即是，好几个赌摊当中统一绕，庄家也正在摇手感，一切都是新的、不稳定的，赌徒的一夜才刚露一角月牙儿。“观局”时，我二人发现一位新来的女庄家，手势极生疏。赌摊有时故意这么做，派一个生手揽客，初时有机可乘，入夜后则换手。专让人入坑，怎么讲，赢来五蚊赔十蚊了。

庄家如若手狠，摇得骰子撞塑料碗盘亦当当作响，老远就听见，听见忍不住要来看这热闹，看了一会儿热闹则忍不住要下注。声音杀人于无形，听他气势，觉得他已算好赌纸上的注了，押什么都不会准，迟疑即输。叫开也有技巧，要将赌徒的眼睛都收过去。太快开出不够刺激，无法让人的精神力忽然地大量消耗，也无法激得人脑发热一头扎进这游戏；太慢开出，人客会跑，赌徒这生物真好笑，有时站定一赌好几个钟，有时又最没耐性，庄家愿意赌徒急不可耐押注等开，失却计算的心思，可太故意吊胃口会驱人去别家赌。唯熟手能够把控程度。而我与黑皮夹克算是赌中的熟眼，庄家生得什么模样完全想不起，但凭手势认人。

四个指没上场，坐在远处食摊吃鸭蛋活珠子，即“宝宝蛋”(l'oeuf avec bébé)，斯里兰卡人点暖灯孵得，煮熟与越南芫荽(越南语拼音 rau ram，叶片圆尖，每一片带有蝙蝠状黑斑)及青柠同食，五欧三只，四个指一次吃六只，补充精力。我们光瞧他的脸，开始并没有认出他，只看他用四个指剥起蛋壳也并不减速，一转便露出一个带毛的鸭胚，黑皮夹克贏的钱第二天便在这四个指下又输回去，再看才发现他面颊有一道刀疤，头顶一条秃，再也长不出头发，知道亦被利器所伤。四个指觉察有人盯住他，居然笑着打了个招呼，他从卖饮料的冰桶中捞出两块冰，搓洗手，再以青柠檬皮依次擦九个手指，讲，稍后便上工。

女庄家拖泥带水，黑皮夹克认为她未够班，每隔四五次便摇出重复的单个数。我遂由小押到大，第一次押两欧在一个四点，输了押四欧，输三次押二十欧，片刻贏五十欧，又用五十欧押四点，再贏一番。这赌摊可真奇怪，庄家摇骰亦管收付账，抬眼，是一个年轻女人，长相近越南人，越瞧越面熟。她叫“开”的声音也不够吸引人，怯生生。我不好意思再贏，押二十欧在十一点，摆明还钱给她。“开”，她拈起碗，不敢信似的，将那三个数反复

加了数遍，道是又中。黑皮夹克讲，赚得花红见者有份，请客吃鸭腿粉。那女人欲哭，仍数钱给我。我摆摆手，作罢。黑皮夹克骂我是痴了，看得一个年轻女人便心软，和亮哥亮哥一样，为爱反水干掉自己人。我忽然认出，她不就是上一周推小车卖三色冰（三色是我心中排名第二的赌摊饮品，第一自然还是 G7）的吗？她的三色比 KOK 好食太多，除了必须要有的三色“珍多”与椰浆，亦搭配树菠萝、去皮绿豆沙与海底椰，杯口盖上一层碎冰，而且绿色“珍多”是真用斑斓叶汁染色，有清香味。于是更不肯收钱，正推让，四个指上场了，他将女人推到旁，将一叠散钞塞入我手，我个阿女不争气，愿赌服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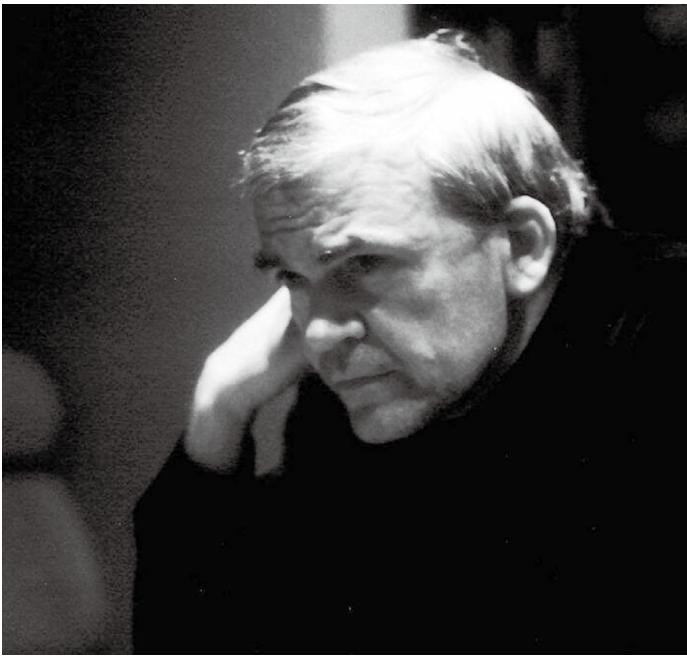


费滢

1986 年生于江苏，历史系学生，法国索邦大学毕业，高等社会科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硕士，高等实践学院博士在读，专业方向为佛教文献与医学史，作品散见于《钟山》《山花》等，出版有小说集《东课楼经变》、翻译作品《历史的逻辑》。中学时期征文作品《平台》收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曾获台湾台积电中篇小说奖首奖、联合文学报短篇小说奖大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Wikimedia](#)

小说

“玩笑” 是人与世界的一道屏障”

米兰·昆德拉 | 发现经典

叙说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无法跳过米兰·昆德拉

当地时间 7 月 11 日，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因长期病患，于法国巴黎辞世。米兰·昆德拉 1929 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1975 年起定居于法国。著有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慢》《身份》《无知》《庆祝无意义》、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随笔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相遇》、戏剧《雅克和他的主人》等总共十六部作品。1973 年获美第奇外国小说奖，1985 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2001 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2020 年获卡夫卡国际文学奖。

1968 年，米兰·昆德拉参与了“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苏联军队占领布拉格之后，昆德拉被列入黑名单，其作品均被列为禁书。1975 年，他流亡法国，四年后完成定居法国后的首部长篇小说《笑忘录》，讲述捷克人在苏占时期的生活。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刊发本书书摘，以表纪念。

1

一九四八年二月，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这是波希米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那种决定命运的时刻。

哥特瓦尔德的同志们簇拥在他周围，紧靠在他身边站着的就是克莱门蒂斯。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而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

宣传部门复制了成千上万份哥特瓦尔德站在阳台上向人民发表演说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皮帽，周围是他的同志们。共产主义波希米亚的历史就是从这座阳台上开始的。

每个孩子都知道这张照片，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宣传画上，在课本中，或在博物馆里。

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历史上消失，并且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2

现在是一九七一年。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他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的这些行为不够谨慎：他认真地写日记，保留自己的书信，对他们讨论局势、探讨前途的所有会议都做详细的记录。他们对米雷克解释说：他们没有做任何违背宪法的事情。要是偷偷摸摸行事，还带着负罪感，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一个星期以前，米雷克与自己所在的建筑安装队在一个施工中的大楼楼顶工作时，他朝下看了一眼，感到一阵眩晕。他失去了平衡，顺手抓住一根柱子，可那根柱子先前没有固定好，倒了下来。其后，大家把他从柱子下拉出来。乍一看，伤得很重。过一会儿，当他发现只是前臂一般性骨折后，他满意地心想，这下可有几个星期的假了，他终于可以处理一些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时间处理的事情了。

他最后还是接受了朋友们让他更谨慎些的建议。确实，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可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谁也不会知道，国家会在什么时候开始高声宣布，这一言论或那一言论就危害了它的安全。于是，他决定将那些会连累人的书信文件放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他想首先与兹德娜了却此事。他往她所居住的那座城市打电话，那座城市距布拉格一百公里，但没有联系上她。这就耽误了四天时间。昨天，他才与她通上话。她答应今天下午等他。

米雷克十七岁的儿子不同意他这样做：米雷克不可以一条胳膊打着石膏开车出行。他开车确实有困难。受伤的那只胳膊，吊着绷带，在胸前晃动，无力且碍事。换挡的时候，米雷克只好松开方向盘。

3

二十五年前，他和兹德娜有过一段恋情，而关于这一时期，他只剩下几点回忆。

有一天，他们约会的时候，她用一方手帕擦着眼睛，鼻子在抽动，他问她怎么了。她说，俄国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前一天去世了。一个叫日丹诺夫，阿尔布佐夫或马斯图尔波夫的人。看她泪水汹涌的样子，马斯图尔波夫的死，比她自己父亲的死更让她难过。

这真的有可能发生过吗？还是他今日的仇恨使他编排了为马斯图尔波夫之死而流下的泪水？不，这肯定发生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今天回忆不起使这些泪水真实可信的当时的具体情形了，记忆宛如一幅漫画，变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对她的所有回忆是这样的：他们一起坐着有轨电车从他们第一次做爱的公寓房回来。（米雷克特别满意地注意到他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性事，一秒钟也想不起来了。）她比他结实、高大（当时他长得瘦小、羸弱），此刻正坐在车内长椅的一角，神情阴郁、古板，面孔老得令人吃惊。当他问她为什么这么不爱说话时，他了解到她是对他们做爱的方式不满意。她说，他和她做爱的时候就像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时的政治用语中，是一种辱骂。它指的是不懂得生活又与人民脱离的人。当时，所有被其他共产党人绞死的共产党人，都被赐予这一骂名。与所有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相反，据说，知识分子们是飘荡在空中的什么地方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惩罚他们，大地从此彻底拒绝让他们落足，而他们就被吊在离地面稍高一点儿的地方了。

可是，兹德娜埋怨他像个知识分子那样做爱，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就是对他不满意，并且，正如她能够将最不真实的关系（与她所不认识的马斯图尔波夫的关系）与最具体的情感（物化在一滴泪中）联系到一起一样，她也能够给最具体的行为赋予一个抽象的意义，给她在欲望上的不满足贴上一个政治标签。

他看了看后视镜，注意到一辆旅游轿车一直跟在他的车后面。他从没有怀疑过自己被跟踪，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明目张胆地这样做。今天，出现了极端的变化：他们想让他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到了乡间，离布拉格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大块绿篱，绿篱后面有一个带若干修理车间的加油站。他有一个好友在那里工作，他想换一下失灵的启动器。他把车停在入口处红白相间的栅栏门前。一旁站着个肥胖的老太婆。米雷克等着她打开栅栏门，可是她却不住地盯着他看，身体一动不动。他鸣笛也没用，他从车窗门探出头来。“他们还没有把你抓起来？”老太婆问。

“没有，他们还没有把我抓起来，”米雷克答道，“您能不能把栅栏门打开？她又打量他一阵，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然后打了个哈欠，回到她的门岗里。她坐到一张桌子后面，不再理他。他就下了车，绕过栅栏门，来到车间找他认识的修理工。那人跟他一起回来，自己打开栅栏门（那肥胖女人一直坐在她的门岗里，目光一直心不在焉），让米雷克把车开到院子里。

“你看，是你在电视上露面太多了，”修理工说，“所以这些老太婆都认识你。”

“她是谁？”米雷克问道。

听修理工讲，米雷克才知道：俄国军队入侵波希米亚，占领这个国家并四处发号施令，这对于她来说是非同寻常的生活即将开始的一个信号。看到地位比她高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比她高），只要有一点儿举报，就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地位、工作，甚至生计都成了问题，这让她兴奋不已。于是，她也开始告密了。

“可是她为什么还是当她的门卫呢？她还没有得到提升吗？”

修理工笑了：“她从一数到十都不会。他们为她找不到其他的位置。他们只能再次确认她告密的权利。对她来说，这就是提升！”

他打开发动机罩，看看发动机。

突然，米雷克注意到他身旁有一个男人。他转过身来，那人身穿栗色长裤、灰外衣、白衬衫，系着领带，长得粗脖肥脸，有一头烫过波浪卷的灰发。他立定站着，看着探身到发动机罩里的修理工。

过一会儿，修理工也注意到了他，站起身问：“您找谁？”

粗脖肥脸的男人回答：“不，谁也不找。”

修理工又探身到发动机里，说：“在布拉格的圣瓦茨拉夫广场，有一个家伙在呕吐。另一个家伙来到他面前，忧心地看着他，摇着头说：‘您不知道我是多么理解您……’”

阿连德被暗杀很快掩盖了俄国人对波希米亚的入侵，孟加拉的血腥屠杀又让人忘记了阿连德，西奈沙漠战争的喧嚣又盖过了孟加拉的呻吟，柬埔寨的生灵涂炭又让人忘记了西奈，就这样继续，就这样反复，继续反复，反复继续，直到一切都被人完全遗忘。

在历史依然缓慢前行的时代，不多的事件很容易铭刻在记忆之中，编织成一个无人不晓的背景，其前台上演着令人牵肠挂肚的私生活中的诸多传奇。今天，时间在大步前进。历史事件一夜之间即被遗忘，晨光降临便如闪烁的朝霞般飘逝，因此也就不再是叙事者故事中的背景，而是过于稀松平常的私人生活背景前上演的一幕出人意料的传奇。

历史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我应该讲一讲似已千年般古老的发生在若干年前的一些事件：一九三九年，德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捷克国家不复存在。一九四五年，俄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国家重新被称作独立的共和国。人们为赶走了德国人的俄国欢欣鼓舞并且，由于将捷克共产党看成俄国人忠实的臂膀，人们就把自己的好感转移到后者身上。正是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夺取政权的时候，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暴力，而是得到了半个民族的欢呼致意。而今天，请注意：发出过欢呼的这个半数更生机勃勃、更聪明、更优秀了。

是的，不管人们怎么说，共产党人都是更聪明的。他们有一个宏伟蓝图，一个全新世界的蓝图，在那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各得其所。反对他们的人没有伟大的梦想，只有一些陈腐的令人生厌的道德准则，用来补缀既成秩序那破旧的短裤。因此，也就难怪那些热情澎湃的人、那些勇往直前的人，轻而易举地战胜那些不冷不热的人、那些畏首畏尾的人了；也就难怪这些人很快就开始把自己的梦想付诸实践，为所有人谱写正义的牧歌了。

我强调这两个词：牧歌和为所有人，因为古往今来，人类都一直向往着牧歌，向往这个夜莺歌唱的田园，这个和谐的王国，在那一王国里，世界不是作为局外人反对人类，人类

之间也不互相对立，而是相反，世界与所有人都糅合到唯一的、同一的物质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巴赫壮丽的赋格曲中的一个音符，凡不愿做其中一个音符的人则成为一个无用、毫无意义的黑点，只需抓在手里并用指甲碾死它，就像碾死一只跳蚤一样。

有些人很快明白他们并不具备牧歌所需要的性情，因而他们动了去国外的心思。然而，既然牧歌就其本质而言是所有人的世界，想要移居他乡的人显然就是在否定牧歌，结果他们国外没去成，而是去了监狱。其他的人不久也踏上同一条路，他们是成千上万地走的，其中就有很多共产党人，包括借皮帽给哥特瓦尔德的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在电影银幕上，恋人们羞答答地手拉着，而通奸则被由普通公民组成的荣誉法庭严厉惩治夜莺在歌唱，而克莱门蒂斯的身体像一座钟一样摇摆着，敲响了人类历史的新黎明。

就在这个时候，这些人中一些聪明又激进的青年，突然奇怪地感觉到，他们到广阔天地里所开展的事业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们的理想背道而驰，并且不再理会那些赋予其生命的人。这些年轻且聪明的人开始在他们的事业后面呐喊，他们开始呼唤它，责难它，追捕它，对它进行逐猎。如果我要就这一代聪明且激进的青年写一部小说的话，我会把这部小说定名为《逐猪失落的事业》。



本文摘自《笑忘录》
[法]米兰·昆德拉
王东亮译
2022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



米兰·昆德拉

享誉世界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1975年起定居于法国。著有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慢》《身份》《无知》《庆祝无意义》、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随笔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相遇》、戏剧《雅克和他的主人》等总共十六部作品。1973年获美第奇外国小说奖，1985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2001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2020年获卡夫卡国际文学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题图为电影《小丑》(2019)剧照

非虚构

一个执念于意义的自由主义者

伊险峰 | 三个人的政治光谱③

对于自己是谁、为什么是以及想成为谁，
他有备而来。

黄易在《好奇心日报》的读者群里，自告奋勇要做田野调查的对象，他微信 ID 是一串日语，在群里叫“pharaoh”，法老。

法老身高一米八八，我们在南京西路旁边一条巷子里见面，准确说，是一个商场侧面的通道，沿道有一排餐馆。一个穿暗红色格子短袖衬衫、高中生模样的人杵在街的尽头，打过招呼之后他指了指很健康的摩卡站边上那个看上去很不健康的日式烧鸟，平成屋，说，我们去这里吧。

一串烤鸡皮、一串牛肉、一串鸡软骨、一串牛舌，再来一杯朝日生啤。他给自己安排好了。平成屋里挂着好几台平板电视，里面播着日剧，好在他声音够大够响。

黄易，1999 年生，在苏州大学日语系读大二，上海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似乎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上海人去读苏州大学，这么剑走偏锋的求学路径，会被看成是一个学渣。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准备了一个身份修饰自己的过往：挑战规则。

“我高考的时候就想跳出那个规则，那时候人生感觉到很虚无，觉得高考这种东西很玄乎，所以就不想复习考试。”

反抗规则，这东西似乎不仅仅是作为黄易给自己找的理由而存在，还上升到了他的人生信念的高度。而他给自己的人格贴的标签之一，则是厌恶竞争。

“高考不能升华我的灵魂，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走仕途用的东西，当时觉得没有任何价值。以前我想进大公司，初中到高中一直想，现在就不这么想了，觉得自己做喜欢的事情就可以，当然还是要有份工作，但那就无所谓了。我怎么样也是能喂饱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学习就是为了找工作，目的和动力都是找工作，就觉得没什么意义。”

“我爸爸是上海人，个体户，卖塑料袋和一次性饭盒，就是进货然后再卖出去那种，”他开始一边吃串，一边讲他的家庭和前二十年的人生，“我们家这个生意是有实体店的，

在成山路，巅峰时期我们家在那里有个大仓库，2008 年左右吧。后来仓库被强拆了，说是违章建筑，就补偿了两三万块钱。那时候他们在浦东买了一套房子，所以仓库和店里的东西就搬到那里，现在没有门面，靠以前的老客户，生意也缩水了。”

塑料袋在他们家是家传生意，最早是他奶奶在做。据说最初曾祖父带了黄金从广东到上海来做生意，在淮海路开了一家小店做吃的，后来充了公，我猜这大约是公私合营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但他的讲述中似乎还要更复杂，曾祖母的脖子在那时还被割了一刀，不知道何以会发生如此暴力的事件。在黄易讲述中，小吃店历史结束，爷爷奶奶很快就进了马甲袋塑料袋在卖，而他爸爸则在金山做流水线工人，后来就回到上海的门店里工作了。我猜这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中间还发生过什么，黄易似乎还没有把这个图拼起来。家族往事对他来说是一团乱麻，就像他说不太清楚他爸爸那年到底是 60 岁还是 58 岁，不了解的事远大于他确认的事。他可以确切说出来的是他妈妈今年 41 岁，但问到为什么他爸爸结婚这么晚，他又说不大清楚了。

妈妈是安徽人，在上海一个饭店里做服务员，嫁给了他爸爸。有几年日子看起来很不错，黄易觉得是 2008 年前后四五年的时间。后来发现他爸妈总是吵架，说明家里不顺，他并不会打听发生什么，但赶上花钱多，他们就会有意见。高三毕业，他和几个同学去日本，花了一万多块钱，虽然他们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妈妈很不乐意，他也很不好意思，觉得给家里添麻烦了。

大多时候他并不会这么想。他有他自己的事。初中开始写网文，贴吧上有文学社团，都是初中生高中生，二三十人，每月设立一个小主题，魔幻题材为主，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写，他也跟着“砌楼”，这是社团要交的作业。他说他那时候阅读量少，交上去的东西写得不好，拼命改拼命改，每次通过都艰难。为什么会喜欢写文章呢，觉得拉风，格调高。小学一年级有了第一台电脑，2006 年，拨号上网，他爸爸买的牌子机，惠普，六千多块，一直用到初中。电脑开始于他就是玩游戏，后来看动漫，开始懂得什么是世界观，“最早在优酷土豆上看，日本那种超能力啊热血啊，那时候央视还开放，《虹猫历险记》什么的，EVA，《美少女战士》《神奇宝贝》《百变小樱》，这些都是从电视上看的。现在在 B 站上追番了。”他说自己是 B 站资深用户，加入得早，UID 是 7 位数。

黄易后来从写网文变成写文章，探讨问题，从书评影评到游戏作品的评论，他觉得自己写这些东西有两个法宝，一是要有探讨的主题，二是会特别关注和社会有关联的部分。这两年尝试写小说，同样要关注现实，“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写一些虚构的东西”，他说其实现在开发的游戏和社会现实关联也蛮多。有一个叫《死亡搁浅》的游戏，里面有一个快递员一样的角色，机器人取代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后来就去路上抢机器人的包裹。“我就想起我爸妈，你看他们只工作没有爱好，一旦不工作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产生心理疾病……”虽然黄易这现实联系得有点走偏，但也不失为一种共情方式。所以他总结自己，就是爱好自我表达，把自己想法说出来。

这习惯黄易初中就已经有了，那时候回家的路上要坐公交车，没有手机打游戏，就会一直思考问题，主要是生死。他现在觉得这也是一种叛逆。“死”在他们家是一个不能说的话题，父母不许，他就想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避讳死啊。也是那时候，他知道了一个人叫太宰治的人，他的作品里就很爱谈这些东西，“日本人的小说嘛，就很唯美”。说着生与死、太宰治的时候，他在啃串，嘴上亮闪闪的全是油，手里往剩下的烤串上挤着柠檬汁。

叛逆是全方位的，像每个青春期少年一样，他也烦自己。他说他讨厌别人生气，但他有的时候也会伤害别人；他觉得自己是个友善的人，但有时又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他同路回家，有一天那同学说有事，不跟他一起走了，他大怒，就把同学的书包一路拎回家、上楼、再从楼上扔下来。

更多叛逆还是出现在家里，那也是他暗中观察他们家赚了多少钱的时候，他成天待在店里，打游戏充钱就会拿店里的钱，拿的也蛮多的，前后有一万多。他妈很震惊，严肃地谈了一次，“人这一辈子绝对不能撒谎”，他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后来又发现因为坚持这个原则，与人打交道讲话就不够圆滑，而且爸妈照撒谎不误，所以他又失望。所以，再与父母辩论，底气会更足，有时他妈妈都会被气哭。他们家里会有一些奇怪的氛围，他说他妈妈不但会哭，有时甚至还会离家出走，然后就又触动他叛逆少年嫌弃自己那部分功能，觉得为了自己的尊严破坏了家庭氛围。他说那时候 QQ 空间签名是“人是一个矛盾的结晶体”，如何从矛盾中解脱，当然束手无策。

他跟他爸的交流主要是打架。动手，四五年级的时候他身高不如他爸爸，但还

是会反抗，会打回去。到初中就不打了，那时他一米八八，超过了他爸爸的一米七九。

他跟他爸妈争论的话题，就是类似于“读书是不是为了赚钱”这种。他说他妈妈当然觉得赚钱最重要，“她以前就是服务员嘛”，至于为什么服务员就会这么觉得，“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爸爸，她肯定觉得我爸爸么上海人，而且又有房子，那时候我爸爸年纪也大了，所以就结婚了。”他的话说起来自然放松，好像觉得这其中的逻辑都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好像给他妈妈贴上了某种标签。我心中想，或许这也是他妈妈会有离家出走这样举动的原因吧？

我们没有在他妈妈是否得到了家庭中足够的尊重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因为他紧接着说他自己对爸妈的态度就是包容。“亲人是无法选择的。”他强调，虽然这么说是为了接下来“政见不合”的准备。

所谓政见不合，是客气了，黄易实际上想表达的是他们没有政见。

“以前看新闻，我就会给他们讲讲哪个其实说的不对，哪个其实只说了一部分。有的时候我妈就会说我屁股歪什么的，反叛，反社会之类，后来我发现这是我妈妈的语言风格问题，她就是这样说话的，没有恶意，仅仅是表达反对。她说我崇洋媚外，也不知道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毕竟也没什么文化，所以我不应该特别愤怒。之前满愤怒的，高中的时候有好几次吵架，大家都哭来哭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控制自己，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了。”

黄易是个很执着于“意义”的人，他从中再度总结出“尊严”和“责任”。“顾及家人的感受是我的责任的一部分，我大一时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家人的责任应该大于对自己尊严的在意。我之前跟他们的对抗很多时候只不过想维护自己的尊严”。

看起来他准备承认自己在家庭关系中有那么一点问题。“在外面，我很少跟别人吵。”他说的“外面”是指家庭之外，偶尔也会，因为他说话声音很响，一争论起来，人家就会觉得他在生气，他又生得手长脚长，就会给人压迫感。以前在大学的社团里，关于应不应该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有人觉得民智未开，不应该有，他不同意；还有，有人到文学社团里做客，偏要讲文学与哲学是没有意义的，他又大声起来。香港事情比较集中的时候，他把自己观点发到朋友，结果老师找上门来，问他是最近不太正常。他开始时说的是 HK，我听着别扭，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说香港，他说习惯了，我又问他说了什么，他说他在朋友圈里写，“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让我唾弃”。

这就说到了他对政治的一些看法。他说有一个同学，初高中都是爱国主义者，2018 年之后成了自由主义者，尽管如此，依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是那种会说“我要死在战场上”的人，黄易分析，这位同学更多是因为政治压抑产生了不适感。他本来想带着这位同学来，但因为疫情学校封闭管理，他出不来。他还特意说明，这个同学的爸爸是航空公司的地勤，他们去日本的时候还走了同学爸爸的特别通道。当然，这种细小的腐败，并没有成为他们针砭时弊的素材。

实际生活中他并没有太多表达政治理念的机会。他说前几天有一篇刷屏文章，有一个像写论文一样写了一篇“翻墙到底合不合适”，这种文章他偶尔也会写，大都发在 QQ 空间，或者放在朋友圈、微博上。老号的 QQ 空间被炸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肯定是发了什么评论。得有人有不同观点，而且有对手的时候更容易燃起“斗志”。我们是在好奇心日报的读者群里认识的，至少在那个读者群里，他是一个喜欢发表观点的人。

但与人争论政治理念，这种事对他来说并不太多。他说他不喜欢跟小粉红“对线”，对线是游戏术语，一对一单干的意思，他在 QQ 空间里探讨过武汉封城与意大利疫情的比较，有人跑过来留言，他看这人是那种“虽远必诛”的斗士，就不想说什么了。不过，他倒是提了几回跟老师的“对线”。

一次是上小学时跟班主任，他评价就是“那种会收家长钱给学生做保护伞的老师”，得到保护的同学比较张牙舞爪，他说他受不了不公平的事情，就想着给老师添点麻烦。“老师会有那种需要学生去签到的课件嘛，密码是公开的，我有一次就改了她的密码。她就在班里问是谁干的，正好那天我迟到了，她问完了全班，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我肯定不承认，然后她就诈我，说她老公是公安局的，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上网记录。我就怂了，就招了。”事隔多年，他在大学社团里辩论，“平庸之恶是否应该被审判”。他把这事想起来了，就去看了看汉娜·阿伦特，知道平庸之恶的核心是不思考不作为，他觉得当年班主任就是平庸的恶。不过，不巧的是学校辩论，总要分个正反方，他被选中的立场是“不应该审判”，为了证明而证明，跟事实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很无聊。

还有一次，初中值日生负责倒教室里垃圾桶，正好那天负责的人没倒，垃圾桶满了，他把垃圾直接扔在外面。班主任看到了就问是谁干的，这一次他勇于承认了，然后说是因为值日生没有尽到责任。班主任说那你为什么不负责？他当时不服气。这次“对线”以他“进步”告终。他觉得班主任说得对，不能在别人的错误之上叠加另一个错误。

政治光谱，或者意识形态，这些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正反对错左右是非，多多少少都与老师有关。《一九八四》就是老师推荐给他们同学看的，这算得上打开了他的一个世界。他觉得乔治·奥威尔写得蛮好，“架空了一个世界观来讽刺现实世界，当然我要是这样写，百分百过不了审的。”他这句话信息量挺大，包含了他从动漫游戏里引入的“世界观”概念，又观照了他自己的“创作”实践，还审视了社会现实。后来看了托尼·朱特的《思虑 20 世纪》，赞不绝口。托尼·朱特倡导多元主义，对他来说很有意义，“而且他还经常会有些金句”，黄易特别强调这一点。“美中不足就是人名实在太多了，有点吃不消”。

他喜欢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本书是对话体，他很喜欢，因为很容易被引导进入到他们的思考体系里，像托尼·朱特这种基于个人经历的就更好了。

“当然，这样还不够客观，”他想表现得更理性一点，“我还会看电影和百度百科，有的时候游戏也会提到这种历史背景。有个游戏叫做《刺客信条》，你知道吗，它就会提到法国大革命。”我短暂思考了一下这和对话体客观性的关联。

他继而说，大一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托尼说的吧？”他亲昵地叫起了名字，“最重要的三件事，事实、常识和逻辑，要做一个多元的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仿佛看到了闪闪的自己，露出得意神色。“我还喜欢那个人提的消极自由，那个伯林……对，以赛亚·伯林，就是看了他写的书。”提起伯林的时候，多了很多陌生感，看起来不如托尼相熟。

不过，他还是更爱讲小说，小说对他影响更大。最初什么都看，魔幻言情都市穿越再到社会现实，通过看小说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多。他喜欢三岛由纪夫，“有很强的艺术感，很刚强，跟那种柔美的日本文学不一样，是极致的、竭尽全力的感觉，感性和理性拿捏得好”，菲茨杰拉德也喜欢，他认为文笔非常华丽，跟他的风格很像，石黑一雄也不错，《长日将尽》里的管家故事文字特别优美，能把一个人带到氛围里。他不怎么看豆瓣，只有在写影评的时候才会看，电影他提到《小丑》，它跟社会现实有关，所以他喜欢。

他时刻没有忘他要写小说的这个志向，看小说时琢磨着自己要写什么题材，他觉得题材是可以学习的，但写作靠的是天赋。他没说自己的天赋怎么样，只是说他就想写那种“架构在现实上的虚构”，还说之前给自己定过一个计划，晚上 10 点到 11 点什么电子设备都不看，写一个小时文章。但还没有实施过。

“我的理想生活方式就是没有太多竞争，能养活自己，当然也要获得认同和陪伴，自我主张可以很好地实现，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说写作和翻译。”

松了一口气。他又要了一杯 0.5L 的生啤。

我们聊天是在 2020 年 5 月，武汉疫情尚未结束。他在上海上网课，没有回苏州，跟很多人一样，空闲多了，他觉得自己看书反倒少了，上网课，健身，打游戏。健身有教练，一个月两千块，一个礼拜去四五次，教练是他的初中同学。他的这位同学在他眼里很神奇，上海人，“据说他们家有 3 个小孩，同学妈妈的收入据说到了 7 位数”，但黄易去过他家，没感觉出来很有钱。这时他说到初中读的是上海市爱国学校，有点惭愧，虽然这学校历史悠久而且由现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教育家蔡元培创办，但这学校出来念中专的多，上高中的比较少。

他也是到这个时候，终于明确说他其实一直不爱学习。他认为自己短期记忆强，然后就可以随便看看就去考试。小学三年级以前他爸爸给他报了私立学校，每年学费要 2 万，他妈妈觉得太贵，就转到了公立学校，踢足球，体育生，一年交一万学费，但没考上好初中，学区分配到爱国学校。高中倒是可以，区重点，但他自己也说，上海的区重点也就是那么回事。他觉得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就没什么意思”。

这又勾起了他对“意义”的追寻。他看了一些哲学书，本来想找个人追随，但是好像也没有找到。迷惘就是因为信仰崩塌了，他说好奇心日报那个读者群里的好多人其实都是这样，虚无，从自由主义变成了犬儒主义者。

洞察到考试没有意义之后，他就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前几天他爸爸和几个朋友吃饭，把各自的子女也叫去，就是大家认识认识的意思。有一个人的女儿是北大的，就说起来她给一些公众号写软文什么的。“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这种顶级学府的人也要写这种垃圾文章？”

那个饭局之后，他想到了“钱”的意义，思索了好一阵子，已经有了结论：喜欢钱就是喜欢索取，而像我们这种支持人文的，是燃烧自己，是在创造东西。

这时，他仿佛又一次看到了闪着光的自己。

但我看到的不是这样。他在说到他从市场营销专业转到日语专业的时候，他说这算是一技之长，将来实在不行可以靠翻译来养活自己。然后他说了一段话：

你想我是上海人，家里有三套房，肯定不愁温饱。像我在外地读书，日语系第一名那个同学就超焦虑的，男生，所有的事情都不关心，只想学好日语，然后找一份好工作这样。湖南人，家里都是在苏州打工的，肯定焦虑。（为了）房价啊之类的事情，只能拼命挣扎。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照例很大。即使是在居酒屋嘈杂的背景音里，还是听着很有穿透力。他在说话的时候看着是个腼腆的男生，带着发育中的那种试图显示自己力量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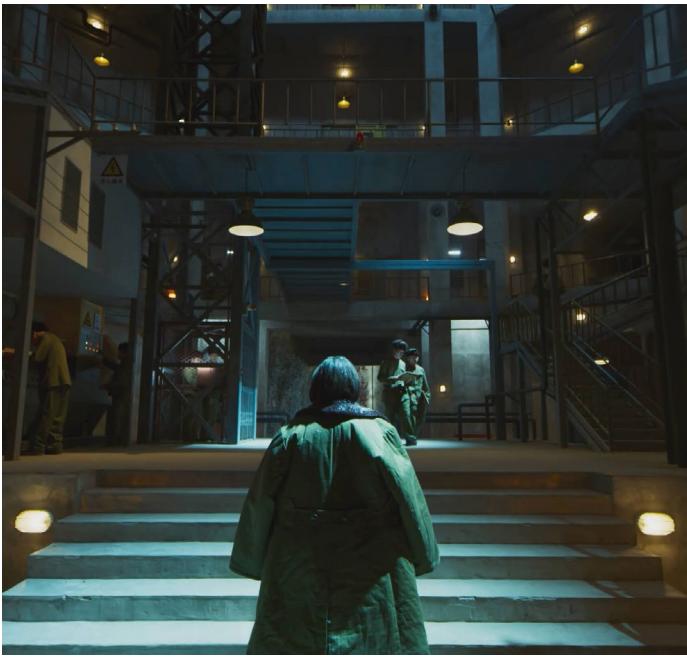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为电视剧《三体》(2023)剧照

非虚构 郭星 伊险峰 | 黑暗森林①

这也是关于一个人的政治光谱的故事。
我们分三部分发出。

郭星身上能看得出来一种表达上的自信，这种自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里，属于普通年轻人的自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网上看到的。他们评论所有问题，不回避，不屑于传统的已经持续一百多年的面对世界的谦卑态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劲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体的态度被叫做“不卑不亢”，他们通常前者做得更好一些，略有一点“亢”，即使是在面对面的线下场合。

但在提到那几个字的时候，郭星会给自己营造出一种氛围。你能感觉到他的紧张，代入的恐惧，可能还有责任以及与责任结伴而来的无助。

“黑暗森林。”

“《三体》说不清看几遍，时不时翻出来看几眼。发生很多事情后来都可以印证。它还有一些想象力。黑暗森林理论，”说到这里郭星的声音都变了，“《三体2》里提到一个理论，宇宙是一个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一个猎手。隐藏自身，发现以及消灭。毁灭人类，往三体发射地球信息，相当于广域发布，大喇叭，说我在那里。坐标已经暴露了。地球随时会被摧毁。放在宇宙邪恶、敌对的环境中……不管到什么时候，看到这一段，都有一种心里发寒的感觉。”

郭星看了我们一眼，发觉我们并没有如他一样，进入到严肃而且凛冽的气氛中来，识破了我们对“三体学”了解不够充分的破绽，决定给我们讲一遍。

“第一部主角是科学家，他和警察、政府发现了三体这个组织，三体组织就是要毁灭人类，写他们如何拯救。”

“第二部主角是罗奇，为了抵制三体，采取了面壁人策略，对抗三体。三体星球的文明比地球高，它们派了一个质子，放到地球来，把地球的发展给锁死了，但质子

没办法控制人的思想，它们就让这几个人构造新体系，三体一个一个地攻破。罗奇几乎在必死的情况下发现黑暗森林理论，用两个星球的生命，去威胁三体。如果你杀掉我，我就会向全宇宙公布地球和三体的坐标，因为它的设定，只要公开了坐标，公开了位置，更高级文明就会过来善意或者攻击性都有可能。实际上是用两个星球的生命来威胁三体。”

“《三体3》，第三部的主角是程星，圣母婊这样的人物。通过做秀一样的行为，展示她的人格魅力。当了新的面壁人，被三体人识破了内心软弱，导致地球被三体控制，然后出逃。大结局是地球全灭了，重新回来一个朋友，出现一个宇宙中的组织，把宇宙中失去的质量补回来，重新发展。”

比我们想象得言简意赅，很快就讲完了。我事后补课，仔细研习三体学，发现郭星的总结能力很好，没有废话。

“我也是说黑暗森林就是大刘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星际迷航》《星球大战》，也有冲突有纷争，大体上都是和谐的。你看《星际迷航》，各种文明相对和谐；《星球大战》就是正邪对立，这个文明和其它文明可以敌对，但也可以和平相处。黑暗森林是纯粹敌对的状态。”

“不是说害怕。说出这种可能性，是发寒的。”他又强调一遍。

《三体》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特殊的存在。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知道：很多书出现在年轻人的阅读范围中是随机的，看了某本书因而受了什么样的影响，因而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一个信息源远较过去丰富的社会里）相当大程度上是运气的成分——你碰到的老师恰好喜欢某本书、持某种强烈的价值观，家里的书架上恰好有，你喜欢的大人物、英雄、偶像恰好推荐了那一本……对一个人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产品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还知道，很多东西是碎片化的，有待接受者自己的组装……

《三体》不一样。

我们与一位资深的对社会思潮保持敏感的观察者聊起《三体》。他反问我们：“你们感觉有多少人被他影响？”——“他”指的是刘慈欣，《三体》的作者，来自山西的科幻作家，娘子关发电厂的前计算机工程师，我们一时想不出来估算的路径，他伸出五个手指，少说有五千万。在大方向上，他判断一向准确，在数字问题上，他一向有点夸张，但他言之凿凿。他很意味深长地用了“刘慈欣思想”这个词。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我想起李汉超会特意强调：“我是一个没看过《三体》的人。这小说的周边太恐怖了，它的粉丝，它的衍生学说。我没直面过。我有这时间，看《经济学人》不好吗？”

我们跟张岳阳也说到《三体》：“很多人对《三体》不能自拔。”“为什么呢？他们怎么说？”他问。“后背发冷。”我想了一想，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了。“噢！黑暗森林！”他准确地找到了“发冷”的症结，“这种人可能会相信美国人是谁派来的……跟见识水准有关吧？”

当然，更多的是我会想起午后阳光里，金先生灿烂的笑容。他在回答他与女儿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温暖的团结和共识，他张着嘴，开心，包含了女儿对他肯定之后的得意——得到年轻人的肯定即使从生物意义上也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他说：

三体。

我当时都有一种后背发冷的感觉。

(二)

这是我们和郭星的第二次见面。郭星1997年出生，山西晋城市高平县人，现在在杭州一家芯片公司里做技术员，下个月会升为见习工程师，再接下来是助理工程师，他的手机相册里全是各种机器维修图，看着很敬业。我们上一次见面也是在杭州东站前面的星巴克里，那天他穿了一身黑色，黑色T恤，黑色长裤，黑色球鞋，背着黑色的双肩包，他全程都背着包，很热情地介绍他的身世家庭和成长经历，稍微说了说他对世界的看法——要等到第二次见面他酣畅淋漓地聊过《三体》之后，很多他讲过的事情的前因后果才更完整地呈现出来。

“那有得聊了。”我们开启原生家庭这个话题之后，他用这样一句作为开场白。

郭星原生家庭事情是挺多的。

他爸爸出生于 1977 年，妈妈出生于 1979 年。他妈妈 18 岁时生的他。他们都是高平人，高平属于晋城，离太原不远，相亲介绍，很快结婚。两个人性格不合，脾气都很冲，成天吵架，在他 10 岁的时候终于离婚。16 岁的时候，他爸爸因为赌博入狱。郭星当时读高一，高平当地最好的学校，本来学成绩还可以，高一高二的时候排在四五十名左右，一个年级有六百人，按他原先估计，他可以上个差点的一本或者二本，他说他属于平时不努力考试还行那种选手。数学一般，文科比较好，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语文课本上的文章很早就读过了，比如鲁迅朱自清这些。出了事就不想读书了，从此成绩一落千丈，上了一个叫晋中职业技术学校的地方，大专，学机电。提起往事他有诸多遗憾。

变故之前，他家在当地算得上有钱人。山西煤矿多，他们家不开矿，他爸爸卖车险，躺着赚钱那种，相当于淘金热里卖水赚钱的大富翁。每个矿都有车队，一个煤老板怎么也有三十几辆大车，一辆车一年光保费就可以上万，他爸爸的公司三四个人瓜分了晋中市的所有车队。我头脑当中闪过煤老板们宾利悍马一类豪车，郭星仿佛看出了什么，很世故地制止了我的想象：“他们不碰私家车，不能啥都是你的啊。”

他不喜欢煤老板叱咤风云的时代，觉得那时候乱，江湖气，很少有煤老板不涉黑的，他爸爸交际广，也认识黑帮，有时候吃饭也会带着他，他家里都是不开灶的，放学回家就打电话：今天到哪儿吃？跟煤老板吃饭就是要喝酒，所以他十来岁就会喝酒，他爸也不反对他喝，酒量觉得还可以，只是不喜欢。有一次放学之后叫着他一起吃饭，隔壁比较吵，他们这一桌的煤老板就跑过去，掏出一叠钱砸在一个人脸上让他们滚。跟电影里的大哥一样。他不喜欢这种做派，又加上他爸爸出事之后，酒肉朋友们都跑路了，更加深了他的这种印象。

他说，家里的东西就全都输光了，大概有三百万。我直觉可能也不这么简单。

不过，煤老板的好日子并不比他爸爸长远更久。他讲到有个对他很好的叔叔，做煤矿，到转型的时候，破产了，然后跳楼了。“其实他家里还是有车有房，只是存款没了。后来他家里人就把车房卖了去北京生活，2010 年左右。”

我算了一下，那是在他父母离婚之后，在他爸爸赌博入狱之前，那正是山西煤矿发生大逆转的时候，“煤矿转型就是那个时候。那些煤老板有钱的时候法拉利宾利每个人都有的，买房就更不用说了，虽然说不是拿麻袋装的吧，但的确付的是现金。煤老板最开始都是温州人，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来了，用走私赚的钱搞了煤矿，后来是福建人，本地人一开始只能跟着喝汤，后来一点点吃回来了。这里面就有利益冲突嘛，本地人总是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他并没有深究哪里出了问题。

在他爸爸出事之前，他算是同学里的小土豪，一天零花钱 50 到 100 块，去网吧，打游戏，唱歌之类，出门也都是他来埋单。以前没有什么烦恼，家里条件好不单是指有钱，也包括在县城里算是有点势力，学习也还可以，是吃得很开的那种小孩。这在一个人的成长期里也是重要的事，郭星说，那时欺负人、霸凌之类的事在他们这种重点学校里也会偶尔发生，在他看来，最危险的是不太聪明的，另一个是家里有钱的，会被讹，他说他有个同学就因为讹人被送去劳教了，带了刀，把人划伤了，性质就变了。不过，就像他不去歌厅网吧一样，他与这些东西相去甚远。他说他的爱好是看书，他不喜欢吵，所以只是去看书，图书馆或者书店，图书馆就是高平的公共图书馆，还有就是小时候家里的书。出事之后，有几个势利的同学，把钱看得重的，就疏远了。三四个一直很好的朋友也会安慰他，叫他不要那么丧。

他的人生大变故都恰好发生在他的叛逆期里，不幸叠加在一起，一个美好（至少是富裕而且无忧无虑）的童年叠加，所以暗中学了鲁迅的冷眼，愤世嫉俗。高三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读书，他对家里的事情的反应就是，事情发展得太快，他无法接受。后来总算冷静了准备高考，但大局已定。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从文科改理工科方向。他自认看书多，喜欢安静，本来以文科为目标，但现在务实多了：在北方文科不太好找工作。他特意强调，“我不是说文科不好，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丧是必然的。有一两个月他处于辍学的状态，家里连他上学的钱都没有人管，没办法去上学——高中住校，伙食费住宿费都没钱付。

后来是他爷爷供他完成了学业。他是他爷爷唯一的孙子。他爷爷在他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角色，不止是出手救援这么简单。

郭星总是暗示他家道中落与“没有人管”有关，而且这个“管理的缺失”并非是针对他，

而是特指“没有人管”他爸爸。9 岁的时候，他奶奶去世，“奶奶在家里管事，她去世了等于唯一能管我爸爸的人就去世了”；10 岁的时候爸妈离婚，再娶，“继母不怎么管爸爸，家里的东西全部输光了，大概有三百万吧，还有两套房子，车”；后来，他复盘这些年的人生，他说他很懊悔，我们以为是懊悔不好好学习没有上个好学校，不是，是当时应该管他爸爸的，“为什么没有制止他，因为他后来赌博都是在电脑上嘛，我在家里会看到，我看到应该制止，但是我没有”。

郭星爸爸最后判了两年半，减刑到一年零八个月。出狱之后，他爸爸在爷爷的朋友的公司开车。郭星说他爸爸很早就开车，技术好。记录他爸爸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是大约 19 岁结婚，20 岁生子，29 岁时母亲去世，30 岁离异，35 岁因赌博入狱，37 岁释放。

他爸爸看起来更像是个问题少年到青年的过程。而在这个家族中，爷爷才是家中的中流砥柱。即使他爸爸再就业，还是要仰仗老一代的余荫。

他太爷爷生了四儿四女，最大的爷爷在省城，第二个爷爷去世得早，第三个是他爷爷，第四个是做房地产的。他爷爷跟着四爷爷一起做。四爷爷现在全家住在北京。他叫不太准爷爷的准确年龄，大约出生于 1956 年或者 1957 年，跟四爷爷做生意到五十岁，拿一笔钱就退休了。“房地产这种东西里面有很多污秽，都是黑道的。”一个家族中，有一位特别出跳的成功人士，家族中大都会围绕这个成功人士布局，形成一个中心，或者说利益集团，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几个典型的家族财富聚集的故事，它们大都遵循这种逻辑。

他爷爷对他很严厉，爸爸坐牢之后，祖父直接面对孙子的教育成长，更加严厉。爷爷身体不好，以前得过一场病，胃切掉一半。郭星有些事就要顺着老人来，下个月要从杭州回老家相亲，这就是爷爷的意思，现在打电话总是说这个事，感觉像是结婚这样的大事也被爷爷接管了。他跟他爷爷打电话联络得比较多，跟爸妈大概一两周通一次电话，都是他们打给郭星，他不喜欢联络。

他看的大部分书都来自于他爷爷的收藏，这是他们真正的联结点。“他的书都放在我家客房的书架上，我记得是两个一人高的书架。我爷不在我家住，但是他的书都放在我家。我家房子宽敞，三室两厅，差不多有一百四五十平，主卧和客房都大，我爷爷或者别的亲戚有时会来住。”郭星说他看书比较早，小时候从煤矿仓库跳下来，脚踝骨裂，就在家看书。四大名著，没有看《红楼梦》，连环画。十岁之后，夏天，他怕热，放暑假的时候不出门，开始看更多名著，《羊脂球》《平凡的世界》《活着》……老一点的各种“经典文学一百篇”之类的，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吃牡蛎，马克·吐温，《汤姆·索娅历险记》《基督山伯爵》《飘》，他说不好意思是什么版本，各种短篇的集子，“汤姆”是单本的，“基督山伯爵”也是单行本。有什么看什么，大体上很杂的，也有金庸梁羽生黄易各种武侠小说，后来看《鬼吹灯》，晚上害怕，不敢看。《鬼吹灯》应该是他爸爸的了，他爸爸还看《小说月报》，他不认为他爸爸是文艺青年，只是他们家都有点阅读癖，从他爷爷到他爸爸。看书于他半是认识世界半是消遣，最大好处是开阔眼界，可以辨别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比如今天那个新闻已经打脸了就是体罚导致女儿哮喘出血，高烧住院的一个博主。因为我平时看一些刑侦的书，所以看到那图片上血的颜色就不太对。照片里血是鲜红鲜红的，人血放一段时间应该是褐色的嘛，所以我觉得不太对。我当时忙，没有下场吃瓜，今天果然反转了，就是那个妈妈自己把颜料泼在上面的。这种你看大案纪录片什么的都会知道，人血的氧化速度是很快的。”

他很享受这样的冷知识。但是他把这个定义成开阔视野，我也不是很认同。相反，倒是另外一些本来可以“开阔视野”的线索，比如“严打”，我觉得倒是被他当成了冷知识，扔在那里成谈资了。因为他总是很在意“黑道”，他爸爸的黑道朋友，对他爷爷的房地产生意的总体评价——总是涉黑总是很污秽，还有他提到学校里霸凌讹诈一类的事，就问他怎么看贾樟柯，他拍过山西黑道的电影。“我看他那部讲本地的电影，叫什么来着，对，《江湖儿女》。我不喜欢黑化，江湖这种东西我一直是很鄙视的。我是个毛左，喜欢秩序和政府，江湖都是违法犯罪分子，放在那会儿，严打都是要枪毙的。”

他第一次提到他是个毛左，我们先放一放。他知道《江湖儿女》讲了黑帮的故事，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贾樟柯要表达什么；他提到“严打时要枪毙”也是一个互联网上经典的传说，与它相应的还有“如果是美国警察，早就把你突突了”，通常用以表达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坏人坏事过于纵容，羡慕的旧时代或者美国的严刑峻法——其实

并不了解“严打”时对个人权利的空前侵犯，也不了解美国警察到底多大程度上会把一个人给“突突”了。在郭星那里的情况大同小异，我觉得黑帮在他眼中是模糊不清的一团，与江湖、煤老板、敲诈等东西一样，只是一个邪恶概念，这些邪恶还有共性：粗鲁，没有文化，想咋地咋地……可能与他不喜欢的“吵”、父亲不加约束的为所欲为等等联系在一起。他说，还是觉得对人对物要有礼，对，礼节的礼。

至于“礼”，与他的诸多概念一样，也是一种自己手中的武器，对人对物，那得分什么人什么物。这同样是后话。

他爷爷年轻时做过民兵，还会有一些与他的老三届年龄背景近似的藏书，比如“赤脚医生手册”“民兵手册”之类——这些书很欢乐，“赤脚医生手册”像连环画，“民兵手册”里教些造枪造炮做陷阱之类，“野外求生，当时不叫这个，叫主题救护”。

当然，影响至今而且最大的，是“毛选”。

“八十年代出版的。五本的，家里有四本，第二卷丢了，只看到四本。开始的时候只是看，也看不懂，成年之后，认真看。”

“年轻人嘛，很多东西初步形成懵懵懂懂，现实里的事，互相认证。觉得有帮助。”

“特别印象也单独说不上来，哪段也说不好。它整体上都是对这个世界说得很透彻的东西。”

“最开始我算半个公知，后来年纪大，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为电影《降临》(2016)剧照

非虚构

“工业党人”和“公知”

伊险峰 | 黑暗森林②

“一个人的政治光谱”，
郭星的故事的第二部分。

郭星毕业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北京、杭州、广州。北京，他说这是他的伤心地，本来女朋友工作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每周都去，到他毕业的时候，调走了；广州，气候不好，不喜欢这个地方；最后就只能选在杭州了。他从小喜欢吃米饭，不会有山西人对此的抗拒，那时他还知道杭州冬天的湿冷是什么概念（“一丝丝冷意顺着每个毛孔往里钻”），带的羽绒服放在柜子里一直没动，打开的时候看衣服上长出了蘑菇，冬天则与山西完全不同，好在抗过第一年阴冷的冬天之后，也就适应了。关于伤心之地北京，估计还会对他对北方文化的厌倦，他不喜欢凡事都要讲个人际关系的社会，可能跟他从小看到的父辈做派有关系。另一个小细节是他那时每周都要去北京，高铁来回要 500 块钱，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可能说明在他被爸爸出狱之后，生活质量又恢复了。

这时更重要的变化是他蒙童时代的结束。他说他的世界观差不多是 20 岁左右成型的，就是他三年大学的第二年，“可以说是从堕落里扭转过来了吧”，也有前女友的因素，觉得有了女朋友应该好好生活。女朋友是深圳人，在北京做培训，就是帮公司人力资源做培训那种，跟他同年。朋友介绍一起出去旅游，聊天就认识了。他毕业的时候可以去北京，但女友又离开了，去了也是异地，只好到杭州，还是异地，感觉生活没有章法，与女友冷战，最后索性分手。

像大多数人一样，这个世界观成型的过程并非顺利。过去十年间，他所经历的感性的可触摸的历史、理性的思考、道听途说的知识，会搅拌在一起，像干结的水泥，像叛逆期漫不经心留下的废墟，抛在他的人生路上，随时会给他带来麻烦。就像他说到“严打时是要枪毙的”，这种知识有可能来自于他爷爷对不听话小孩子恐吓式教育、来自于家族中的黑道传说、也来自于父亲遭遇牢狱之灾时他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恐惧。就像他没办法去判断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他只是认为只要表现了那

个时代，就是赞美那个时代。那是一种“扁平化”的理解。他眼里的世界，很多时候是平面的。

你能想象，他急于离开北方，老家，开车的父亲，身体衰朽下去的祖父，乱糟糟的十年，开始一种新生活。现在，他要用自己的阅读、他以为开阔了的视野来解读世界了。

手机出场了。郭星的阅读习惯发生变化。

但是他最初看网络小说，却是在线下。“2008 年、2009 年左右的时候，有人在学校门口卖盗版，大部头，还有台湾人出的，就 A4 纸打印，很厚，只卖 20 块钱，质量很差，”他的回忆中还包括了古早网络小说令人瞠目结舌的品味，“龙傲天，我龙傲天，走着走着，天降异宝，今天吃了一个饭，有美女过来，要跟我一起生孩子，各种好事。”这样的盗版还包括金庸那些老一代的武侠小说。

上网都是 2010 年了，他说。他的上网指的是用智能手机上网。

我们以前探讨技术代沟的事。其中有一个，他们上手用手机就已经是智能机了。这说明两件事：电脑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上网工具；手机首选功能不是打电话。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为这两件事还困扰很久。郭星的经历告诉我们确实如此。他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有第一台电脑，联想一体机，自然是他爸爸给他买的，用了四五年，后来换了一台。他说他不喜欢键鼠操作，习惯了游戏机那种手柄——一般来说，城市里孩子只要不是家里条件太差，都会有小霸王，游戏机手柄操作显然更符合人的自然行为和动作逻辑，手柄操作先入为主，对键鼠自然不喜欢。郭星大学的时候有个笔记本电脑，收起来了。现在除了上班的时候工作用电脑，下班之后不怎么用。电脑于他，是名副其实的办公用品，或者也可以很刻板地叫它“效率工具”。

他的第一台手机是中兴，2010 年。有了手机就是聊天，QQ，用了一两年，摔破了，换华为、联想，然后又是华为，再之后是小米。他姑父是小米的粉丝，把他带进去了。从小米 2 换 3 换 4，现在用小米 20。一直用安卓系统，不喜欢 iOS，不开放，他喜欢刷机，来回折腾。

他也很少用手机玩游戏，“不喜欢戳玻璃”。他看到我露出不解表情，在手机上比划两下，戳玻璃不懂吗？他又强调一遍他对游戏手柄的信仰。所以手机的功能，除了聊天就是看网络小说。起点、纵横、刺猬猫等等，市面上大部分阅读类 App 他都会用。刺猬猫是二次元同人小说。网络小说的好处额外还有一个，可以很方便地加入书友群，迅速打成一片，当然也有可能互相制造信息茧房，但这谁知道呢。找到同道，是件多让人兴奋的事。

他说现在只是偶尔在通勤路上才看看传统的纸质书，说话间从背包里掏出一本《克苏鲁神话》，好像跟看网络小说也相差不大。

“最近这几年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书吗？”本来这只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小问题，没想到这是郭星打开他的世界的开始。

“《赤色黎明》。我是 2016 年左右看的，主人公叫陈克，人物设定是 1980 年出生，穿越回 1900 年左右，基本上他是重走了一遍毛泽东的道路。这小说有很多不足，但它难能可贵一点是，它是 2011 年、2012 年写出来的。那是公知最猖狂的时候，写出这样一部小说，不一样。给人很多一种正面意义。”郭星努力把小说的艺术特色、探索意义、时代意义分别来看，以彰显客观。

“还有一本是《临高启明》，一群现代人发现一个虫洞，可以穿越到明朝，然后在明朝建立一个新世界吧。这小说，立意也不是很高。”他再度采取先抑后扬的策略，我等着他的“但是”，果然，“作者是工业党人，详细地写发展工业之类。基本上在明朝发展，带了一些物资，蒸汽机内燃机之类，要从头开始。要炼铜，用铜片做密封材料，试运行，因为中国没有橡胶嘛。写得细。”

张岳阳也曾经跟我们说到《临高启明》，他提这本书是说互联网上诸多流派中，工业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相信工业救国，只有发展工业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大体上他们有很浓厚的知乎特征，其中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是马前卒，马前卒本名叫任冲昊，是位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八〇后土木工程师，在他的工业党理论之后，自然而然地与观察者网联系在一起，他对于早期观察者网的特色建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曾经出任过观察者网的新闻总编辑，知名度超过前辈金先生，是这个网站的灵魂人物。马前卒还是《临高启明》这本书的策划，当然也是灵魂，他给自己在这

本书里也安排了一个高大上的角色，叫“马干瞩”，很高瞻远瞩，经常挽狂澜于既倒。

“这本书算是被封禁了吧？写得太详细了包括火药制药，该用多少原料，如何配比之类，所以被封掉了，”郭星给出这本书被封掉的理由是这样，现在在互联网上找这本书的全本不太容易，但图书馆有精简本的传统纸书可以借阅到，“这本书很难归纳，群力合作，据说有五百人的一个大群在写。也不是说一起写，最开始是群聊，带出一个想法，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写一本小说呢。集思广益嘛，你贡献化学的，我贡献工业的，故事性占的可能只有 40%，大部分讲各种发展各种制造之类。”

“可能也不是封禁，算屏蔽吧。在起点里，很多章节不见了，少了一些，屏蔽掉了。”他补充说，“网络文学，我喜欢的就这两种。其它的看看就完事了。”

我看着桌上的《克苏鲁神话》，“传统的有吗？”

“传统的文学，近几年看得少。实体书，只看了几遍《三体》。还有《夜魔》，《北京折叠》算吧？虽然我觉得《北京折叠》不怎么好。我觉得它有点公知，所以觉得它不怎么好。”

这个时候，他开始大规模地介绍《三体》，从故事梗概开始，滔滔不绝。

“脑残粉就不说了，单从科幻性上看就是佳作。人文上也不错。”

“章北海是一个我喜欢的人物。他是军人，思路明确，并且按这个思路去作事，从没动摇和软弱过，确定方向就一直按这个方向发展。地球上当时有一个讨论，火箭到底是曲率引擎还是什么引擎，章北海反对工质飞行，在地球上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他为了改变这个局面，收购了行星陨石，打磨后，当子弹来用。把支持工质飞行的那些人打死了。”

“第二是地球被三体控制了之后，有几只船没有被控制，被质子打爆了嘛，逃跑。第一发现物资不够，船支持不了几百上千年的航行。如果一定要活下去，怎么办，那就一定要杀死其它船上的人。船可以拆解，人可以当成食物，章北海，把其它人关起来……”

“你喜欢他的是牺牲精神？”

“说不上牺牲精神，贯彻自己道路。”

“是不是过分强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没必要往这上面扯，”郭星预判了我的反抗，“首先我觉得犯不着。主要问题还是与三体行星的战争状态、进化论之类，没有必要。”

《三体》中有关章北海和思想控制的两段描写：

“首长，您的问题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毕竟，信念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在这里首先想指出的是目前部队中的错误思潮。大家知道，在三体危机之前，我们一直主张用科学和理性的眼光审视未来战争，这种思维方式以其强大的惯性延续到现在，特别是目前的太空军，有大批学者和科学家加入，更加剧了这种思潮。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四个世纪后的星际战争，我们永远无法建立起胜利的信念。”

一名上校提问：“坚定的信念不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之上的吗？不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建立的信念是不可能牢固的。”

“那我们首先要重新审视科学和理性，要明白，这只是我们的科学和理性，三体文明的发展高度告诉我们，我们的科学只是海边拾贝的孩子，真理的大海可能还没有见到。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科学和理性的指导下看到的事实未必是真正的客观事实，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学会有选择地忽略它，我们应该看到事物在发展变化中，不能用技术决定论和机械唯物论把未来一步看死。”

“您不想用这个东西，思想钢印，来造就一支拥有坚定信念的太空军队吗？在军队中，你们有政委，我们有牧师，思想钢印不过是用技术手段高效率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而已。”

“政治思想工作是通过科学的理性思维来建立信念。”

“可这场战争的胜利信念，有可能用科学理性思维建立起来吗？”

“博士，如果这样，我们宁愿要一个虽无胜利信念但能够自主思维的太空军。”

“除了这个信念外，别的思维当然是自主的，我们只是对思维进行了一点点干预，用技术越过思考，把一个结论——仅仅是这一个结论——固化在意识中。”

“这就够了，技术已经做到了能像修改计算机程序那样修改思想，这样被修改后的人，是算人呢，还是自动机器？”

“您一定看过《发条橙》。”

……

美国代表：希恩斯博士和山杉惠子博士以自己过人的才华，为人类开启了一扇通向黑暗的大门。

法国代表：人类失去自由思想的权利和能力，与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哪个更悲惨？

……

希恩斯说：“怎么一提到思想控制，大家都这样敏感？其实就是在现代社会，思想控制不是一直在发生吗？从商业广告到好莱坞文化，都在控制着思想。你们，用一句中国话来说，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毛左？”

“小时候就是看我爷爷的《毛选》，长大了觉得里面说的话非常透彻，只要我在山西就会翻。”

在郭星的叙述中，他也并不完全崇拜毛主席，他承认没有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与现在会完全不一样……不过，很快话锋一转，“但是，像八十年代下岗这种问题也是存在的”，然后，再一转，“我在芯片行业工作嘛，我听一些老人说，中国当初本来是要自己研发光刻机的，光刻机是决定芯片技术的关键，国内的立项比荷兰要早 6 年。但是邓小平上台后，认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所以荒废了很多大项目，其中就有光刻机。现在技术远不如人，我们用的都是荷兰的 ASML。光刻机和我们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挖掘机和工程队的关系，你需要他们的机器才能工作。所以说受制于人。我们自己的生产现在能做到 14 纳米，国际普遍是 7 纳米。所以这一次疫情，材料原料和机器各种被卡，受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公司恰好在疫情之前买了一台光刻机，所以还好。”

《三体》中有关红岸工程的两段描写

“这是一个大型武器研究项目，如果成功，其意义可能比原子弹和氢弹都大。”

突然，那纷乱的操作口令声消失了，主控室里一片寂静，只能隐约听到仪器设备偶尔发出的蜂鸣声，接着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男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红岸工程第 147 次常规发射，授权确认完毕，30 秒倒数！”

……

“红岸是逐渐衰落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造，主要是升级了发射和监听部分的计算机系统，发射系统实现了自动化，监听系统引进了两台 IBM 中型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提高了很多，能同时监听四万个频道。但后来，随着眼界的开阔，人们也清楚了外星文明探索的难度，上级对红岸工作渐渐失去了兴趣。最先看到的变化是基地的密级降低了，当时普遍认为红岸如此高的保密级别是小题大做，基地警卫兵力由一个连减少到一个班，再到后来，只剩下一个五人保卫组了。也是在那次改造以后，红岸的编制虽然仍在二炮，科研管理却移交到中科院天文所，于是承担了一些与外星文明搜索没有关系的研究项目。”

就像《临高启明》中对明末中国错失工业文明机会的莫名惋惜一样，光刻机在工业党人眼中几乎是这个时代中国工业被“卡脖子”的一个象征。郭星——我此时可以确认他同样是一个工业党人——的忧国忧民气质与他的工作现实联系在了一起，更增添了了他的忧郁。

他现在住公司的人才公寓，两人间，上下铺，客厅卧室和阳台加在一起 20 多平方米，跟大学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也曾经出去与人合租，十几平方，也挺压抑，还不如人才公寓。当然，钱也是一个原因，刚入职时四千，现在工资六七千，年终奖再加一两个月。“工作不忙，硬件维修，有事情才忙。每天八点上班，五六点下班，下班之后吃饭健身，剩下就是刷刷微博，打打游戏，睡觉，”相比生活，他更爱说他的工作，“我们修的是测试类机器，就是测试芯片。这是圆晶，我修的就是圆晶的机器。整个团队十几个人。我们这一行流动性一般，我们有老人是公司收购绍兴的国企时一起收购来的，做三十多年了。我师傅也有二十多年了。芯片公司就是北京苏州上海武汉。芯片厂不会停工，一台机器要一亿美金，还是二手的，就是 ASML，肯定不会停工的。”

单调、贫乏而且缺少流动与变化的生活，因为《临高启明》而拓展。郭星说他看书会参与到书友会的讨论中，某种意义上杭州生活也是这么展开的。

“在微博上我只看不说话。我们有一些专门聊政治话题的群，在那里我会发表意见，主要都是看网文认识的，彼此比较合味吧。很多写政治话题的网文小说，认识他们之后就每天都聊一聊。”

“我们聊天的规矩就是不能人身攻击，可以撕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群里左派比较多，毕竟民主的灯塔也在死亡嘛。左派是可以无限细分的，毛左，托派，斯大林派……”

“微博上关注的就是‘吐槽鬼’什么的，就是方方骂的那群人，我反对的就是方方这种人。”他还是很在意方方，在说到他所看到的各种左派的时候，他还强化了一下他的“毛左”身份的立场：反对方方。他列举了一堆我们所熟知的方方“恶行”，住大别墅，动用警车送侄女去机场，一地手机，造谣护士之死……就是通常说的那几件事，“你打着日记的名义编造事实，这是什么？这种旧文人特别讨厌，应该在文革里全部干死。”我们见面在 2020 年的 7 月，他还没有从几个月前的气愤中走出来。

刘慈欣谈笔下叶文洁和“公知”的形象

要说科幻文学最适合探讨的命题，我认为是文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我常常说，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

《三体》的女主人公叶文洁本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她在每个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都是正常人应该做的，可为什么会遭受那样的结局？如果在正常的时代，人们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人，但在小说中，她为什么如此令人厌恶？我希望通过《三体》探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极端环境下是否依然成立？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情节和人物的基础之上的衍生命题，而不是主题先行。

——《科幻的本质是青春锐气》（刊于中国文艺网，2015.12.15）

刘怡（采访者）：你怎么看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和西方的差距，或者具体说在创意上？

刘慈欣：我们只能和我们后面的进步相比，没办法和技术巨人相比，三次工业革命，他们都抓在手里，我们一次都没有抓住。现在那帮“公知”们，什么都和别人比，然后再贬低自己，那样很让人厌恶，也是一种很蠢的思想。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先要战胜自己，然后再去战胜别人，别人有别人的条件，我们有我们的条件，我们在不断进步就行了。我们的基础就在这里，我们有沉重的负担，刚刚脱离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科幻的角度看，中国的未来是很神奇的，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希望和挑战。但西方的主流文明，这个神奇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我没有不请自来的灵感》（刊于《信报》，2014.11.5）

（四）

《三体》中刘慈欣为叶文洁安排了一次与迫害她的家庭的老红卫兵们的对话。

那几个根本没打算来道歉的老红卫兵只是希望获得自己良心上的平静。

“听到了吗？是历史！是历史了！”粗壮的女人兴奋地对叶文洁挥着一只大手说，“现在是新时期了，谁还会记得我们，拿咱们当回事儿？大家很快就会忘干净的！”

叶文洁是在那一刻才最终决定背叛地球——“在她的心灵中，对社会刚刚出现的一点希望像烈日下的露水般蒸发了，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超级背叛的那一丝怀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将宇宙间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类世界，终于成为叶文洁坚定不移的理想”。

在一次访谈中，刘慈欣谈到他选择“文革”作为《三体》的开篇是因为“文革”的极端性，“当时我的出发点是要写一件让人性到一种极端状态的事，要完全地绝望，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这么多件事里，最接近这个前提的，就是‘文革’。”刘慈欣说他的读者在看《三体》的时候，有疑问，认为他夸大其词，写得太残酷了。刘慈欣说：“其实真实的历史比我的小说残酷得多，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我的家庭就深受文革之害，所以刻骨铭心。这是在我们的历史里真正发生过的事，大家理应去了解，去认识。”

刘慈欣在多个场合表达过他对“文革”的态度，娘子关电厂、他的家庭与“文革”之间的关系。他言之凿凿的否定态度与叶文洁有相似之处。但就像叶文洁对“文革”的

否定，这件事的理想主义那一部分以她的姐姐在楼顶的艺术化的死亡为终，而这件事暗黑的那部分则转为叶文洁的真正的态度，被深渊吞噬的深渊凝视者。换个角度，用某种句式说，叶文洁是真正的“文革的孩子”，毕竟她才是“宇宙社会学”公理的提出者。

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这里包含了我们在郭星那里看到的所有性格特征的来源，此后接下来三年种种似是而非的社会思想，生存权问题，零和博弈，老大老二之争，卡脖子，然后，才是……黑暗森林。

刘慈欣像乔治·凯南一样，炮制了他这个时代的冷战报告。

人们开始对威慑本身进行深入思考，由此诞生了一门学科：威慑博弈学。构成威慑的主要元素有：威慑者和被威慑者，在黑暗森林威慑中分别是人类和三体世界：威慑操作，发射三体世界坐标导致两个世界毁灭；威慑控制者，掌握发射开关的人或组织；威慑目标，三体世界放弃侵略并向人类世界传递技术。

在一次与学者江晓原的对话中，刘慈欣表现出了罕见的玩世不恭：“正因为我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合理的。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读者认同了我的这种选择。套用康德的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道德不以为然。”

以人为手段还是以人目的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扮演基石的地位，它也是启蒙哲学和理性主义以人为本的基石，很少有人对这个基础性的“道德”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

刘慈欣将地球文明置于毁灭威胁之下，不厌其烦地描摹着人性在各种极端状态下的可能反应。

……刘慈欣以非常冷静而又强大的逻辑，推导出极具特色的刘氏“宇宙社会学”公理——黑暗森林法则，作为对“费米悖论”的一种合理解释：宇宙中诞生的文明，由于相互之间距离极其遥远，使得文明之间的沟通非常困难；各星球上诞生的文明，其生存形式、基本逻辑思维方式甚至基本的生命构成都有巨大的差距。各文明由于距离上的遥远性、互相所构成的猜疑链以及各自在技术水平上发展不均衡性，一旦被外星文明获知自己的存在，就很可能给自身的生存带来威胁。其结果必然导致：具有一定成熟度和技术水平的文明，都意识到宇宙的丛林法则，各文明不主动暴露自身的存在。“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

所谓“宇宙社会学”，建构在这样一种逻辑推断的基础上，即宇宙也像人类社会一样，其中的所有文明都遵循统一的人性逻辑。黑暗森林法则，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人性法则，而且是建立在博弈论和猜疑链基础上的人性。

——魏泉《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人性维度》

某种意义上觉得进了太空的人就不再是人了（想一想章北海的杀伐果断），就像鱼离开了水之后就不再是鱼。在另一部小说中，刘慈欣表达同样的态度，那一次他说：“人性其实一直在变。我们和石器时代的人，会互相认为对方是没有人性的非人。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为《三体》(2022)剧照

非虚构

你现在的观点是怎样的？

伊险峰 | 黑暗森林③

“一个人的政治光谱”，
郭星的故事的第三部分。

郭星的直言不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就像刘慈欣的“非人”说法也超出我们想象一样。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看眼下社会中种种现象，会发现这种“非人”的世界观与眼下泛滥于全球的“身份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极化”、“运动化”息息相关，甚至它只是另外一种极化的表达方式。

“你的政治观点现在是怎样的？”

“工作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黑白分明，所以大部分时候我就是觉得能过就行了。大学的时候我比较偏激，思想上就是那种皇汉主义。”

“什么？”

“皇族的皇，汉族的汉。就是种族主义，觉得汉人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现在我已经平和多了。有一个朋友在新疆，他说边疆战士守卫国土，各族都有。我亲戚打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也告诉我各族战士都有。所以后来我觉得坏人哪里都有，不能按照民族来划分，现在我要好多了。”

不过，他还是承认自己还有那么一点点民族主义的遗存。比如不喜欢韩国人，因为有一次他在北京簋街吃饭，旁边的韩国人就很吵，吃完饭出来坐地铁，韩国人还插队。素质特别低，印象很差。他还说他也不喜欢黑人，“广州的黑人还好，在美国的黑人就很讨厌”，那一段时间正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他给自己的政治观点加上了新的一条：“我觉得我其实不盲目支持群众运动，那种打砸抢烧还是很破坏秩序。我们反日游行的时候不是也有那样的嘛，那样不行。”

“所以，你怎么看文革这种群众运动？”

“文革是一个正确发动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扭曲了目的和过程的运动。”他突然有了一点字正腔圆的播音腔，“那时候反动派很多的！军队的山头主义也很多，如果不搞文革国家就要分裂了。当然群众运动是很难控制的，内容容易发生扭曲，结束

的时候就是一地狼藉。”

他看我对四平八稳的书面语有点不太适应，又补充：“我觉得文革不能完全用负面的眼光看待，你像夹边沟和那些伤痕文学，大多数都是完全负面的，都不一定是真的。所谓十年浩劫就是对那些旧文人发动的，可惜他们没有全部被消灭掉。”

他对铲除旧文人这事念念不忘。

像所有对“文革”运动的正确出发点进行辩护的人一样，他们通常还要替“文革”时取得的成就表达敬意：“你看我们国家在1966年到1976年间还是有很多科研成果的，两弹一星胰岛素……”他不认为“文革”对国计民生造成了巨大破坏。

“但是更多的科学家不是下放了吗？”

“大多数都是保护起来的。其实那些被下放的人写的伤痕文学，本质上都是不适应而且鄙视农村生活。你们在城里锦衣玉食，下地干活就叫成那样，其实是对农民的歧视。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了。”他还是要鞭挞旧文人。

“这些人拥有大量专业知识，他应该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什么要下地干活？”

“从1957年反右，上山下乡还好，只是有一部分人在农村受苦了，其实知青在农村待遇绝对不算差的，本质上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文人，我不觉得劳动就是一种折磨。这就是真正的阶级斗争。”

“文革就是没把这些写伤痕文学的杀尽，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而且这些人写的东西，就像方方，随意编造就是为了写出心中的事实。都是听朋友说，听某个媒体说。她还把反对她的人都叫做‘粉蛆’，说反对我的都是文革余孽。这些旧文人就是活该。文革只是有一些失控的无序的暴力行为。你说的科研人员都是受保护的。”

“那改革开放呢？”

“我觉得整体正面，但还是有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导致工人阶级的沦落，然后国家政治层面比较混乱，比如权贵问题，军队经商，腐败，对吧？”

不过，改革开放是他亲身经历的历史了。他倒是能保持一点客观精神来面对。

“其实我从小到大生活比较宽裕，花钱还是大手大脚的。”他是想表达“托改革开放的福”？“你看我都不怎么吃公司食堂，叫个外卖都是三四十，再买些水果又是三四十，我对生活的要求比较高，吃水果还得吃那种贵的，樱桃啊，葡萄只吃无籽提，菠萝蜜什么的。然后打游戏要花钱，买衣服要花钱。工作四年存款大概一万多吧，就是留在那里给自己保个底。优衣库的衣服只能穿一季，一换季就丢掉。我这个人不喜欢存东西，冬天11月在宜家买了被子，3月份就丢掉了。每年买一次被子。”

这还挺浪费的。

“我看你朋友圈里说最想去南京，是什么？”

“吃过一次南京的蟹黄汤包，新街口的，里面有一整只蟹！很好吃啊！店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这是我最想念的食物之一。”

“为什么没去？”

“嗯，我在杭州也不怎么出门，我怕晒，不喜欢太阳，基本上不出门。”

可是，怕晒，不出门，为什么城里的知识青年吃不了农村的苦要被他鄙视？为什么他们就“伤痕”，为什么这就是阶级斗争？一季度丢一床被子、吃最应季的水果，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是要被批判的吗？

“你喜欢的文人吗？”

“鲁迅先生。他就是完全客观的，我们国家有什么不好，应该如何改正。而不是我们国家怎么怎么不好，我去给美国人当狗。《河殇》派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公知的祖先，喜欢说在美国绝对不会的那些人。还有一种就是你有立场，觉得国家不好，那你走嘛。有些人站在体制反体制，扛着红旗反红旗，那不是典型的吃里扒外？拿着谁的工资干谁的活，不是吗？有个叫乔木的，以前也是公知，觉得体制不好，然后真的走了，这就是敢作敢当。”

“批评有批评的意义，不是吗？”

“这个事情，你不能单纯说批评。不是说批评了就说他没出息，要看整件事。鲁迅先生也是批评，不一样，有些人的批评是看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不足，他讲出来，发人深省，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变。我们怎么去前进，也指出前进的道路来。有些指出批评来，指出错误来，然后只会讲洋人干嘛干嘛。”

他又回到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评价。

“邓小平……我对他有怨气，但也不是完全否定。白猫黑猫，其实最后没有猫。结

果毕竟还是好的，有了前 30 年的基础，才有后 30 年的发展。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工人下岗，”他叹了一口气，“工人下岗，妻子卖淫，丈夫守门。都是这样的！”

“你说你以前还有点公知，你现在这么激烈地反对他们，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应该是有一点公知粉，有一点愤青，感觉这社会如何不公，现在想起来这都是中二病。年轻人会觉得世界黑暗之类的。当时大概几年前，社会论调政府各种不可信任之类的东西。那时候看了夹边沟那个系列，也有几个信任的公知，就是微博大号，像高晓松啊，姚晨啊，李娜啊这些的。”

“还有媒体也会给这种印象。”他继续说，“之前的像南方系，今年疫情发现财新网，财新让我感觉不舒服，阴阳怪气的。它之前很多报道罔顾事实。我记得财新网转载方方的言论，包括其它疫情方面的东西。在微博上。我不可能订阅它的文章的啊。2月份的时候，讨论中美疫情。第一条推的就是订阅服务，一年多少多少。啊，智商税。它居然利用这个东西来拉它的订阅！”

他有点跑题，而且把付费阅读直接划到“智商税”范畴里，我顺道问他怎么看“付费”。

“付费？看怎么定义的，知识方面的吗？最基础的是支持正版。包括游戏，小说，音乐，还包括微博上 V+ 文章。单篇文章付费这种。支持正版。一年也花不了太多钱，游戏玩主机嘛，肯定正版。网络小说，一年也花不到哪里。音乐有买 VIP。一般不怎么看剧，偶尔看几个电影。所谓视频网站能找到。网络小说，订阅，更新就会付。一般来说，300 万字三四百块钱。”

但是他受不了新闻的订阅付费服务。

“回到你的转变上来……”

他像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一样，笑了：“动车事故，高铁啊请等一等你的人民。”

2011 年 7 月 23 日甬温线发生高铁事故。时评作者董大焕的一篇文章中说：

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位公民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位公民都不被“时代”抛下！

“我觉得不大舒服。这段话能让人记住。当时听到不少评论，也没有什么感想，后来再看一些，这些公知的言论越来越不对劲。当时，看新闻联播，看网易新闻，微博，这两个。有一个比较，更信任谁，更倾向于谁，并不是太清晰。”很难说之后更具体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他从动车事故的新闻报道中学会了“交叉印证”，然后，越来越多地发现，“这帮人”——公知——更大的事实偏离，“有两种观点放在你面前。他说的是这样，我接受的信息就是这样。后来我发现了新的渠道，我就会拿两个渠道做对比，好像以前的不大对劲。比如没发生的事情或者发生的事情夸大说出来。然后，判断谁给的东西相对可信一点。”

他想起一个例子，云南暴恐事件，火车站砍人。

“我记得最清楚的，姚晨那次说恶之花绽放的土地。恐暴这事情，对人伤害嘛。无法用一些政治观念的事给他洗白。911 这种事，我喜欢美国吗？我不喜欢，但我会支持这事件吗，我不支持。恶之花绽放的土地，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活该。”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恶之花，其它的也会有。我就很愤怒。恐暴这事，是个人都不应该支持。”他继续评论这件事对他的冲击，这件事发生在 2014 年 3 月 1 日，郭星在高中最迷茫的时期，也是他正在形成的“皇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时候。

“暴力行为，无产阶级的暴力行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府也是暴力组织，本质是暴力机构。共产党是用暴力推翻一个组织，它不是针对平民做什么。恐怖分子是无差别地对待。”

郭星把它上升到暴力行为和无产阶级的暴力行为的理解上来。

“这其中，毛选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我没有办法完全说明白毛的作用，是不是帮我整理了思想、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这些说不清楚。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一片渺茫的时候，一个灯塔点亮了，照亮了我的前路。当然，具体该生活还是生活。”

想了一想，他又说：“毛的这些东西给我的这个唯物的立场，辩证地看待一些事情。

也不是说它一下子就把立场给我了。比如我看一件事情，多渠道多方面，才能对这事来评价。‘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说得很好啊，这就是唯物史观。”

接下来与郭星的交谈，更多的可能是呈现一种结果，而不是他这么看问题的原因。我们会看到一些他对世界的看法，这里有一定程度的炫耀和夸张的成分，他需要用一定的姿态来显示自己的立场，同时，他也知道，他自定义的“毛左”身份，也有一种挑衅的意味，他希望这种挑衅应该表现得更为充分一些。我曾经问过他最近都关心哪一类新闻，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主要还是跟地缘政治有关的，国外的那些吧，印巴冲突之类，他说主要是聊得“口嗨”。在他谈论“文革”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一点。

“你怎么看待审查？”

“文字狱问题有相近性，无可避免。”他一下子上升到“文字狱”的高度，“都很正常。我觉得问题不大。我不是说文字狱没什么问题。有这种行为就很正常。控制这种东西很正常。”

“墙呢？”

“其实这个东西。墙影响了多元化流通。我不是说他是正面。其实没有墙也没有在沟通。”

他的观点与胡锡进倒是有些相似，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胡表达了更近似于“建设性”的意见——“真正的墙是语言”。

郭星接着说：“中国有防火墙。其它地方没有。facebook、推特，自己国家的 app，要说有多元化也不见得有多元化。商业垄断。墙属于政治行为。我觉得它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确实让国内很多比如字节跳动成长起来。这是一种保护。国外用户也增长。有一些发展作用。挡开了，有一个市场供它发育。另一方面，确实阻挡了一些知识，信息流通。这些也有。也不是纯粹正面负面来看的东西。”

“但可能阻挡的恰好是最有价值的多元化思考方式。”

“这个东西，要我说，如果没有墙的话，公知会更加猖狂。你看有疫情了，推特发黄图不会封，说中国好的一定会封。毕竟我们不是 AI 控制的世界。网站互联网社区都有立场，有管理人员，有价值取向的。”

“但你不是受益于多元化、交叉印证、融合，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吗？”

“我觉得挺难。改开以后，很复杂。我们的意识形态已经很混乱了。墙会过滤一些，负面影响会有，但它也相当于设一个门槛。它不是爱国或不爱国。有些大众它不懂，它不会翻墙。它没有辨识能力，过滤一下。”

“所以有人没有资格接受多元化？”

“翻墙说明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不管翻墙是干嘛，它有一定的能力和思想。很多人不会考虑这件事情。考虑这事情才会翻墙。不是翻墙有能力，墙对它来说实际上没有影响。”

他似乎否定了前面自己说过的话，包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包括“唯物史观”。

《三体》中希恩斯博士和常伟思将军之间的一段对话

“您不想用这个东西，思想钢印，来造就一支拥有坚定信念的太空军队吗？在军队中，你们有政委，我们有牧师，思想钢印不过是用技术手段高效率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而已。”

“政治思想工作是通过科学的理性思维来建立信念。”

“可这场战争的胜利信念，有可能用科学理性思维建立起来吗？”

“博士，如果这样，我们宁愿要一个虽无胜利信念但能够自主思维的太空军。”

“除了这个信念外，别的思维当然是自主的，我们只是对思维进行了一点点干预，用技术超越思考，把一个结论——仅仅是这一个结论——固化在意识中。”

“这就够了，技术已经做到了能像修改计算机程序那样修改思想，这样被修改后的人，是算人呢，还是自动机器？”

“您一定看过《发条橙》。”

……

美国代表：希恩斯博士和山杉惠子博士以自己过人的才华，为人类开启了一扇通向黑暗的大门。

法国代表：人类失去自由思想的权利和能力，与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哪个更悲惨？

.....

希恩斯说：“怎么一提到思想控制，大家都这样敏感？其实就是在现代社会，思想控制不是一直在发生吗？从商业广告到好莱坞文化，都在控制着思想。你们，用一句中国话来说，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大胆说出五千万人受到刘慈欣思想影响的人，是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我们在万圣书园对面一间餐馆里感慨颇多。

刘慈欣博客中提到给他强烈刺激的一篇科幻小说

而现在的中国科幻事业，首要任务是争取读者。同时，在西方，科幻的范畴在急剧扩大，不管愿不愿意，我们必须去接触和欣赏那些新型的前卫的科幻小说。在这里，我想介绍一篇这样的科幻，借以说明自己的想法。

这个短篇叫《耳朵》，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史蒂夫·里斯伯格写的，其中有这样的故事：一名医生给一位怀着双胞胎的孕妇诊断，这名孕妇来自战乱的波黑，目睹和经历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同时她的营养状况很差，两个胎儿只能存活一个。小说的前半部分描写医生给孕妇诊断的细节，平平淡淡，似乎没什么看头，但后来，一个噩梦般的震撼人心的情节出现了：当医生仔细观察孕妇的超声波照片时，看到在营养不良的子宫中，两个胎儿为争夺生存的权利进行着残酷的搏斗，其中一个胎儿正在用脐带把他的孪生兄弟勒死！

这是我读过的最恐怖的一篇科幻小说，它像一把灼热的烙铁，在任何读过它的人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当然，我们可以给小说中加上一些“硬”科学，我们可以解释母亲的精神影响到血液成分，进而影响到胎儿云云，但任何科学解释一在这篇小说中都是画蛇添足，只会削弱它的力量！

从上面已经看到我的科幻观混乱到什么程度，这也可能是中国科幻思潮的一种反映。但目前科幻思潮的这种混乱，更像是一种混沌，宇宙大爆炸后几分钟的那种混沌。希望很快在混沌的时空发生扰动，宇宙开始凝聚，使中国科幻的宇宙中充满灿烂的星群。

（《我是刘慈欣》杜学文、杨占平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

我们提到了这篇让刘慈欣印象深刻的小说。

“这个人为什么对‘零和游戏’有这么强的执念？整个世界都是‘你死我活’的，太狠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底色应该是光明的，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即便彻头彻尾的残忍，也不会像他这么暗黑。一个人是怎么走到这地步的呢？”

“讨论刘慈欣为什么这样，不如讨论他作品影响。你以前哪能想像得出来，中国走到今天，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刘慈欣思想’。”苏里把格局拉得很开。

“它是不是中国的《一九八四》？中国反乌托邦对世界文学的一个贡献。”我们跟苏里聊天，总是能受益于他大格局潜移默化的渗透，“我们理解科幻小说，总是有一个核心，是对科学精神的信仰，这基础之上说‘硬核’的那部分，技术啊能力之类。科幻小说作家，肯定是最相信进步主义、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的那伙人。刘慈欣不相信这些。他觉得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它不大是科幻类型，它更像奥威尔反乌托邦小说的脉络下来，只是奥威尔会提醒《一九八四》，我们这贡献一个完全丛林社会的黑暗世界。都是反乌托邦类型小说。”

“三体有那么一点反人类的意思。”苏里表示认同。

“他这么受欢迎被追捧也蛮有意味。”我们讲了很多现象。

“他至少影响了二十年的人。而且，你看那些捧三体的专著，都是六〇后七〇后写的。他对刘慈欣同时代人的影响确实大。”苏里的书店会提供很多数据。

“您说的研究和接受刘慈欣思想的是哪一群人？”我们其实也注意到那几本书的作者、编辑者和对刘慈欣表示赞同的声音，大都来自于六〇后七〇后，但我们太注目于年轻一代与三体的关系，近乎忽略了这个显著的事实。

“真正要关注的是三体影响的是什么人。我非常吃惊。我注意到这件事是在三年前。如此广泛。很多细节我都记不住了，我看得很早。张笑宇说的，笑宇说，刘慈欣没有思想。三体的思想来源是利维坦。但是，《利维坦》是1651年写的，那时候是什么

时代？霍布斯是要处理什么问题？欧洲要建立民族国家！霍布斯可是有人文关怀的。霍布斯是文艺复兴的儿子，启蒙运动的父亲。”

“刘慈欣就是工具化了的利维坦。”刘苏里为他所观察到的世界做了个总结。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Philippe Mignot](#) on Unsplash

非虚构

了解那个讲故事的人， 他叫卡尔维诺

让 - 保罗·曼加纳罗 | 新书试读

“我不喜欢梦境，我喜欢清醒时的幻想。”

《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一本出人意料的另类小传，作者让 - 保罗·曼加纳罗与卡尔维诺隔空对话、轻盈共舞，独辟进入其文学世界的蹊径。曼加纳罗用配得上卡尔维诺的轻盈笔触与节奏，在这位另类作家的文学世界与人生经历之间自由穿梭，借助信件、访谈及他人的回忆等珍贵资料，对其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导读与解析，耐心编织其创作演变的线索与脉络，以寓言、想象、游戏、童年、历史、政治等拼图，拼出卡尔维诺的迷人形象——讲故事的人。



从表面上看，卡尔维诺的人生经历过一些大变动，说“表面”是因为事实上他自己的立足点从未改变，就像他曾数次远游，但都带着明确的目的：或为工作，或出于各种兴趣。而他的创作似乎有规律地前进着，连续跳跃几下，再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如此来来回回形成了一张网。卡尔维诺穿梭在这张网中，就好像害怕自己有东西忘

了说，就好像担心自己在做选择时太过南辕北辙，尽管他的选择看起来都是斩钉截铁的。于是我们看到，经过几次跳脱之后，卡尔维诺在迟些时候回到了新现实主义的思路，这位作家走进了人生的秋季。

这一转变对他来说势在必行，因为他渴望一个别处 (ailleurs)，一个可以被轻易转化为写作空间的别处。1951年10月到11月间，受《团结报》派遣，卡尔维诺在苏联度过了五十多天。他接受了专栏“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苏联旅行日记”的写作任务，他所写的通讯稿件发表在次年2月至3月的版面上，也为他赢得了圣文森特 (Saint-Vincent) 奖。“他有意回避对苏维埃的现实做一般的意识形态评判，而是着重抓住了日常生活的细节，从这些细节中浮现出一幅积极乐观的画面：‘在这里，社会如同一台巨大的天赋吸收泵：每个人最好的部分……如果有的话，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发……’尽管，从某些方面看来它也有所保留。”

1951年是个重要的年份，还因为它代表卡尔维诺的写作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正是在这一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分成两半的子爵》出版了，卡尔维诺选择用“三部曲”统称构成一个系列的三部作品。

《分成两半的子爵》让我们看到，分裂、切割、无法弥补的裂痕是作者取之不竭的一大灵感源泉，因为它发展出一种“理性神经症”，作用于隐匿在作者精神世界里的两个部分——叙述的意图与写作的渴望——而在这一时期，作者还无力也无法在两个部分之间做出选择。或许正是因为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犹豫不决的个人状态，他才在身处的历史中看清了自己，于是写下了这部关于人的分裂的长篇小说。然而，自写下《小径》以来，最深层的意义还未被触及：如果说在《小径》中，历史与人性未能达成可能的融合，那么这种不可能性在《子爵》中则以善与恶的形式得到了描述，二者化身为本能与理性，这正是存在 (l'être) 所无法回避的状况。在“三部曲”完成后，卡尔维诺一如往常，回过头来为这些作品写了一系列注释和介绍。在英文版的前言中，他“轻描淡写”：

我的第一个短篇 (novel) ……和早期的小故事 (short-stories) 讲述了一些流浪冒险故事，它们发生在战时和战后动荡的意大利。此后，我数次尝试写出“能够反映意大利社会问题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我那时是所谓的“政治介入型作家”），可是我没有成功。后来，1951年（那时我二十八岁，完全不清楚是否要继续写作），我开始用一种对我来说更为自然的方式工作，也就是追随那些我从童年开始就深深着迷的阅读记忆。我不再逼自己创作一本我应该写的书，一本别人期待我写出的小说，我更愿意想象一本我自己会喜欢读的书，一本在谷仓里发现的书，它的作者不详，它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

1960年，卡尔维诺为《我们的祖先》写了两篇介绍文字。其中一篇未曾公开发表，援引如下：

我把三个故事放进了这本书里……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不真实且发生在遥远的年代和想象中的国度。尽管几个故事各自有着其他完全不同的特色，但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特点，它们才似乎构成了人们习惯说的“环” (cycle)，甚至是“一个闭环”（也就是说结束了，因为我不打算写其他故事了）。眼下我应该做个总结，解释我为何写下这些故事，我想说什么，在写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收获了什么。

我开始了。我着手写出三个故事的梗概。我尝试着将机关算尽：每一次有什么东西没算到，我都会觉得没算到的才是最关键的，于是我全部推翻。我想要制定一张当代人类的系谱树 (arbre généalogique)，可是系谱树是神秘的植物，人的特征是经由那些无法预料的组合传承的。我把查理曼大帝的武士出现在先作为借口，将最后写完的《不存在的骑士》排在第一个。我的真实理由是，我尝试用这三个故事重构一种哲学，如果将《不存在的骑士》放在最后，在我看来就是把所有难题都提出来了。由于我自身的性格，也由于我所受的意识形态教育习惯将思考的构建过程再现为一个实证的过程，我想要将《不存在的骑士》放在首位，它是对存在的争取；然后是《分成两半的子爵》，它是对一种完整存在的向往；放在第三位的是《树上的男爵》，以此提出一种并非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方式，即忠于个体的自决 (autodétermination)。

这行不通，我又全部推翻了。这三本书是铭刻在时间里的，与它们的年代不可分割，故事会诞生就是因为我想抓住留不住的东西：这是一段个体的、集体的生命历程中的三个时刻……我又一次全部推翻。我的目标太高了：它们是游戏……

一部作品有诗性生命力的证明，就是作者无法再向其中添加任何一个字，这时一切都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三个故事甚至都没写完。

有人说它们是“哲学童话”，可是启蒙时代的童话作家们写每一个故事时，脑海里都有一个要宣扬的明确主题，哪怕故事是以讽刺形式写就的（在这个脉络里，最后一位了不起的醒世作家是贝尔托·布莱希特）。而我不是这样。写这些故事时，我总是以图像开始，从不是以概念开始。我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如果一个故事在诗性层面讲得好，其中的教诲就会被很好地传达；如果一个故事在诗性层面讲得差，那么其教育作用也差，不管作者的教育本意如何。

有人说我接近那些在英伦唯美主义的边缘开花结果的，写奇幻故事、历史故事、历险故事的作家，比如我所钟爱的罗伯特·史蒂文森。不过，这些作家显然不用在每天早上看到报纸带来的当日新闻时感到紧张。我喜爱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所品尝到的平和，可我是我的时代里焦虑的孩子，我完全不羡慕那些作家。

那么超现实主义呢？可我与潜意识的关系跟超现实主义者们不同。我不喜欢梦境，我喜欢清醒时的幻想。（我们可以确信，潜意识无论如何表达了某种东西。）

或许，要对这些故事进行分类，秘钥就在本书封面上毕加索的作品里。毕加索是个典型的爱幻想的外向型人。他感觉得到漂浮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中的所有忧虑，也发现得了幸福的任何蛛丝马迹。他正在寻找新的符号来表达他的思考与情绪里发生的一切，以及所有人的思考与情绪里发生的一切。

毕加索是告诉我们真相的人吗？是毕加索一次次找到了新的方式——他自己的方式——将真相告诉我们，还是，他固执地要将复杂性还原为单一的模块、某一风格，他反复敲打着同一枚钉子，才从一个有限的世界开始，从简单地清点物品、面孔、风景、说话方式开始，凿穿了真相的金块？

……帕韦泽……在他最后的理论写作中总结过，我们今天无法写出发生在其他时代的寓言故事或奇幻故事。他坚持认为诗意图（用他的话说是“神话”）的出现，需要和时代、地域、欲求及经验紧密相关的形式与符号。在帕韦泽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在我看来，显然，我无法认同他的说法。我那时无法预见的是，距他去世不到一年，我会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

过去我写的东西，帕韦泽总是第一个读的人，这次他或许会赞赏我，我应该认同还是拒绝他的赞赏？可严格如他，我又表示怀疑。不过，我确信，在抛开对客观事物的忠诚之时，我拯救了某种更为本质的东西：一种气度、一道锋芒、一种律动、一种严密，所有那些在抵抗文学中，我们认为事物所固有的，也是人类故事的客观旋律所固有的东西；然而渐渐地，客观性正在重构出一个越来越陈腐且消极的画面、一段失去了冲动的旋律。我写这三个故事，是希望重新找到——并且要保证让它鲜活地在现实中流转——那种同时存在于个体与集体之间、生存与理性之间、自传与历史之间、抒情与史诗之间的张力，它属于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也属于一个意大利文学的时代。而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忠于这个时代。

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堵厚厚的墙。这些岁月外表富足，我们的生活也更加舒适。可是事实上，那是一段艰难的年月，我们时而必须咬紧牙关，时而必须充满希望，时而再次坠入悲观与犬儒，我们也因此为自己筑起了层层防御工事。我们多多少少都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对我们和其他人来说，只有我们成功留下来的东西才重要。对我而言，通过这三个故事，我确信自己将什么东西从曾经的“另一头”救回来了。

我不知道之后会写什么。经验告诉我，宣布自己的创作意图毫无价值。诗性的生产是所有生产中最为物质性的：只有做出来的东西才算数。生产钢铁或者火腿可以有一个理想的配方——统筹。在文学中没有这回事：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能说谎，哪怕出于好心也不能。

十年来，我一直在写现实主义的故事，可总有一天我会写出消极的故事，关于失败的故事。写出此次结集出版的三篇奇幻小说，是因为我感到需要表达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自有乐观的一面，但“不说谎”。

我重读了阿里奥斯托。一直以来，在拥有相同文化传统的诗人中，他让我觉得最为亲近，同时，他的魅力也是最难说清的。他清澈、欢快、不迷信、没烦恼，但他其实又如此神秘，如此善于隐藏自己。阿里奥斯托所写的故事，其悲剧深度远不及后来的塞万提斯，然而，他一贯轻盈而优美的文笔中却带着如此多的伤感。阿里奥斯托，如此善于打造一首首八行诗，让最后两句的韵脚形成讽刺的对位，他的炉火纯青有时让人觉得，写出这么疯狂的作品是因为严重的强迫症。阿里奥斯托，如此热爱生命，如此感性，如此现实主义，如此人性……

他与骑士文学的关系复杂：他看待一切的方式就是进行嘲讽性的改写，但他从不看骑士精神所传达的基本美德，他从不贬低演绎出这些故事之人的观念，尽管他只是把这些故事转译为节奏与色彩的游戏。他这样做是为了从故事里，从产生这些故事却又丢失了这些故事的世界里拯救出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救……

在我看来，骑士小说的作用已经被当代行动小说和历史存在主义的介入小说所取代：海明威、马尔罗……在我开始写作的1945—1946年间，我把他们视为榜样；时至今日，我仍想从他们当中拯救出某些东西，可除了像阿里奥斯托一样，我看不到还有其他可能的态度。

今天我们应摆脱阿里奥斯托，而不是延续他吗？不，他教导我们，智慧来自——甚至主要来自——想象、讽刺、形式的精确。他教导我们，这些品质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构想一个世界，让我们更好地审视人类的美德与罪恶。在已经有了电子大脑和太空漫游的时代，他所教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切实的、必要的。我可以确定，这是一种向着未来，而非向着过去的力量，这种力量激励了罗兰、安热莉克、罗杰、布拉达曼泰、阿斯托尔福……

这个未来也是卡尔维诺本人的未来。留意一下作者在这一时期所关注的文化内容，我们能够发现，除了卡尔维诺在文中提到的作家以外，还有哪些作家为《分成两半的子爵》的写作提供了灵感来源。在开篇描写皇帝未曾来此安营、战役未曾在此打响的那片草原时，我们会发现有几页内容在呼应扬·波托茨基的《萨拉戈萨手稿》，正如梅达尔多子爵和他的马夫库尔齐奥神似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对于分成两半后的两个舅舅与外甥之间的关系的描写，则带有劳伦斯·斯特恩《项狄传》的叙述特色，在书的结尾处，人物重又合为一体的情节也暗中指向了这部作品。梅达尔多先是被分成两半，后来又得到重塑的奇思妙想，使人想到玛丽·雪莱及其笔下的怪物弗兰肯斯坦。人物一分为二、一个想消灭另一个的人物设置，带有流行传奇小说《铁面人》的痕迹。我们会从其他人物的身上——发现霍夫曼、《格列佛游记》《吹牛大王历险记》。此外，故事中唯一具有情色意味的女性角色帕梅拉·马可尔菲身上，结合了南方文学与假想的北方文学，她既让人想到塞缪尔·理查逊，又呼应着朱利奥·切萨雷·克罗齐的《贝托尔多》中的女性人物马可尔法——贝托尔多的妻子、贝托尔迪诺的母亲，集天然的柔情与敏锐的头脑于一身的农家少女。

于是我们也可以重新描绘出一些谱系，而且我们必然会走向《圣经》：卡尔维诺的作品对这样的游戏早有准备，而他本人在邀请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发现那些似乎已经亡故的作品时，也是在推动我们走向《圣经》。如童谣般永不枯竭，正是卡尔维诺作品所固有的品质。更神奇的是，我们发现在这些作品中暗藏着卡尔维诺本人的痕迹。对此，我们可以举“外甥”为例。我们不知道外甥的名字。在每个人名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指向意味的网络中，这个外甥如同《通向蜘蛛巢的小径》里的皮恩再世，他不活在故事所提到的任何一个地点，却又活在每一处，他知晓所有人和事，去四处满足好奇心。这个纯朴正直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分成了两半，他需要以扫(Esau)才能恢复完整。他的另一半让他在一个神秘的洞穴里认识了丑恶，这个洞穴与蜘蛛巢十分相似，他们在里面玩骰子，就像在《伊利亚特》中，涅斯托耳(Nestor)发明了一些游戏来忘记战争意味着死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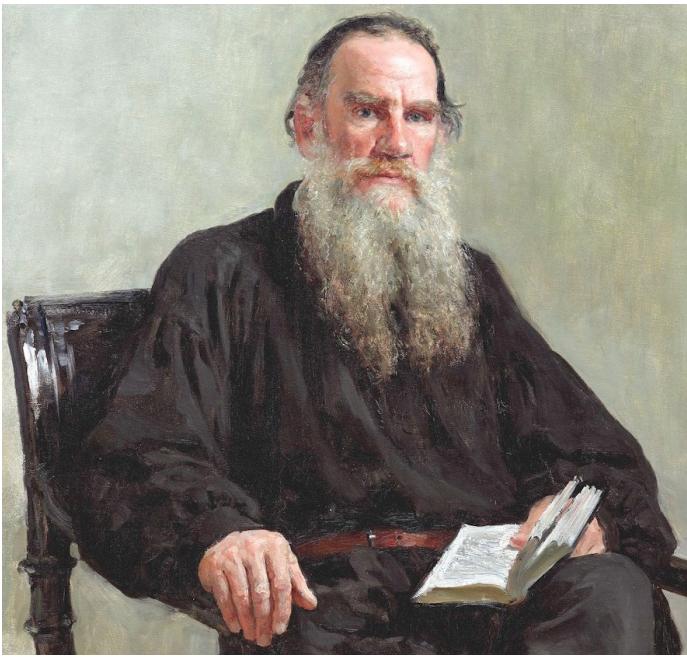


让 - 保罗·曼加纳罗

里尔三大讲座教授，意大利作家嘉达和卡尔维诺的译者，著有关于嘉达和意大利戏剧的多篇专论，代表作品有《那不勒斯的十二个月：一张面具的梦境》和《巴洛克与工程师》。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 *Ilya Repin, (1887) Portrait of Lev Tolstoy*

非虚构 那一夜， 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帕维尔·巴辛斯基 | 新书试读

通过托尔斯泰的离开，
追溯他的一生。

“我数了下脉搏，97……我一夜没睡，决定一早离开。”1910年10月28日，凌晨3点，82岁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随行的只有他的私人医生马科维茨基。

寒冷的深秋夜晚，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要赶在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醒来之前离开。这一仓促之举托尔斯泰足足等待了25年。从那一刻起，围绕着他的行踪及随之而来的死亡，衍生出种种谜团和传说。

自称“一生都在研究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当代作家帕维尔·巴辛斯基，严格筛选日记、书信、电报、访谈、回忆录、报刊文章等海量一手材料，以充满悬念的写作手法，焕新素材，一步步重建托尔斯泰的行踪，并通过托尔斯泰的离开追溯了他的一生：从他的青年时代、他的婚姻、他的精神动荡开始，直至他的家庭悲剧，他遗嘱透露的秘密……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列夫·托尔斯泰：逃离乐园》的第一章《离家出走》，分享给读者。



我们有理由相信，托尔斯泰对他出走的后果心知肚明：他不可能悄然成行。《活尸》中费佳·普罗塔索夫这样的人物，装个自杀身亡都能掀起轩然大波，何况名动天下的托尔斯泰伯爵！除了《活尸》，他创作的《谢尔盖神父》《费达罗·库兹米奇老人的临终书简》等杰作都牵扯到这方面的话题。如果说他做过这方面的考虑，那他最有可能的想法是：融入芸芸众生之中，将声名的负累抛诸九霄云外。无论过去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沙皇也好，无所不能的奇迹大师也好，声名远播的大作家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风中的一粒流沙，人海中的一抹微澜，普通到如同尘埃。

托尔斯泰身披普通农民才穿的那种缩腰棉布外套，外罩一件粗呢大氅，头上戴一顶陈旧的编织小帽，枯坐在车棚内侧那个旅行箱上。梦想之旅就要变为现实，他全身心沉浸其中，已然无暇他顾。问题出在时间上：凌晨5点，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俄罗斯最难熬的10月，裹着阵阵砭人肌骨的清寒，为这次仓皇出逃式的旅行平添了几许悲怆。园篱已闭，家邦未远，雅斯纳雅·波良纳还在脚下，征马还在槽前，可回家的路已然斩断——这种悬而未决、进退维谷的状态，最难忍受。而他的妻子——那位与他相濡以沫58载，为他生过13个孩子，将存活下来的7个子女抚养成人并繁衍出23名后代的妻子；那个一肩挑起雅斯纳雅·波良纳的风雨，将偌大一处产业经营得井井有条的妻子；那个在他的每部著作中都倾注过巨大心力，为他抄写手稿，装饰版面，给他的文字加工润色甚至整段整章代他捉刀，就连他最主要的两部小说都留下了她的斧凿之痕的妻子；那个9年前当他偶感风寒命悬一线，淹蹇克里米亚旅途中时，曾经彻夜不眠不休看护他，尽外人难尽之责的妻子——就要睡醒了。当她在黑暗中睁开双眼，看到的只是紧闭的房门和抖得乱七八糟的家当，她一下子就会明白过来：最可怕的噩梦，发生了；那个她最在意的人，走了！

走得了吗？如果此时此刻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骤然出现在车棚里，逮着丈夫正给马上嚼子，一双手兀自抖个不停，连绳头都拿捏不稳，那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即使没有天才想象力，你也不难想到，当下要上演的，肯定不会是托尔斯泰式的温情剧，而是果戈理式的闹剧了！怪不得托尔斯泰对果戈理的小说《马车》毁誉参半，意见多有保留。小说中小县贵族皮法戈尔·皮法戈罗维奇·切尔塔库茨基为了逃避应酬，居然躲到了车棚里；最后不仅被逮个正着，还闹出了一场笑话。他认为这篇小说矫揉造作、牵强附会，穿插的笑话不少，引人发笑的地方却不多。省长上门，还得去车棚里翻找主人；再说主人隐藏得也够深的：瘦小的身子骨龟缩在什么坐垫上，头顶着一大块皮具。命运之神光顾车棚，里面的人却毫无思想准备，弄了个灰头土脸！

萨莎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开始父亲还不停地催促车夫，后来退到车棚一隅，坐在旅行箱上，惴惴不安地呢喃：我感觉他们要追出来了。这下好了，不闹出点事，咱们是脱不开身了。”

托尔斯泰的弱点

直到逃跑的那一刻，托尔斯泰依然故我，表现出性情中温良敦厚的一面。作家、哲学家、“性情圆熟的老大人”，托尔斯泰还是一身俄罗斯旧贵族的风范，传统美德在他的身上表露无遗。这些美德如璀璨的钻石（可惜湮没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折射出诸多人性的光辉：从身体到灵魂，讲求自洁自律；人前不说假话，人后不说坏话；谨言慎行，避免伤害他人感情。托尔斯泰年轻时狂放不羁，做过许多失检悖德且与家庭教养背道而驰的荒唐事，为此他一直愧悔不已。比及老年，托尔斯泰在懿德日隆的同时，性格中嫉恶如仇的一面日益凸显，受不了秽行污迹、流言蜚语。

在处理与夫人索菲娅之间的龃龉摩擦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的做法可谓无懈可击。他怜悯她，爱护她的令名，即便明知她的想法、做法有欠缺，也不会在任何场合指责她；他委曲求全，对她不合理的甚至是荒唐的要求，都尽力满足；他忍受夫人的各种小脾气，而不小的脾气比方以自杀相要挟等，他也忍了。他的宽容，有时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连他身边的人都觉得看不下去，但这不是首鼠两端、不讲原则。恰恰相反，这是一位注重操守、德行高迈的老人，为了息事宁人，一次又一次做出的让步和牺牲。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做出了离家出走的事；而对于索菲娅来说，这才是莫大的打击。如她本人在日记中所写，这不再是插在胸口的刀子，而是兜头砍下来的斧子！

所以，车棚里的托尔斯泰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恐惧。害怕索菲娅半夜惊醒，察探到情况后一直追出来，将他们一网打尽……到时候夫妻同室操戈，冷脸相向，一场

令人痛彻心扉的争执，在所难免；其实不用添这个乱子，雅斯纳雅·波良纳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够热闹的了。

无论情形有多危难，他从来都没有闪避过……他把一切磨难都当作上帝对他的考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承受来自各方的打击。可这一回，他承受不住了。他强烈希望好运能降临到他的头上，帮助他躲过眼前的一击。

他身心俱疲，已经无力担当。

是的。出走体现的不仅是托尔斯泰性格中勇敢的一面，也有怯懦的一面。关于这一点，他在给故交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施米茨——虔诚的新教徒和坚定不移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昔日上流社会的名媛，今日寄居 60 俄里外奥乌辛尼科沃一间小屋中的托尔斯泰崇拜者——的信中抖落得一清二楚。托尔斯泰骑马外出的时候，经常顺路看望她一趟。因为他很清楚，他的造访不仅给她带来快乐，也给她带来了人生的意义。10 月 26 日，就在离家出走前两天，正在他举棋未定、心神烦乱的时候，他还向她提起过自己的忧虑。玛丽亚当时的态度是完全赞成：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她嚷道，“你只是一时软弱，过后会好的。”

“你说得对，”他附和道，“一时软弱。”

这段逸事连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说过的原话，一并收录在塔季亚娜·利沃芙娜的日记中，有案可稽。不过在当天陪托尔斯泰散步的马科维茨基的日记中，见不到有关这次对话的任何记载。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后来面对《俄罗斯导报》的采访时也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那天没提起出走的话题，“没有吐露片言只字”。

出走体现的不仅是托尔斯泰性格中勇敢的一面，也有怯懦的一面。

10 月 26 日当天，马科维茨基也发现“托尔斯泰很虚弱，注意力很不集中”。在去施米茨家的路上，托尔斯泰还干了一桩“坏事”（他本人的措辞）：骑马蹚过麦田。这个季节里地面潮湿，马踏过会留下深深的蹄印，破坏庄稼。

舍不得践踏麦苗，却舍得践踏老妻？！很遗憾，托尔斯泰的思维就是如此。那些同情托尔斯泰，认定他的行为体现了人生至性而与家庭伦理无关的人，也持这样的态度和观点。托尔斯泰摆脱了思想境界不在一个层面的妻子，可以理解，天才就是这样；至于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要说可怜是有那么一点，但这就是嫁给天才的代价。

这就是对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这一事件的普遍看法。这一看法也在俄罗斯文化圈内大行其道，这与伊万·布宁这名吹鼓手吹出的风不无关系。

为了寻找最后的归宿，托尔斯泰离开了自己的家；一代思想的巨人，终于摆脱了物质生活的羁绊。“托尔斯泰的解放”，多么壮美的结局！也有不大中听的说法：托尔斯泰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找一块无人知晓的角落迎接自己的末日；恰似嗅到死亡气息的猛兽，逃出笼子，奔向原野。托尔斯泰出走没几天，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就出现在亚历山大·库普宁主办的刊物上。

托尔斯泰的行为，并非意蕴丰富的壮举；更遑论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最后做的什么“困兽之挣扎”。这是一位 25 年前就动念离开家庭，只因顾念妻子的情面而宿志未酬的老人，耗尽心血之后才踏出的一步。在生命力渐渐消失之际，家庭矛盾却愈演愈烈，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看不到家庭的出路。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踏上了颠沛流离之路。他选择的时间也不适合出行：10 月的末尾，凄冷潮湿，面临的是蚀骨的冬日酷寒；在支持他出走的家庭阵营中，除了萨莎，谁都不知道他此行抱着什么目的，他所说的“彻底离开”是什么意思。跨出家门意味着死亡，但托尔斯泰还是选择了出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自己的庄园里，他已经待不下去了。

离家出走，原为一心赴死？这是多次奔赴雅斯纳雅·波良纳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提供手术服务的著名产科医生维·费·斯涅基烈夫教授所持的观点。此人不仅医术精湛，且智慧超卓，极具修养。托尔斯泰去世后，索菲娅饱受物议。在不少人的眼里，她是将丈夫逼出家门的不良之人，是托尔斯泰之死的幕后推手。为了安慰这位不幸的贵妇人，斯涅基烈夫于 1911 年 4 月 10 日复活节礼拜日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分析了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原因，并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托尔斯泰的出走属于自杀综合征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想加快死亡的进程。

“毕其一生，他都以自己强健的体魄与非凡的禀赋为依托，将肉体与精神锻冶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他的一切行为都达到了灵肉合一的完美境界，要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那是不可能的事。看看他的举手投足、坐卧起行，处处体现着个人的意志。

换一种说法，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样作为都经过深思熟虑，体现某种用意，传递某种思想……死亡既是肉体的毁灭，又是灵魂的消亡。对于灵肉浑然一体的人来说，灵魂出窍本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法做到平心静气、安之若素……对于即将飞升天堂的灵魂来说，摆脱一身皮囊的羁绊，总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其二，从纯医学角度出发，斯涅基烈夫将托尔斯泰的死归咎于肺炎。“这种病的可怕之处，还在于能导致狂躁等并发症。”斯涅基烈夫在信中写道，“如果把托尔斯泰连夜出走的行为与肺炎潜伏期病人的临床表现联系起来，笼罩在这一事件上的重重迷雾就都会散开——急不可耐，在家门口迷路等，不可能发生在一个健康人身上。”

换句话说，托尔斯泰出走之夜，肌体已感染病毒，大脑受到损害。

斯涅基烈夫的一番话中，科学的成分和存心安慰伯爵夫人的成分各占多少，此处不便置喙。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托尔斯泰出走前夜精神状态极差，身体也不大好。马科维茨基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托尔斯泰也在日记中写道：他一夜“噩梦”连连，梦到跟妻子“争斗”；有些梦乱得理不出头绪，他当时在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居然出现在他的梦里，不过换上了业已作古的熟人的面孔，如尼·尼·斯特拉霍夫。

出走前不到 1 个月时间内，托尔斯泰一度发病，与死神擦肩而过。10 月 3 日，他全身抽搐，双手乱刨乱抓，表现与濒死之人极为相似。时任托尔斯泰秘书的瓦连京·布尔加科夫回忆当时的情景，写下这么一段文字：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睡着了。直到 7 点钟还不见他醒来，大家只好开饭。舀完汤，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起身察看了一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动静，回来的时候说，当她走近丈夫的卧室时，听到房间里传出擦火柴的声音。她推门进入屋内，看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坐在床上；看到她进门，还问了时间，问大家有没有吃饭。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老人的眼神有些异常：

“两只眼睛暗淡无光，没有一点生气……这是发病的征兆。一旦出现这样的眼神，我就知道他又要昏过去了，这种情况以前就出现过多次。”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儿子谢尔盖利·沃维奇、侍女伊丽莎白·瓦西里耶维奇、马科维茨基、布尔加科夫、托尔斯泰传记首席作者巴·伊·比留科夫一起赶到老人的房间里。

老人仰躺在床上，右手在被子上摸来摸去，5 根指头屈曲虬结，仿佛握着一支羽管笔。他紧闭着双眼，眉毛拧成一团，两瓣嘴唇不停地颤抖着，看上去非常难受……然后……然后托尔斯泰开始抽搐，他横在床上的躯体抖索索，战栗不休，两条腿整个失去控制，直挺挺伸在被子外面。杜尚抱住老人的双肩，我和比留科夫为老人捶腿。老人前后抽搐了 5 次，其中第 4 次最为严重：他的头从枕头上滑了下来，身子在床上打了个横，一双腿耷拉到另一侧床沿的下面。

索菲娅跪倒在地板上，将丈夫的腿抱在怀里，一张脸贴在腿上。她一直跪在那里，直到我们将老人的身体扳转到床上睡好。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吓得不轻，令人心生怜悯。我亲眼看到她仰望着天花板，一只手慌乱地画着十字，嘴里喃喃祷告着：“上帝！这一回别让他走！这一回别让他走！”而这一切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我在打字室偶然撞见的。

抽搐过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开始说胡话，数一些互不关联的毫无意义的数字，症状跟阿斯塔波沃发病时的情形完全一样：

“4、60、37、38、39……”

“托尔斯泰发病期间，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反应强烈，令人动容。”比留科夫在传记中写道，“她受到了惊吓，张皇失措，楚楚可怜。当时在房间里的男人都聚集在床的周围把持托尔斯泰，防止他抽搐时从床上摔下来；而她跪在地上不停地祷告着，翻来覆去念叨一句话：‘上帝，可怜我，原谅我的罪过！不要让他死，是把他害成了这样！保佑他熬过这一回，不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走！’”

这是一位 25 年前就动念离开家庭，只因顾念妻子的情面而宿志未酬的老人，耗尽心血之后才踏出的一步。

托尔斯泰发病时，索菲娅确实有过负罪感，她本人的日记中也有述及：

“抱着丈夫那两条战栗不休的腿，对失去他的担忧，使我深感绝望。愧悔自责、狂热的爱情和祈福的话语，如滔滔江河，在我的心头奔涌。只要他能活下来，让我有机会修复由于自己的过激行为给他造成的伤害，使我良心稍安，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此事发生前不久，索菲娅跟萨莎、费奥克利托娃有过一次大吵，并事实上将女儿逐出了家门。萨莎回到与雅斯纳雅·波良纳相距不远的契里亚琴卡，她自己的家就在那里。托尔斯泰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萨莎跟他走得最近，是全部子女中他最宠爱的一个。这个女儿对他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堪与布尔加科夫等量齐观。母女交恶是托尔斯泰发病的原因之一，对此索菲娅和萨莎心照不宣；所以灾难过后的第二天，她们就讲和了。

萨莎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走进前厅，我就听说母亲在找我。

“她在哪里？”我问身边的人。

“在门廊里。”

我走出前厅，看到母亲穿着一件长裙，站在台阶上等我。

“你愿意跟我说话吗？”

“愿意。我还要向你道歉，对不起！”

她抱住我，一面亲吻一面念叨：“对不起！对不起！”我也吻了她，试图用温言软语安抚她的情绪。

我们站在门口说着话。有人从我们眼前走过，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我感到不大自在，请求母亲进屋再谈。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只是为了响应死亡的召唤，为自己寻找归宿——这是否是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谎言，一则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一点值得怀疑。站在托尔斯泰本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境况，他出走的动因，也许正是为了求生，为了躲避抽搐而死的命运。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的行为使老人的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云翳，伦理观念的煎熬和恐惧夹杂在一起的云翳。马车渐行渐远，恐惧随走随消，离乡背井的托尔斯泰，良知的声音却一直在耳边回响。

马科维茨基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行驶离家门，穿过村子，踏上通往远方的公路。托尔斯泰一路“沉默寡言，神色黯然，情绪还不大稳定。他断断续续地嘀咕着一些道歉的话，似乎对抛下索菲娅心有不忍”。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去哪里？”

当他们登上火车，在一间单独的二等车厢中坐定之后，火车启动了，他知道索菲娅再不会追上来，一时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说了一句话，说他很好。不过好情绪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大家热完咖啡，刚喝下不久，托尔斯泰又念叨起来：“不知道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现在怎么样了，我可怜她。”

这是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里打不开的心结，一直折磨他到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对晚年托尔斯泰伦理道德观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无法摆脱良心的谴责。不畏不避，将压在自己肩上的十字架背到最后一步，这是托尔斯泰观念的基石：可他的出走行为，分明就是推卸这个责任。声称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是寻死，是为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为了释放不死的灵魂，就他 25 年素怀的愿望来说，持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愿望和现实是两回事，注重伦理的人，不会为一己之私牺牲他人的利益。

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到夏莫尔金，托尔斯泰还有机会改变初衷，折返家园；但他并没有回心转意，而是不断地催促旅伴，在离家的路上越走越远。当时他已经骑虎难下，内心深处经受的煎熬，只有他自己知道。

托尔斯泰当时的心态，从他写给妻子的三封信可见一斑。第一封是告别信，他着重强调了离家出走的道德原因：“我已无法忍受这种奢靡的生活，唯望跟别的老人一样，避开尘世纷扰，独自度过余生。”

这封信字里行间渗透着托尔斯泰对妻子的爱惜之情。他写道：“谢谢你 48 年的忠诚陪伴，并请原谅我的一切过失；如果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也一并表示谅解。”

这封信情真辞切，扣人心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考虑到有可能公之于世，托尔斯泰在这封信上下了不少功夫，起稿三次，字斟句酌，可谓用心良苦。这封信是托尔斯泰留给妻子的“精神遗产”，她完全可以拿出来向世人展示，借以剖白自己（事实上她也这么做了）。托尔斯泰此信之大旨，无非是撇清妻子与他出走这件事的干系：

他只想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而不是要摆脱她；贵族生活与他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他已经过不下去了。

也许托尔斯泰的心里还暗藏着一段机宜：有这封信充当挡箭牌，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心下稍安，不会再抓住他不放，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并做出有伤体面的事。后来得知妻子痛不欲生，几次三番要投湖自尽的消息，加上妻子雪上加霜的来信：“亲爱的列沃奇卡，快点回家来吧！别让我第二次自杀！”——他知道，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他也走不出妻子的阴影。他于是决定敞开胸臆，将第一封信中未予明确表达的意思说出来。

托尔斯泰写于夏莫尔金的第一封回信用词相当尖刻，最后并没有寄出去。“我们现在见面有害无益，这层意思我在第一封信中已经做了明确表达。众所周知，亦如我所想，我见不见你，更遑论回不回雅斯纳雅·波良纳，跟你自杀没有任何关系！”

正式发出的信措辞温婉多了：“我理解你悲痛欲绝的心情，我也知道你不会真正跨出那一步。这跟你是否遵从我的意愿，是否满足我的要求无关，是你淡泊宁静、理智平和的人生观不允许你走极端。没有这些，我们多少年的共同生活就无从谈起。以你目前的状况，我再回到你的身边，这无异于放弃生活。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举动。再见，亲爱的索菲娅，上帝保佑你。生命不是笑谈，我们不能肆意践踏；生命的意义，不是用时间的长短来度量的。我们剩下的日子，也许比度过的岁月加在一起还重要；让我们善自珍重，过好余生。”

只为不死在家里，托尔斯泰才选择了出走？如果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对丧失自控能力和大脑意识的荒唐死法的恐惧，完全等同于对自杀的恐惧，那他选择走这条路就是合情合理的。

托尔斯泰不想死得这么窝囊，他想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他来说，这比摆脱贫族生活的樊篱，实现融入大众行列的愿望来得更强烈。

在夏莫尔金，当萨莎问及父亲对抛下妻子不管的行为是否有过歉疚时，托尔斯泰反问道：“在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谁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贵族生活与他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他已经过不下去了。

托尔斯泰在跟自己的妹妹——夏莫尔金修道院的修女玛丽亚聊天时，曾经对自己的行为做过详细解释。当时在场的还有另一个人，玛丽亚的女儿——带有列·尼·托尔斯泰外甥女兼亲家双重身份的伊丽莎白·瓦列里亚诺芙娜·奥勃良斯卡娅（列·尼·托尔斯泰的女儿玛莎嫁给了伊·瓦·奥勃良斯卡娅的儿子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奥勃良斯基）。伊·瓦·奥勃良斯卡娅身后留有一部关于母亲的回忆录，1910 年 10 月 29 日发生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修道室中的谈话，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他身心两方面经受着怎样的磨难，一眼就看得出来……谈到他最近那次病情发作，他说：“再有这么一次，我性命不保。就这样死去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没有意识，感觉不到肉体的痛楚。但我想清醒地死去。”

说到这里，他哭了……妈妈说出了自己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她说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也有病。他思忖片刻，说道：

“是的，是这样，但我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是要花大气力的，这个我没有，我只能一走了之。现在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开启新的生活。”

托尔斯泰的话一经他人特别是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亲属转述，难免会变味，需要援引大量资料，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比对，探幽烛微，去伪存真。即便托尔斯泰本人，也不一定能洞观全局，了解事实真相。下面这段话出现在他本人的日记中，记录时间即在 10 月 29 日他与妹妹的谈话之后：

“一直在想办法摆脱我和她之间的困局，实在又无法可想。无论如何，办法总是有的，但不一定是你想到的。”

深入民间

从托尔斯泰出走之日起，各大报纸即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报纸如此诠释托尔斯泰的动机：他走出贵族之家，旨在走进民间，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一言以蔽之——追求平民化的简朴生活。

这个观点在苏联时期大行其道，成为压倒一切的官方声音。专家学者穿凿附会，给托尔斯泰的行为贴上冠冕堂皇的政治标签：他用实际行动，向自己的阶级发出挑战；但是，由于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高度，他只能走带有浓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民粹路线；简而言之，就是希望通过此举，与群众打成一片。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宁的一句话，给这位已成冢中枯骨的伟人戴上了一顶红色的帽子，他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无比，围绕他的种种争鸣至此尘埃落定。剥去时代强加上去的政治外衣，平心而论，这一解释比无端生发出来的论调，诸如“逃亡说”更接近事实真相。到民间去，与普通民众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托尔斯泰素怀的梦想。当他抛开一切负累，在基辅大道上踽踽独行的时候；当他孑然一身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田间地头，混迹于辛勤劳作的农民当中时，他不再是身份高贵的伯爵，而是浩浩荡荡的朝觐大军中一位毫不起眼的“农民大叔”，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深处充满感动和愉悦。他的足迹遍布雅斯纳雅·波良纳、科奇塔、皮罗戈夫、尼科尔斯科耶以及邻近村镇的各个角落，每到一地，他都要找长者攀谈，且一拉起家常就是数小时。与农民促膝比肩度过的时光，托尔斯泰奉若珍宝，是他记忆宝库中最重要的财富。

迨至 20 世纪，托尔斯泰的“简朴化”沦为知识分子圈内的笑柄。大家借题发挥，编造出许多与之相关的笑料：“伯爵大人，马拉犁展览完了吗？现在能不能拿回去？急等着耕地呢！”事实上，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搞过装潢门面的那一套，耕地，刈草，收割庄稼，他不仅身体力行，还时常训导孩子参与农事（响应最积极的，当数他的女儿们）；当然，具体做活儿上他有不到位的地方，但这无关宏旨。这是托尔斯泰修身治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开这一切，晚年托尔斯泰就无从谈起。一位伟大的哲人，一位世不二出的天才艺术家，平静地走进民间，衣衫褴褛，与民同耕，这体现了人性非同寻常的一面，其意义不亚于仰观金字塔，俯瞰荒草冢。这位伟人的精神遗产不需要“翻译”，因为其光熠熠，足以烛耀整个世界。他的思想高翔于狭隘的俄罗斯贵族圈之上，体现的是全人类的价值。他用自己的双手，践行着圣教大义：“从满脸洒落的汗水里，寻求果腹的食粮。”

“……灵魂至圣至洁的作家——与我们同行……”托尔斯泰八十寿诞纪念活动中，亚历山大·布洛克在《俄罗斯上空的太阳》一文中写道，“我常想，只要托尔斯泰活着，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们的天空永远不会黯淡下去。伟人用自己的双肩，担起天下道义，以一己之智慧，支撑我们的国家，哺育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世间还有坚不可摧的东西……只要托尔斯泰活着，一把大胡子上挂着一缕晨曦，吆喝着他那匹白马，翻起露珠滚动着的大地；而值此一刻，吸血蝙蝠已然归巢，感谢上帝！托尔斯泰走过原野，恰似太阳从天边升起。有朝一日夕阳西坠，最后一位天才舍身而去，托尔斯泰宾天，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番话写在托尔斯泰撒手人寰前两年，竟至一语成谶。夕阳——舍身而去——宾天，布洛克看到的，正是托尔斯泰的晚景。不过他没有看到，托尔斯泰“舍身而去”“宾天”的事都发生在晚间，正是“吸血蝙蝠”最活跃的时段。看惯列宾名作《扶犁的托尔斯泰》的布洛克，对托尔斯泰之死不可能想得太远。

布洛克还不知道，托尔斯泰起初并没有起意远行，搞不辞而别，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一套。他选中的是一间农舍，与自己的家相去不远……

19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1 日，图拉省的一位农民，也是托尔斯泰的熟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曾经登门拜访。他们俩 1895 年在莫斯科相识，当时 26 岁的诺维科夫在军部当书记员。一个同情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对托尔斯泰主义产生兴趣，颇有几分逆风而动的味道，这在当时的俄国鲜有其例。托尔斯泰对这位热情洋溢、无所顾忌的年轻人印象殊深，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这次来访做了记录，其间还夹杂着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他给托尔斯泰讲了军方处置的一宗案例，说是雅罗斯拉夫附近处决了几个科尔津金厂里的工人。托尔斯泰认为这是谣言，警告他不要以讹传讹。未出数月，这个年轻人即遭逮捕，不过罪名不是窃窃军方机密，而是在私人书信往来中对国家“首脑”——尼古拉二世的个人品质妄加非议，这情形和差不多半世纪后发生在苏联的一幕何其相似：他跟索尔仁尼琴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这一场风波过后，诺维科夫被贬为庶民，守着一块薄田艰难度日。农闲时节，他也写一些散文杂感聊以自慰，与托尔斯泰偶有谋面。十月革命后，这个人给斯大林、高尔基写信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生计艰难的问题，结果又一次遭到逮捕，1937 年被执行枪决。这个狂放不羁、胆大包天的农民，其实有着一颗精明睿智的头脑和一双勤劳能干的手；他是尝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甜头，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点滴积累家庭财富而养活一

大家子人的新农民中的佼佼者。

暮年托尔斯泰指望的，就是这个人。

与农民促膝比肩度过的时光，托尔斯泰奉若珍宝，是他记忆宝库中最重要的财富。

10 月 20 日，这位小农场主跑到托尔斯泰家里，宾主相谈甚欢，耽搁了一点时间（诺维科夫言语间还对托尔斯泰表达了不满，抱怨他不来自己家做客）。农夫提请主人留他过夜，说是怕在路上碰到喝醉的流浪汉；主人如他所愿，将他安顿到马科维茨基的房间里休息。他躺下不久，托尔斯泰突然走了进来。诺维科夫睡眼朦胧，一开始还以为看到的只是梦境，“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听不到一点声响”。此次雅斯纳雅波良纳之行，托尔斯泰的精神面貌给诺维科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气色很差；我一看到他心里就直犯嘀咕，如此孱弱委顿的一位老人，苟延残喘尚属不易，又是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到处游走的呢？”托尔斯泰在床边上坐了下来，对诺维科夫开诚布公地讲起自己的心思。那一夕夜谈的内容，在前不久出版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诺维科夫的回忆录中有所披露。在凡夫俗子眼中，托尔斯泰当夜说过的话有些不可理喻。不过别忘了，托尔斯泰的谈吐一向因人而异：与农民交谈，他使用的是民间语言；哈莫夫尼卡那次与高尔基的邂逅，托尔斯泰就是用村夫野老的口气进行交流的，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高尔基是“货真价实的民众”。

“当然，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能发那么一点脾气，哪怕吼两句，跺几下脚，我的妻子也许就会温顺一点，变得跟你的妻子一样听话。”托尔斯泰说，“可我素性软弱，生怕闹出一点乱子，家宅不宁，声名远播。只要冒出一点家庭矛盾的苗头，我总是归罪于自己，觉得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觉得，不让爱我的人受一点委屈，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无论谁对谁错，最后让步的总是我。”

“他每次跟我说起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总离不开沉重二字。”诺维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去托尔斯泰家做客，显然不止一次——“他总说自己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没有尽到用自己的双手获取劳动果实养家糊口的义务。”

毋庸置疑，他的家人不会把他看成“游手好闲的人”“寄生虫”。虽然他放弃了部分作品的版权，但 1881 年前完成的著述，版权统归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所有（《童年》《少年》《青年》自传三部曲、《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创作的里程碑式文学作品，均在其列），给家庭带来的收益相当丰厚。至于诺维科夫，他大概也不作此想。托尔斯泰之所以离家出走，全是他本人满脑子的农民意识在作怪：在他看来，不跟泥土打交道，不出力不流汗，那就是地里的寄生虫。

“在这个家里，我的日子过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决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这样就没人找得到我了。也许我会钻进你家的小屋里等死，不过我知道你们家人会给我脸色看的。流浪汉走到哪里，都没人喜欢。这种事，我在你们农民家里见得多了。你看，我现在成了这样子，干不了活，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人老了都爱唠叨，一天到晚碍手碍脚。”

“我强行压制着情感的洪流，不让眼泪流出来……”诺维科夫写道，“让这样一位伟人在我的面前敞开胸襟，吐露肺腑之言，我有一种汗颜无地的感觉。我的心里又充溢着无边广大的幸福：作为一个人，他忘了我们地位有别、身份悬殊，将自己软弱的一面与苦闷彷徨展示给我看，坦坦荡荡、无遮无掩；我崇敬他，爱戴他，追随他的左右，与他这些美好的品质不无关系。我亲爱的大爷，此时此刻，让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最后一段日子，我于心何忍？”

诺维科夫的记录相当真实可信。不过托尔斯泰说这番话的时候，语中颇带谐谑自嘲的成分（农民会骂他可怜的流浪汉），无非是他对简单纯朴的“老农民”开的又一个不痛不痒的玩笑。有证据表明，托尔斯泰曾经跟女儿萨莎提到过这桩逸事，说的时候还有点忍俊不禁。

为信的事，我到客厅里找他。他一看到我，马上乐呵呵地笑起来，带我先到书房，再到卧室。

“快走，快走！我给你讲个秘密！天大的秘密！”

我跟在他的身后一路前行。看着他欢喜雀跃的神情，我也轻松了许多。

“看我都干了些什么！我跟诺维科夫讲了一点咱家的境况，诉了一下自己的苦，说是准备去他家里养老，这样大家就找不到我了。你猜诺维科夫说了什么？他说他嫂

子是个酒鬼，每回闹得太不像话，他哥哥都会倒扯着她的两条腿，在院子里转那么几圈。这么稍微修理一下，嫂子能乖好几天。”

说到这里，父亲开心地笑起来……我也哈哈大笑着，给他讲了另外一件趣事。我们的车夫伊万有一回接送奥尔加，她问起咱们家最近的情况怎么样，他回说不太妙，然后转身发表了一番宏论：“伯爵夫人，我说得不对的地方，您请原谅。咱们那个家呀，还真得学学老农民那一套！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一天一顿，风调雨顺。婆娘就得这么整！”

笑话不能当真，不过折射出了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家庭气氛。

托尔斯泰日记中对这次晤面的记录非常简略，只有寥寥数句：“米哈伊尔·诺维科夫到访，聊起许多。他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农民。”

托尔斯泰知道，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随时都有可能拿走他的钥匙，打开抽屉检查他的日记内容，所以下笔越来越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空洞了。为了对付无孔不入的夫人，他甚至启用了一本“私密日记”，专供自己一人使用，平时藏在靴筒中。10月24日的正式日记中有一条记载“小日记丢失”，即指此事。其实小日记并没有丢失，是托尔斯泰夫人从靴子里翻找出来，拿回自己的房间了。据她讲，有一次她不小心将床单扯到靴子上，结果……私密日记是怎么发现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上空阴云密布，托尔斯泰夫妻关系已相当紧张。萧墙有隙，家仆和附近的农民都引为笑谈。列·尼·托尔斯泰的出走有多方面原因，而这些“笑话”正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远避诺维科夫家终老残生，这可是托尔斯泰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在10月24日写过这么一封信：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关于你临行前我交代过的事，现另提几点请求。如果我决意起行，您能不能在村子里给我找一间房子；再小都不要紧，暖和点就行；另外最好是独房，少给你们添麻烦。还有，如果我给您拍电报的话，请注意落款署的是化名，托·尼古拉耶夫。

盼复。握手！

列夫·托尔斯泰

又及：信中所言之事，勿外泄。

显而易见，托尔斯泰一直没有开玩笑。他在这封信中首次提到的化名，在此后不久离家出走的短暂旅程中，一直为萨莎和切尔特科夫所用，以便瞒天过海，蒙骗索菲娅和报界人士。那位一度气壮山河，公然叫板俄国强势人物，连写给沙皇本人及权焰熏天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都不屑于使用假名的托尔斯泰，这一回变成了托·尼古拉耶夫！

他忘了我们地位有别、身份悬殊，将自己软弱的一面与苦闷彷徨展示给我看，坦荡荡、无遮无掩。

收到这样的信，诺维科夫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拿出农夫的架势，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华宅里神侃是一码事，窝藏托尔斯泰这位世界级大师则是另一码事，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犹豫了。一时的优柔寡断留下巨大的遗憾，我追悔莫及。”诺维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等了我两个晚上，认定我不会明确答复，不会给他提供栖身之地，最后决定去南方，投奔别的熟人。当我的回信辗转送达他的手上时，他已抱病阿斯塔波沃火车站，卧床不起了。雅斯纳雅·波良纳与我家相距两站的车程，如果我回复及时的话，他不会经受那么多奔波劳顿之苦，不致身染重疾；他要求的‘干净温暖的小屋’，我已经收拾停当，只等着尊贵的客人入住；何况我家里能腾出一间小卧室，他随时都可以藏身其中，不用担心被外人发现。”

“大错已铸，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诺维科夫不必自责。托尔斯泰不是一枚绣花针，村落也不是多大的草垛。托尔斯泰名满天下，他的长相广为人知。就凭当时发达的情报信息网络，官方的和私人的，他的行迹很快就会暴露。

有意思的是，那间“干净温暖的小屋”，诺维科夫只在托尔斯泰去世之后才公之于世，

他的回信中没有提及片言只语。这封信只是虚与委蛇，诺维科夫其实并没有接纳托尔斯泰之诚意。因此，即使信到得再早，也于事无补。这个世界上没有托尔斯泰的藏身之地，这是诺维科夫试图在自己的信中表达的看法。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大札收悉。您的真诚，您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动莫名。您在信中提到的要求，我一时不便作答，以免唐突起意，虑事欠周。在您面前说话，我一向都是襟怀坦荡、不遮不掩的，此次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真实想法。在您有能力且有必要改变处境的时候，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现在时过境迁，再折腾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尽管我全力支持您摆脱纷扰自在度日的想法，但考虑到您的身体状况，以及您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地位，我不希望您实施这样的步骤。蜗居粗鄙简陋，实不适合您居留；再说让您在这里受罪，那些关爱您的人肯定于心不忍。我家里有一间光线敞亮的斗室，我们全家人都热诚欢迎您搬过来住，也乐于为您尽膳宿奉养之义务；何况我们家没有小孩，平时也不会闹得您心烦。最小的孩子已经5岁了。推己及人，站在您的角度看问题，我家确实有条件给您提供房间；特别是4月到10月，您住我这儿不会给我们带来丝毫不便。我们怕的不是麻烦，而是……

爱您的农夫，米哈伊尔·诺维科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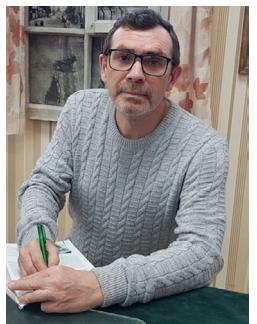
这封信还有附言，专门解释房子的事情：

您身体太过虚弱，单独居住是不可能的，再说普通农户不建孤房。一些农户有两栋房，闲房虽然比较冷，但修缮一下还可以勉强住进去；问题是这种房子都与穿堂连为一体，没法隔离。来年开春，我年迈的婶娘也要给自己建一座6俄尺见方的小屋。她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乐于接纳您并照顾您的饮食起居。

可以预见，以托尔斯泰当时只求与世无涉的极端心理，加上提议本身不无尴尬，他不会接受那样的条件。诺维科夫本人也心知肚明……晚秋时节，一位病恹恹的耄耋老者不在家里好好待着，却要跑出来到别人家借宿，这件事听起来也够荒唐的。再急也得等到开春！

可托尔斯泰一天也等不下去了。

诺维科夫的信迟宕多时，直至11月3日才转至阿斯塔波沃，由切尔特科夫读给病榻上的托尔斯泰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从头到尾仔细听了一遍，嘱人在信封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谢谢！我已另择出路。”



让·保罗·曼加纳罗

1961 年生于伏尔加格勒附近的弗罗洛沃。曾就读于萨拉托夫大学和莫斯科的高尔基文学院。他是一位多产的新闻记者、文学评论家及作家，擅长学术专著、实验小说等各种体裁，并担任数个俄罗斯重要文学奖项的评审。他对高尔基及托尔斯泰的研究在俄罗斯学界颇具影响力。曾以《列夫·托尔斯泰：逃离乐园》（2010）、《安娜·卡列尼娜的真实故事》（2022）两度获得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此外，他还凭借“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成就”，获得 2018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大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为奴十二年》(2013)剧照

肤色崇拜

我一直迷恋于文学利用肤色来揭示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方法，尤其是当小说以白人为主角的时候（几乎总是如此）。无论是一滴神秘的“黑人”之血带来的恐怖，还是与生俱来的白人优越感，又或者是狂乱无度的性权力，肤色的设定及其意义往往是决定因素。

关于“一滴血”原则所激发的恐惧，威廉·福克纳是最好的指路人。不然是什么在《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中作祟？在乱伦和异族通婚这两种令人愤慨的婚姻行为中，后者——一个用来表示“种族混杂”的古老但有用的词——显然更值得憎恶。在很多美国文学作品中，当故事情节需要一场家庭危机来推进时，没有什么比一次不同种族之间的性事更为可憎。这种关系里的两情相悦被描写得不合常理，令人震惊、憎恶。与强奸奴隶不同，这一选择——或者更糟糕的情况——这种爱，会受到全方位的谴责。在福克纳的作品中，这还会导致谋杀。

在《押沙龙，押沙龙！》第四章，康普生先生向昆丁解释亨利·萨德本杀死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查尔斯·邦的原因：

然而，四年之后，亨利却必须得杀死邦以阻止他们结婚……

是的，姑且就算是吧，即使对于那个未经世面的亨利，更不用说对那位出门更多的父亲了，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统的情妇与十六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儿子的存在，哪怕甚至确实举行过一次身份悬殊的婚礼……姑且就算那是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吧……

非虚构

“这世上没有外来者，只有不同版本的我们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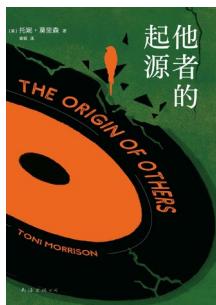
托妮·莫里森 | 新书试读



我们为何团结，又如何分裂？

“我们会死。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但我们创造了语言。也许这就是衡量我们生命的尺度。”

《他者的起源》完整收录了作家托妮·莫里森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哈佛大学两次系列讲座《在黑暗中游戏》与《他者的起源》，以及作家惟一的短篇小说《宣叙调》。本书是送给这个屡遭损毁的世界的一份奇妙锦囊。在这段由私人经验、文学批评和历史档案构筑而成的旅途中，托妮·莫里森用诗性的文字指引我们越过修辞的藩篱与故事的屏风，看到语言本身最难言明的美，直至掩藏在权力背后的历史潜台词逐一显露在我们的面前。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他者的起源》讲座中《肤色崇拜》和《建构“黑人性”》两章，分享给读者。



在小说的后半段，昆丁想象亨利与查尔斯之间的对话：

——那么说你不能容忍的是异族通婚，而不是乱伦。亨利没有回答。

——而他没有捐话给我？……他没有必要这样做，亨利。为了阻止我他用不着告诉你我是个黑鬼的……

——你是我的哥哥。

——不我不是的。我是将要和你妹妹睡觉的那个黑鬼。除非你把我拦住，亨利。

欧内斯特·海明威利用肤色主义的手段同样引人深思。肤色主义这一可被尽情利用的工具在几种不同的模式间切换——黑人的形象从卑鄙之人，到悲哀但充满温情的正面角色，再到点燃狂热肉欲的黑皮肤。这些人物类型存在于作家生活的世界之中，充斥着他或她的想象，但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世界是如何被表述的。肤色主义是如此实用——它是叙事的终极捷径。

看看海明威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中是如何运用肤色主义的。当小说的主角、朗姆酒走私犯哈里·摩根与船上唯一的黑人角色正面对话时，他直呼其名：韦斯利。但是当小说的叙述视角面对读者时，说（写）的却是“黑鬼”。这是两人与古巴官员发生冲突并被枪打伤后，在摩根的船上的场景：

他跟那个黑鬼说：“咱们到底在哪儿？那个黑鬼直起身来看……

“我会让你舒服的，韦斯利。”他说……

“我甚至一动也动不了啦。”那个黑鬼说……

他倒了一杯水，递给那个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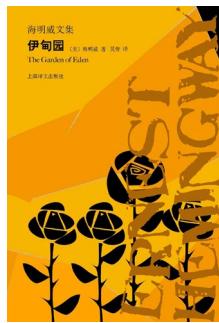
那个黑鬼试着挪动身子，去拉一个麻袋，接着呻吟一声，躺了回去。

“你痛得那么厉害吗，韦斯利？”

“啊，上帝。”那个黑鬼说。

我们尚不清楚为什么他同伴的真名不足以推动、解释或描述他们的险况——除非作者想要突出叙述者对一个黑人男性的同情，这么做可能会让这个走私犯更得读者的欢心。

让我们再把这个不停抱怨、软弱、需要（比他伤势更重的）白人老板帮助的黑人，与海明威对另一种种族修辞的处理进行比较——后者旨在唤起读者对色情与欲念的联想。



在《伊甸园》中，一开始被作者称为“年轻人”的男性角色戴维与他的新婚妻子凯瑟琳——海明威时而用“女孩”代指她——在法国蔚蓝海岸共度悠长的蜜月之旅。他们在那放松、游泳、吃吃喝喝，一次又一次地做爱。他们的对话大多是无关紧要的闲聊或忏悔，但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黑色的身体是多么美丽动人，充满魅力：

“……你是我可爱的好丈夫，也是我的哥哥……等我们到了非洲，我也要做你的非洲姑娘。”

“眼下上非洲为时尚早。这是大雨的季节，雨后草长得太高。天气冷极了。”

“那我们该上哪儿？”

“可以去西班牙，不过……上巴斯克海岸去也太早。还是又冷又多雨水。现下那儿处处都在下雨。”

“难道那边没有一个天气热的地点，可以让我们用我们在这儿的方式游水吗？”

“你在西班牙不能用我们在这儿的方式游水。你要给逮去的。”

“多没劲啊。那就等等再上那儿去，因为我要我们俩晒得更黑些。”

“为什么你要晒得特黑？”

“……难道我晒得特黑不叫你兴奋吗？”

“嗯嗯。我喜欢。”

这种乱伦、黑皮肤和性爱的奇异组合，与海明威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中对“古巴人”和“黑鬼”的区分十分不同。小说中，虽然两者实际上都指古巴人（出生在古巴的人），但后者却被剥夺了国籍和家乡。

肤色主义在文学中扮演重要角色，有着十足充分的原因——它在当时被写入了法律。只要对“所谓的”肤色法规稍做观察，我们就能发现肤色在判定某一行为是否合法时的重要性。根据

《弗吉尼亚黑人法》（即由琼·珀塞尔·吉尔德收集并整理的弗吉尼亚州用于实行奴隶制、控制黑人的法案）序言中所言，这些法律“渗透到十八和十九世纪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同时，这意味着它们也渗透到白人多数派的生活结构中”。

例如，一七〇五年的一项法令规定：“不服从英格兰国教者、囚犯、黑人、黑白混血儿、印第安奴仆及其他非基督教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担任任何案件的证人。”

根据一八四七年的一部刑法，“任何召集奴隶或自由黑人并教导他们读写的白人……

应判处六个月以下监禁及一百美金以下罚款”。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种族隔离政策下，一九四四年的《伯明翰市法律通则》禁止任何黑人与白人在公共场所一起玩“纸牌、骰子、多米诺骨牌或跳棋”。

这些过时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十分愚蠢。它们虽然已不再也不能再被强制执行，却为许多作家铺就了一条能在其上大显身手的华毯。

成为美国人的文化机制简单明了。一个来自意大利或俄罗斯的移民可能保留了一些母国的语言和习俗，但若想成为美国人，得到他人的承认并且真正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她必须变成一种在她的祖国无法想象的存在：白人。这个身份可能会让她感到自在或者不自在，但它将一直存在下去，并给她带来某些优势和自由。

大量文献表明，非洲人和他们的后代没有这种选择。我开始对如何通过文化而非肤色来呈现黑人形象产生了兴趣——当肤色本身会为他们招致憎恨，当肤色只是一个次要特征，当肤色没有被交代或被刻意隐藏起来。它给予我一个特别的机会去无视对肤色的迷恋，也让我从极其审慎的写作中获得某种与之相伴的自由。我在我的几部小说中通过拒绝依赖种族符号，甚至向读者提示我的这种写作策略，来戏剧化地突出这一点。

《天堂》的开场便使用了这一策略：“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这是对种族身份的爆发式叙述。在之后对被袭击的修道院中女性的描述中，小说隐去了她们的种族信息。读者会把她找出来吗——那个白人女孩？还是会在寻找的过程中失去兴趣，放弃寻找后转而关注小说的实质内容？有些读者告诉我他们的猜测，但只有一个人猜对了。她的关注点在于行为：任何黑人女孩——不管她从哪里来，有着何种过往——都不会有的那些举动或者设想。这一无关种族的群体毗邻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社群：对其中的居民而言，种族纯洁性就是一切。任何不是黑如八层石，即肤色犹如煤矿最底层一样深的人，都会遭到这个镇子的排斥。

《最蓝的眼睛》等其他作品的主题则是肤色崇拜的结局——它那毁灭性的力量。



在《家》这部作品中，我再次尝试隐去肤色。只要读者细心注意一些行为符号，一些黑人日常承受的限制，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坐在哪里、在哪里撒尿等信息，便能轻易猜出角色的肤色。但我成功地让读者忽视肤色，这使我的编辑感到焦虑。因此，我不太情愿地铺设了一些指向性的线索，来帮助读者确认主角弗兰克·莫尼的种族身份。我认为这是一种与我的写作目的相悖的错误做法。

在《孩子的愤怒》中，肤色既是一种诅咒又是一种祝福，既是一把锤子又是一枚金戒指。但无论是锤子还是戒指，都不会让读者对角色产生真正的共鸣，只有无私地关爱他人才是真正成熟的标志。



在文学写作中，有意无意地揭示角色种族身份的机会如此之多，但我发现为黑人角色创作无关肤色的文学作品是一项既令人解脱又极其困难的工作。

如果海明威在小说中仅仅使用韦斯利这个名字，他的作品会丧失多少张力与趣味？如果福克纳把书的主题局限于乱伦而非戏剧性的“一滴血”诅咒，小说的魅力和震撼会降低多少？

部分读者第一次读《恩惠》——一个先于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两年发生的故事，可能会以为只有黑人是奴隶。但诸如美国原住民、白人同性恋伴侣这些我在书中写到的角色，都有可能成为奴隶。《恩惠》中的白人女主人虽然不是奴隶，却也是在一场包办婚姻中被买来的。

我在短篇小说《宣叙调》中第一次尝试这种抹除种族特征的写作技巧。它本来是一部写给两位女演员的剧本——其中一位是黑人，一位是白人。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会分别扮演哪个角色，于是我干脆丢弃肤色，把社会阶层作为她们的身份特征。女演员们一点也不喜欢我的剧本。后来，我把这些素材改写成短篇小说，但采用了与原计划相反的策略——角色的确有了种族之分，可所有的种族符号都被刻意抹除了。大部分读者仍坚持寻找那些我拒绝给予他们的信息，而非试图理解故事情节和角色发展。

其他黑人作家可能并不会欣赏或关心我的这些努力。几十年间，他们致力于塑造鲜明的黑人角色，并为这些角色书写强有力的故事；他们可能会怀疑我是否在进行文学“洗白”。并非如此。我也不要其他人加入我的战线。但我已下定决心要拔去廉价的种族主义利齿，消灭并证伪那些常规、简陋、触手可得的肤色崇拜——这种崇拜本身就是对奴隶制的重演。

建构“黑人性”

对“黑人”的定义与对“黑人性”的论述多种多样，其中充斥着不可靠的理论与编造。审视这些用语的建构方式、文学用途，和它们所激发的或暴力或积极的行动，哪怕不能阐明问题，也会十分有趣。

我仔细研究过俄克拉荷马州黑人城镇的历史。那些宣称可为拓荒者们“自由”利用的土地，即俄克拉荷马领地和印第安领地，是（通过胁迫性手段）从科曼奇部落征用的。在那些对这片新土地宣示所有权的人中，既有自由人也有曾经的奴隶。他们建立了大约五十个城镇。据我所知，在这五十个城镇中，大约有十三个依然存在：兰斯顿大学的建校地兰斯顿、拥有两所大学——克里克－塞米诺尔学院和美以美会学院——的波利、塔拉哈西、雷德伯德、弗农、泰特姆斯、布鲁克斯维尔、格雷森、利马、萨米特、伦蒂斯维尔、塔夫脱和克利尔维尤。

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是黑皮肤；少数人是美洲原住民或欧洲人。但他们自称是黑人，并凭借这个身份接受政府的帮助。这些城镇的建立者对“黑人”的定义并不总是清楚明了。南北战争后，当解放了的奴隶迁移到北部和中西部时，很多广告和招揽告示都警告说：“有备而来，否则别来。”这看上去是一个明智的建议：带上你自己的工具、马匹、衣服、金钱和本事，这样你就可以自食其力，不会成为负担。然而这也有其排外性：如果来者是只会料理家务的老寡妇、带着年幼孩子的独身母亲，或是身体残疾的老人呢？他们会被告诫远离城镇，以确保它的健康和发展。另外，混血的拓荒者似乎更受欢迎。这个结论是我从老照片中那一两个被派去当守卫的深肤色男人身上看出来的。显然，居住在繁荣的黑人城镇上的主要是浅肤色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白人”的血液。

我强调这种肤色特征有两个原因。一是肤色的含义及其所谓的特性作为学术和政治讨论的主题至少已有一个世纪。另一个原因是这种“含义”对所谓的黑人和白人群体都产生了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南非人之外，非洲人不会自称“黑人”。他们是加纳人、尼日利亚人、肯尼亚人，依此类推。）

大量的医学和科学研究都致力于解释黑人是什么物种、他们拥有什么特征，并在此之前假设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这些研究者在十九世纪为各种“心理障碍”所发明的词汇令人惊诧：“懈息症”（黑人奴隶或自由人的无赖行径），“漂泊症”（奴隶逃离禁锢的倾向）。这些术语无疑助长了种族主义及其传播，甚至现在我们也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作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关于“黑人性”的等级秩序或种族理论，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会做什么，会变成怎样？）

一旦“黑人性”的社会、政治和医学定义得到了接纳，这会对黑人群体产生怎样的

影响？

我们刚刚谈到，黑人城镇作为安全、繁荣、远离白人的港湾持续发展。但在一个充满敌意和死亡威胁的世界里，黑人居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毫无疑问，考虑到他们对周围世界的了解，他们能有多安全？之前我提到，在一八六五年到一九二〇年间于俄克拉荷马州建立的大约五十个黑人城镇中，有十三个至今仍然存在。那约三十七个不复存在的城镇中的居民可能已经亲眼目睹了他们当初出逃的原因，并重新思考了黑人生命的价值，特别是那些经历了一九四六年的人。

二十世纪的美国并没有远离优生学，私刑也没有停息。黑人的尸体被兴奋的白人旁观者包围的照片出现在印刷品上，印有私刑场景的明信片也颇受欢迎。

黑人承受的恐惧既不是幻想，也不是一种病态。

一九四六年，仍穿着制服的黑人退伍军人艾萨克·伍达德，在南卡罗来纳州走下灰狗巴士。当时他正准备返回北卡罗来纳州与家人团聚。他在军队里待了四年，在太平洋战区（他在那里被提拔为中士）和亚太地区（在那里获得了一枚战役勋章、一枚二战胜利勋章和一枚品行优良勋章）服役。当大巴到达休息站时，他问司机是否有上厕所的时间。他们争论了一番，但他最终被允许使用厕所。后来，大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贝茨堡停了下来，司机叫警察把伍达德中士带走（显然，以他上厕所为由）。警察局局长林伍德·舒尔把伍达德带到附近的一条小巷，并在那里与其他几个警察一起用警棍殴打了他。之后他们把他带到监狱，以妨碍治安的罪名逮捕他。伍达德入狱的那晚，警长继续用警棍打他，并挖出了他的眼睛。第二天早上，伍达德被当地法官认定为有罪，并处以五十美金罚款。伍达德请求的医疗救助在两天之后才到。与此同时，由于他陷入了轻度失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被送往南卡罗来纳州艾肯市的一家医院。在他的家人报告他失踪的三周后，他被人找到并紧急送往斯帕坦堡的一家陆军医院。他双眼的伤势已经无法挽回。尽管双目失明，他活了下来，而且一直活到了一九九二年，享年七十三岁。而在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三十分钟的商议后，舒尔警长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被判无罪。

黑人承受的恐惧既不是幻想，也不是一种病态。

除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其他组织的报道之外，让这次袭击不同于许多其他类似事件，而得到杜鲁门总统关注的原因，或许是受害者制服上那展示着战场功绩的奖章。

这些黑人城镇在害怕什么？发生在艾萨克·伍达德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孤例。

以下是我列举的二十世纪发生的大量私刑案件中的一小部分：

埃德·约翰逊，1906年（在获得死缓后，被冲进监狱的暴徒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胡桃街大桥上私刑处死）。

劳拉纳尔逊和L. D. 纳尔逊，1911年（一对母子，被指控谋杀，在牢房里遭到绑架，在俄克拉荷马州奥基马市附近的一座铁路桥上被吊死）。

伊莱亚斯·克莱顿、埃尔默·杰克逊和艾萨克·麦基，1920年（三名马戏团工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指控强奸，在明尼苏达州的杜鲁斯被私刑处死；杀人犯没有受到惩罚）。

雷蒙德·甘恩，1931年（被指控强奸和谋杀，在密苏里州的玛丽维尔被暴徒浇汽油烧死）。

柯迪·奇克，1933年（在被诬告强奸并从监狱释放之后，在田纳西州的摩利被一群暴徒处以私刑并肢解）。

布克·斯派西利，1944年（由于拒绝在公交车的后排落座，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被该车司机射杀）。

马西奥·斯奈普斯，1946年（因在佐治亚州民主党初选中投票，被从位于佐治亚州泰勒县的家中拖出后射杀；附近的一所黑人教堂被人贴上告示，上面写道：第一个投票的黑鬼永远地失去了投票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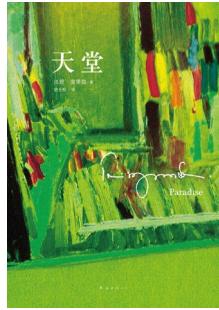
拉马尔·史密斯，1955年（民权运动家，在密西西比州布鲁克海文林肯县法院的草坪上被枪杀）。

埃米特·提尔，1955年（十四岁时在密西西比州的莫尼镇被殴打和枪杀：据称，当时他与一名白人女子调情，但事后这名女子承认自己对事情的经过撒了谎）。

这仅仅是部分案件，骇人听闻的案例还有更多，但我认为这些案例对于（不再是奴隶的）黑人在二十世纪的处境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威胁仍具代表性。

他们因此逃向“自由”的土地，并建立了自己的肤色等级制度，将最深的黑色——“蓝黑色”——作为一个人是否会被接纳的明确标准。这就是我的小说《天堂》的前提，它的背景是俄克拉荷马州一个（虚构的）名叫鲁比的偏僻小镇，镇上的居民都是黑人。在那里“没有可以提供给旅行者的任何东西：没有小餐馆，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

黑人之间的肤色编码、被自己的种族排斥在外的风险，以同样无理的方式遭受像艾萨克·伍达德那样残暴对待的极大可能性，这些都是启发了许多黑人城镇创立者的现实。在《天堂》中，我想象了一个逆向的反乌托邦——通过加深“黑人”的定义并追寻其纯洁性，来对抗“白人”纯洁性的优生学。尤其是那条把许多一无所有的出逃的黑人拒之门外的规定：“有备而来，否则别来。”



一个全是黑人的小镇为什么要强调自身种族纯洁性的标准？它又是如何成功的？在《天堂》里，我想重塑“黑人性”。

我想探索种族纯洁性的要求，以及当黑人的种族纯洁性受到劣等或不纯之人威胁时城镇居民的反应。

在《天堂》里，我把玩着这些混乱且令人困惑的黑人性概念。我在开篇就指向了种族、纯洁性和暴力：“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就像我没有说明“白人姑娘”是谁一样，在最初的袭击中，没有一个凶手被指名道姓。杀人者是儿子、侄子、兄弟、叔叔、朋友或是姐夫——但他们都没有名字。

在刻意隐藏他们的姓名之后，接下来的每一章都以一个女性的名字为标题——玛维斯、格蕾丝、西尼卡、迪万、帕特丽莎、康瑟蕾塔、娄恩和萨维-玛丽，但她们的“种族”身份都没有得到交代。

我急切地想拔去种族这一概念的利齿，让它更为戏剧化，希望以此说明这一建构之物的游移不定和无意义。当你了解这些角色的种族身份，你就真的了解他们了吗？你能了解到什么呢？

鲁比“以外”的世界暗藏着威胁，小镇上的居民对自己身为黑人所面临的危险也了然于胸，这让他们决心建立一个可以自己控制并捍卫的纯黑人城镇：

十代人都知道留在那里的有什么：曾经召唤过他们的自由空间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混乱地方，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有散乱或结伙的邪恶涌现的空白区——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在不管简陋还是宏大的宅门后面。还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你的女人挖地的地方，在你可能整个人被抹除的地方，在人们携带武器去教堂和在每个马鞍上盘起绳子的地方。在每个白人群体都像是武装民兵团的地方，只身一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最近的三代人还是一再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捍卫一座镇子。于是，像那些原先的黑奴知道要先干什么一样……在八月中的某个黎明到来之前，十五家居民……不像先前有些人去了马斯科吉或加利福尼亚或圣路易斯、休斯敦、朗斯顿、芝加哥，而是往俄克拉荷马的深处走去……

摩根兄弟控制着他们帮忙建立的小镇，他们将小镇命名为鲁比，以纪念他们不久前去世的妹妹。然而，尽管他们在当地势力强大，镇上的居民之间仍存在深重的冲突。最扰乱人心的问题之一，便是那珍贵的、由祖辈制造并搬到鲁比的社区炉灶上（缺失了首字母）的铭文究竟写了什么。是成为他皱起的眉头吗？还是就像年轻人坚称的，

“我们是他皱起的眉头”？抑或“女人是皱起的眉头”？和与外地人发生性关系这种引人侧目的现象同时存在的，还有根本的宗教分歧。普立安牧师是一位傲慢的保守派牧师，他的布道体现了这座小镇的众多分歧之一。以他在婚礼上的布道为例：

“我来跟你们说说爱，这个愚蠢的词你们相信是关于你是否喜欢某个人或某个人是否喜欢你，或者你为了得到想要的某个东西或某处地方而容忍某个人。或许你们相信这个词是关于你的身体如何呼应另一个身体，如同知更鸟或美洲野牛，或许你们相信爱是力量、自然或命运对你们的垂青，至少不会伤害、杀死你们，即便如此也是对你们有好处的。”

“爱完全不是这码事。在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事。在知更鸟、美洲野牛或者向你猛摇尾巴的猎犬当中没有，在盛开的花或吃奶的马驹当中也没有。爱只是神赐的，而且始终很艰难。如果你认为爱很容易，你就是傻瓜。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爱是一门应用学问，除了上帝，没有道理或原因可言。”

“爱不是你们忍受过多少不幸就配有的。爱不是你们被别人亏待了就配有的。爱不是你们想要就配有的。你们只能赢得——通过实际行动和仔细思考——表达爱的权利，而且你们还得学会如何接受爱。这就是说，你们得赢得上帝。你们得照上帝的谕示去做。你们得心里想着上帝——非常认真地。而如果你们是勤奋的好学生，就可以把握表达爱的权利。爱不是一件礼物。爱是一种证书，一种授予特权的证书：表达爱的特权和接受爱的特权。”

“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毕业了呢？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你是人，因此是可教育的，因此是能够学会如何学习的，因此上帝会对你感兴趣，而上帝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就是说他只对爱感兴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上帝对你没兴趣。他对爱感兴趣，只赐福给那些可以理解并分享这种兴趣的人。”

主持婚礼的米斯纳牧师是一位更为进步的传教士。他阐述了与之相反的观点，对他来说，爱是“毫无企图心的尊重：其所见证的并不是一个与他自己的爱同为一体的乖戾的主，而是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与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他在会众面前举起十字架，无声抗议普立安的思想“毒药”，并心想：

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淹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唾沫和尿液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暗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出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有何不同，以及它是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恩求者变成一对一的了吗？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喃喃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场处决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悚地——成为可能。

鲁比内部的冲突不断激化，以至于（一部分）男人迫切地需要通过找出一个可以清除的敌人，来消灭社群内部的邪恶与分裂。鲁比附近的这所曾经的修道院中的女人们完美地满足了这一要求。

当然了，这些女人——一群与小镇格格不入的人，一群逃亡者——并不是内心平和的圣人。她们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存在分歧，除了对修道院最后一位居民的深厚感情。这个醉醺醺的老妇名叫康瑟蕾塔，她欢迎所有人的到来。在鲁比的男人们对这些女人发动袭击之前，康瑟蕾塔带领她们举行了一场名为“喧嚣之梦”的奇妙仪式，净化修道院中的每个女人，赋予她们力量。但为时已晚。鲁比的男人们来了。

在所有这些基于种族和性别的权力分配所引起的争斗、混乱而不可调和的冲突中，我试图让读者注意到特定的个体是如何努力逃离伤害，弥补自己的过失——一次只讲一个故事。一个一个地讲。

这部作品——或者说写作这部作品的目的——让我回想起多年前，我在一次维

也纳双年展上的经历。在展出的一件艺术作品中，我被邀请进入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面向一面镜子。几秒后，一个身影慢慢成形，向我靠近。是一位女性。当她（或者说她的影像）就在我身边，高度与我等身的时候，她把手放在玻璃上，而我也按照指示做同样的动作。我们就这么面对面地站着，无声地注视着对方。人影逐渐淡去，缩小，最后完全消失。另一位女性出现了。我们又一次触碰彼此的手心，又一次四目相对。这样的体验持续了一段时间。每位女性的年龄、体形、肤色、衣着都各不相同。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与一位陌生人亲密接触。沉默，却知晓。接受每一个人——一个一个地来。



托妮·莫里森

美国作家。1931 年生于俄亥俄州，曾在兰登书屋担任高级编辑，后赴普林斯顿大学等校任教。代表作有《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宠儿》《爵士乐》《爱》《恩惠》等，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美国书评家协会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1993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19 年 8 月于纽约去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文内图片来自 fabric qorn

专栏

051 赵晨曦 一个说“时尚属于老百姓”的 时装设计师在想什么

杨樱 | 接力访问

我问他，
你意识到自己设计里的政治文化符号了吗？

01

我比赵晨曦要早到一点。愚园路上一家网红面包店，主打各类酥皮，也卖咖啡。黄油香气四溢。一个美团师傅和我同时进门，他说，好香啊。保安打趣，去买一个吃啊！师傅看他一眼，我不吃西餐！

我和赵晨曦都只要了热美式。地方是他选的。发完地址他说，我不熟咖啡。我说那地方挺好，够大，说话方便。本来我们约在他延平路的工作室，见面之前改到了这里。其实他楼下就是上海咖啡馆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他应该是考虑了我。

赵晨曦很好认，披肩黑色长发留出清晰的中缝，黑色八字胡，瘦而高。见面之前我在朋友圈里见过他和别人的合影，穿着那件写着大红宋体“办证”的衬衫，麻花辫一边一个，笑得像《猫和老鼠》里杰瑞那般纯真。当时他应该刚刚走完秀。上海时装周，fabric qorn AW23，他创办的时装品牌，中文名“布料激情”，如今已经做到了第四年。qorn是porn的妥协，注册商标的时候后者被否了。

比麻花辫合影晚几天发布的是这一季的9张模特图，AW23这一季的主题是“赶集”，北方农村的集，可能是东北，因为出现了雷锋帽和大花布，但是也不好说，因为还有大盖帽、俄罗斯风格的皮大氅，绿色塑料暖瓶，印着贰圆壹圆伍圆伍角纸币图案的花衬衫，草帽上印着“中国梦 888”、“办证”衬衫。品牌第一季的主题是“Make China Lit Again”，核心元素是中山装。

点开这组图的时候我有点恍惚，因为即便是怀旧，赵晨曦用的符号也是太早了。考虑



到他是1995年出生的西安人，而且高中以后主要生活在国外，这些东西到底在什么时候进入了他的生活，确实让我感到疑惑。这些设计更接近2000年代初旅游市场里第一代政治普世消费品，比如北京798或者南锣鼓巷里卖的切·格瓦拉搪瓷缸子，以及田子坊里军绿色的“为人民服务”邮差包。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看似生活化，但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色彩。包括推荐他接力的Dika提到的fabric qorn品牌口号，“时尚属于老百姓”——这说法也有点意思：老百姓是个参照系里的称呼，军队和老百姓，政府和老百姓，总之老百姓很少管别人叫老百姓。

赵晨曦的说法是：“我会主动去找一些大家觉得比较土、不入流的元素。我其实喜欢把这些大家觉得不美、不愿意去接受的东西融入进来。”“因为我觉得这些元素被抛弃、被忘记，我自己会感觉很难受……大家喜欢所谓高级的东西，喜欢穿那些他们认为会提高自己品味的东西……但是这些被抛弃的东西让我共情，我会想把它们找回来。”

“我想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其实挺马克思主义的。我总觉得这个世界的阶级分化，包括中产什么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让我非常难受，非常不舒服。那么最起码我会做得更平等一些。”

我消化了一会：“中国不是一个特别马克思的社会。”

“现在不是。”

“你出生的1995年也不是，等你离开中国的时候就更不是了。”

“其实就算资本主义也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比如全民社会保险，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为了存活下去吸收的。”

“对，反倒是我们没有。”

“咱们也有全民保险，退休金、医保什么的。”

“是，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些最需要这些保障的人反而是没有的，比如说医保。”

他很诧异：“是吗？”

后来他说，“我就觉得马克思主义那些理论，挺接近我想要的那种状态。”

02

赵晨曦在佛罗里达读高中。没啥别的原因，他就看网上介绍说佛罗里达是美国第一个能看到太阳升起的州，他叫晨曦，挺配的。

去美国是因为如果不回去那就得去当兵了。成绩不好。他不想要当兵，觉得苦，以及觉得得抹杀掉自己的一部分，他不舍得的那部分。

赵晨曦其实从小都很乖，就连反抗也只做安静的反抗，比如不做作业。他执行一切老师说的家长说的命令，作业也做，大家说考试应该努力考满分他也努力考满分。突然就不想学习了。胆子小也要反抗。大约到了青春期的某个时候。

后来他觉得，自己其实在反抗他爸爸的强势，什么都给安排好了，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余地。“我其实没有被当作独立个体对待，就像个附属品，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当时我意识不到，只是现在回想是这样。”“然后我去了美国，这个选择是我做的，如果我不再努力，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在美国也不快乐。到了大一，学艺术史，特别喜欢。觉得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被解开了，感觉很自由，还可以这样表达自己。

聊天的时候他提起三个人，一个是艺术史老师，热情，把艺术思潮讲得深入浅出，一个是米歇尔·巴斯奎特，那个 27 岁死于可卡因过量的天才艺术家，最后一个杜尚。杜尚了不起。

之所以没有投身当代艺术而是做了服装设计，是因为赵晨曦觉得做个艺术家和出家没有区别，完全为了自我表达而活着，生存困难，而且，“比较难被我家里人接受”。

赵晨曦其实很在意家里人接不接受的问题，聊天的不同话题里表达了好几次。他很粘父母。他从小学开始寄宿，只要回家，就跟父母一起睡，一直到初中。只不过母亲做安利，认真追求作为生活内心两独立的女性生涯，不愿意有个儿子粘着自己，后来赵晨曦谈起“那些被人们抛弃的元素”，用了一个说法，就好像“我被我妈抛弃一样”；父亲倒是很关注自己，只不过强势，用控制欲表达自己的爱意。他也受不了。在美国的时候，是父亲的控制力难以触及的时间。

不过他创立服装品牌，这种控制又回来了。

赵晨曦是用家里的钱创立的“布料激情”。做到第二年的时候，因为调性突出，一些大众品牌找他做联名，间接支持了品牌运转。不过到了疫情深水区，零售市场不景气，这部分资源也少了，又用回了家里的资金。

他一开始不喜欢爸爸做自己的投资人。“我想尽快独立或怎么样，但是我能感觉到我爸其实不想让我脱离他的帮助。他愿意这样，其实我不想。”

事情的转机——如果可以叫做转机的话——来自于他抑郁之后的经历。心理咨询师挖掘了他的原生家庭，他渐渐看到了童年的自我状态，然后和家里进行了一些从未有过的沟通。用他的话说，和爸爸进行了几次比较深刻的探讨。

最深刻的一次，是俩人在一个露天酒吧互相指着对方对骂。电影一样的场景。然后他们的关系就变好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看到他在手机上做了一个非常长的草稿，他准备怎么跟我谈。我爸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非常强势，在外面雷厉风行。但为了跟我沟通，他做了这些功夫。我的咨询师也夸我爸，说他没有逃避这些，虽然他也很害怕。”

赵晨曦没去看那长长的草稿里都写了什么。但是那次吵架之后，他爸爸接受了他的马尾辫和耳钉，也接受了他做的时尚。他开始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对自己在做的事情心里有数的人。唯一不确定的，也是赵晨曦不确定的，是做这事到底能不能赚钱。

其实是赵晨曦自己长大了。他开始跳出儿子这个身份去看待父亲其实他也有不安全感，他觉得我不听他的话就是不爱他。如果我爱他我就应该什么都听他的。他一直在重复，说，如果我现在被车撞死了，你会不会救我？

“很纯真。”

“他就是这么问我的。他怀疑我爱他，就算他被车撞了我也不会救他，因为我不爱他，

因为我不听他的话。”

赵晨曦虽然在西安长大，但祖籍山东。他觉得他的家庭状况和这个有关系，保守，“我是老子你是儿子，我说什么你都得听”。然后他补充，“但是我觉得，他和他爸爸（也就是赵晨曦的爷爷）这一关就没过。他爸爸是这样，所以投射过来，他对我也这样。”

我们聊天快结束的时候，爸爸电话来了，赵晨曦聊天如拉家常，也没有“现在在忙回头打给你”的意思。很温柔。

03

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赵晨曦说。我们在聊他的服装设计里的政治色彩。他觉得自己只是会讲故事的人，作品里的符号是他回国之后自己挖掘到的，素材包括自己家里的老照片，爷爷家里的老物件或者网上的资料。有一次去慈溪看面料，他也喜欢，“这种稍微有些乱糟糟的三四线城市，非常接地气，看看大家在用什么、吃什么。”

这些都是一个时尚设计师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但赵晨曦的设计不仅仅是在怀旧。

“那怎么会说‘时尚属于老百姓’呢？”

“因为小时候课文里有这个词。我就是希望大家平等。影响我比较多的是《人类简史》，它其实会讲很多这种，然后就是马克思主义，我觉得挺接近我想要的状态。其实时尚现在就是从下至上的，我就是不喜欢那种阶级的感觉，我就像反阶级、反传统时尚……”

赵晨曦说得越多，我那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越明显：他确实没有在想什么和政治有关的问题，即便在他提“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没有，如果替换成“人人平等”，意思似乎也大差不差。至于“马克思主义”在别人眼里会意味着什么，他好像知道得不多。

我决定把这个感受告诉赵晨曦：“所以，你有政治表达，但又没有那么强的政治立场。”他看着我：“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些东西恰好能代表你心中的想法，虽然这些东西都带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色彩，但你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长在红旗下，但根本没意识到红旗，也不知道红旗代表了什么。一个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环境，政治语言政治符号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包围着你，但一个人可以认为自己什么都感受不到，可以与之无关。当你恰好有一个表达机会的时候，你以为你只是在表达自己，其实你自己就饱含了政治本身。”

我说得有点多了。说的时候我感觉不光是在回答赵晨曦的问题，也在说不和他探讨类似话题的朋友们。

赵晨曦继续看着我：“要这么说的话，也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对艺术比较感兴趣，就说现在艺术学院管得非常严了，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做，我倒是可以躲在时尚的躯壳下，偷偷说一些东西。”

“其实你并没有偷偷对不对？”

“是。”

我不确定他和我说的“没有偷偷”是不是一回事。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说我不懂符号背后是什么，我不赞同。我只是觉得一切下定论的话都不是那么靠谱，包括这句话本身。所有东西都在变化。我也没有确定说马克思主义一切都是好的，或者资本主义一切都是不好的，我觉得都有可取的地方。”

我们的话题转到日常聊天里的政治话题。赵晨曦说，平时直接和他会聊政治的主要是一个人，他在 Instagram 上发一些符号意义很强的图片视频，很有名。其他的就不多了，去年疫情封控的时候有一些，那时候大家都很生气。

临走的时候，他又想起来一件事：“最近有人提醒我，就在我们做完秀之后。挺多人跟我说的，他们说，我在秀里的那些表达，其实是一些危险的。”

04

后来我们在微信上又有两组对话。

第一组是关于设计的。他问我提到政治波普的时候说的那位外国人是谁。

我说切·格瓦拉。

第二组是他的两段语音说明。“我刚在和朋友聊天，忽然想到我们说的一部分内容可能不太准确，就虽然你说我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你看来可以替换成别的任何东西，比如平等主义或者什么别的。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严格来说，只有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每个人的理解都是自己的理解。我确实看过《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完整看完吧，但说我完全不

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太准确。”

我回他：“你是怎么看起了《共产党宣言》……”

他回：“好像当时是按照必读书单看的哈哈。”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听的。我最近有在学习“艺术表达”和“设计”的区分，这个是我吃不准的。我第一次了解到做设计其实不需要你去想创意或者创作。就是按部就班去实现一个目标。之前我是不太能想得通的。

Q: 最近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A: 下一季怎么给我们品牌稍微赚点钱。

Q: 你想邀请谁来接力？

A: 小泉。和你聊完我感觉在泉身上能挖掘一些你感兴趣的“公共性”，我去过他策的展，能感觉他在很热情地 reach out to 大家。



杨 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Kin Li](#) on Unsplash

专栏

052 子津 一个关心工人的人 如何思考自己该干什么

杨樱 | 接力访问

子津不喜欢“关心”这个词，太自上而下了，
她想让自己摆脱的就是这个。

我和子津见面的时候，位于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拆了已经有半个月了。她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消息。只是在聊起自己过往的时候，说自己当初就是被这个博物馆触动，想要留在那里做志愿者。在此之前，她对“工人”这个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几乎不了解。

“里面有一些和工人相关的物品，比如证件、工具，还有一些新闻报道。我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博物馆，这样的储存对我来说当时是有点震撼的。”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大家都叫它“打工博物馆”）的珍稀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家由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所在地皮村位于北京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和很多城中村一样，因为生活成本低廉而成为众多打工者的居住地。打工者自发这个属性决定了其叙事视角，展品很多来自打工者的捐献，以细致而微但又无比真实的角度记录城乡流动中工人身份、劳动关系、子女教育等等种种问题，在5月20日闭馆之前，有些人取回了属于自己的展品。

子津到这里的时间是2017年。她跟着大学社团参访“工友之家”，打工博物馆的组织机构，然后就留了下来——准确说，是住了下来。子津说话都很清淡，她说自己只不过打打杂，协助工作人员写点东西或者拍点照片。不过这些“打杂”的频率不低，临近毕业她也没有课了，为了方便，她住进了工友之家的宿舍。当时常住的志愿者只有她一个。

那一年冬天，北京大兴新建村火灾，随后开始安全隐患排查以及清理整治行动，皮村也在排查之列。子津是过程的经历者和目击者。她很快就发起高烧。惊吓。紧张。恐惧。很多场景她都是第一次经历，很多事情也超出了她的想象，只能回学校住了一段时间。不过春节之后，她又回到了皮村。

子津出生于1998年，个子小小，说话轻而慢，看着文弱。她说她毕业的时候根本没想普通投简历找工作的事。她想做点别的。

我其实是在“工友之家”才切实接触到“工人”的个体经验。在此之前，我在大学里一直是比较关注乡村的，不管是社团还是看书，还和老师同学一起去过四川广安做支教和调研。到了“工友之家”我发现它们是有关联的，是同一批人，从农村来到了城市。

如果再往前追溯，在高中的时候——现在说起来还蛮傻的——忘记了是看什么杂志，上面写一个人在山村里支教了一辈子，然后我就把理想设置成了这个。那个文章应该描写了山村的教育资源多么匮乏，老师如何在里面做教育工作。我当时被这个文章触动到，就和爸妈说这是我的理想，去山村里做老师，而且是最穷最穷的山村。爸妈只当我还太小。

其实这个理想还蛮支撑我的，高三对很多人来说都很痛苦，我当时想让自己变得强大——当然现在看会觉得强大本身是个很单维度的东西，很好的学校，很多知识——才能去完成我的理想。（考上北师大）不完全是顺着这个逻辑，但有一点因素在。

可能阴差阳错，我上了大学，反而不想去乡村做老师了，变成希望针对乡村做一些研究，当时会觉得这些东西属于更大范畴的改变。但是我后面跟着老师下乡之后，我就发现当一个人成为研究者，实在是太置身事外了，很多时候是带着冷漠在看一些东西，所以来慢慢希望自己可以做更多实践，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工友之家”。

子津现在在广州HOPE学堂工作，一个服务于职校学生和老师的公益机构。从专业的继承性上看，这和子津研究生的学习方向一脉相承。北师大毕业之后，她被保送清华读教育专业，2020年开始做职业教育的研究。我们从教育分流政策说起，有一段时间，都在聊职校生的诉求和特点。

一部分人去读普通高中，一部分人去职业教育，这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有等级的。对于上职校的同学来说，会有一部分人很难摆脱“低人一等”的感觉。从实际他们未来走向来看，虽然职校的升学是逐步打通了但还只是面向职校里的一部分人，对于职校里的很多人来说，未来从事的工作其实还是去工厂或者服务业。我们接触的一些学生，可能毕业两三年了依然没有很稳定的工作——我自己觉得不稳定的工作没有什么，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也不工作——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这一点，没有稳定的工作意味着可能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甚至可能负债，家人可能还需要他们给钱，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很艰难的，然后他们必须得找到一个空位去干活，即便那个地方会让他遭遇到霸凌，他也必须得忍受。

很多职校生是在没有支持性的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比如遭遇过家庭暴力，比如因为成绩或者其他原因被忽视情感需求的，甚至被虐待，在学校比较边缘等等，可能这些东西就会转变成是在实习或者工作场所里的困境。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会通过一些活动来促使他们在我们的活动小组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比如戏剧、演出、团体辅导。

还有职业这一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拧螺丝、端盘子了，不愿意去工厂了。我们会带他们去社会他们平时接触不到的地方，比如关注残障议题的咖啡厅，或者是智能制造自动化……帮忙联系这样的企业。包括跟他们讨论经常贴在他们身上一些标签，像“混日子”，就跟他们去讨论如何去理解类似的说法……

有一次子津和职校同学们去广州康乐鹭江，一个制衣村，一起拜访制衣厂的工人，了解他们的工作，访谈制衣厂的老板等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一个同学提到了自己的焦虑，“她说她的父母不希望她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对，是一个很狭窄潮湿的地方，很脏。这个同学自己也不想在那种地方工作。其实她没有直接这么说，我感觉她是担心自己最终还是会去那里。于是我就想办法，让她把她的焦虑整体表达出来。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大家又聊了广州城中村的存在，以及和珠江新城这样的豪华地段的对比。”

子津觉得这样的对话很珍贵。有好几次，她提到了工作的价值感。她之前其实加入过另一家NGO，因为有一次在HOPE学堂做志愿者才换到了这里。当时子津听大家聊打工的经历，表达很平淡，她却心潮澎湃。又站在一个很大的乒乓球室里看了一部纪录片，看到站在眼前的同学如何讨论自己的看法。当时子津觉得，价值感只有和具体经历事情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存在。她希望和对方发生对话，希望对话让彼此产生具体的感受和思考，只有这样，她才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在NGO工作有很多情感劳动，很消耗能量，你会觉得自己得不到补充。和同学那种朋友式的相处和交流，比如读书的感受、事情的看法，会让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可持续的，但是以朋友方式相处这种事，也的确不常见。”

同学们对子津的认知是“社工”——“社工”不是职校学生会向往的工作，他们觉得又辛苦赚得又少，去工厂可能都更划算。在这种时候，子津反而很轻松，她举过一个例子，“对我自己来说，有时候我会和同学们有成为朋友的感觉，但那种时候比较少，比如当我们吃完饭一起躺在一个蒲团上休息，那种时候我会觉得很美好。”

我们之所以会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聊到子津和她工作对象之间平等与否，因为平等意味着很多讨论她是否可以感同身受，而不仅仅从议题层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过子津却说到之前另一种“不平等”，这也是她不愿在高校进行职校教育研究的原因。

“清华硕士”这个身份可能在我做研究的时候很困扰我，并且是我想要去回避的。我当时不会主动跟同学们说我的学历，因为我害怕去造成那种差异，而且我现在会觉得这种害怕本身是很自私的，因为我没有打算把自己敞开，我没有主动说是因为我想让他们跟我建立更好的关系和信任，但是这种所谓的信任，其实是我为了能够获取更多他们的信息，为了让他们向我敞开更多；与此同时，我在遮盖自己。这是很不对的。一个人，我希望ta敞开，但其实我没有打算去敞开自己。

在我做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这都是一个困扰，我觉得自己没有处理得很好，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或者说我很害怕这样去处理，因为这样研究就会做得不好。不过，这个问题在2021年的时候解决了，因为我没有准备去做一个研究者。我不再把自己作为一个“窃取者”——这样说很严重，但其实这就是我很难受的一种感受，我当时确实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2020年，子津加入了一个叫做“打工谈”的播客内容小组。这个小组的神奇之处在于，虽然确实有少数几个发起者，但很快是靠彼此之间都不了解的志愿者在发起话题和制作内容。子津是早期加入的志愿者之一。她一直想做类似的事情，关注的契机也是想要了解疫情中打工者的状况。

邀请子津来接力的3in曾经做过一次播客嘉宾，谈他在货拉拉做搬家工人时的经历。“打工谈”的可贵之处在于，很多次节目都在直接呈现打工者本人的讲述，制作者保留了嘉宾的口音（方言而不是普通话）、背景音（可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录播客）以及干扰（一边录可能还要一边带小孩）……

子津觉得印象深刻的一期，嘉宾是一位她认识很久的工友。子津请他来讲一讲从离家到电子厂打工的过程，以及自己的人生经验。让她意外的地方在于，虽然俩人认识很久，对方从来没提到过自己各种被骗的经历。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点点头，说，“好惨”。子津很认真地看着我：“我感觉打工谈更注重那种力量感，有些人的经历是很惨痛的，但好像在每个人的故事里，你都能感受到一些力量在。就是在经历很多事情之后，他们还在努力地生活，或者对于这些经历会有反思。我觉得都是很有力量的东西。”她提起以前看过打工者演出的戏剧，她作为观众，会感受到“一种冲破枷锁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自己获得不曾有的能量。

我最开始接触NGO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让你奉献自己的机构。你要舍弃一些东西，你是为了别人，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在牺牲。我现在不这样觉得了。现在我会觉得我其实是在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无私奉献。

当我感觉比较好的时候，是我觉得我支持到了别人，同时我自己是有收获的。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和满足，我觉得我也不可能去做。那种精神上的满足也好，感受到那种关系的建立也好，它们对我来说是温暖的，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一个原因。如果说自己是“奉献者”，反而把自己置于了很痛苦的道德高地。

Q: 想要推荐谁来接力？

A: 小饼干。很喜欢她，读她写的心路历程，即使只是一些碎片，也会受到触动，奇妙地获得力量。我们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共情的同时，我觉得她勇敢又可爱。她会做各种活动，观鸟、漫游、攀岩等等，都很有趣，而且她很懂去哪儿吃饭。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 我感觉没什么有趣的事。最近除了工作在尝试一些手工，版画、徽章还有其他材料。参与朋友活动，也跟学生们做。

Q: 最近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A: 想要重新思考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从劳工转向职业教育是因为有压力，而我之所以在做职校是因为我接触的是年轻的工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差了一点什么。有时候当我重新接触到和劳工有关的事情，我能感觉到不一样的内心，更能激起我动力的东西，但是职业教育会少很多。我还在衡量，在我确认有价值的东西和我能承受的代价之间我会遇到什么。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入殓师》(2008)剧照

专栏

053 黄卫平 “你不要把我写成 一个浪子回头的人”

杨樱 | 接力访问

当年顺着大环境赚了钱的一个人，

现在逆着大环境在做事。

和黄卫平见面费了一点周折。他对在哪见面一开始没啥特殊要求：徐家汇附近，能抽烟。在我到了一个咖啡馆之后，他在微信里发来指令，得找个能让他坐在一个地方不断抽烟的地方。这个需求之所以不可回绝，是因为他瘸了。

那天气温差不多在 33 度上下，晴朗，我转去旁边商场的一个地下小广场等他。这时候离我们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40 分钟。

他拄着拐棍到了。穿着一件看起来洗了很多次的汗衫——当然也可以叫 T 恤，但是叫汗衫更符合它的状态。烟确实没有离手过，如果没有吸烟，他就在喝一杯泰式奶茶。我拿着小咖啡馆里带出来的咖啡坐在他对面，烟飘过来的时候，他就扭头换个方向吐气。

黄卫平出生于 1970 年，是“死亡咖啡馆”中国带领人的培训人之一，另一个是他太太王莹。[介绍他接力的津一](#)是“死亡咖啡馆”刚刚受训完的中国带领人，介绍的时候，认识黄卫平夫妇不会超过 96 小时。不过津一说，他们看上去经历过很多事情。

“死亡咖啡馆”是一个谈论死亡的地方，用正式介绍就是，“是一个没有议程、结论或导向的死亡教育小组活动”，带领人是保证活动在一个可信任的谈话氛围里进行的人，而参与者不必对死亡话题有发言义务，哪怕仅仅是愿意倾听，也可以参加。

黄卫平在他的另一个 NGO “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的公众号里发过一篇[《关于「死亡咖啡馆」的问与答》](#)，很长，以一种庄重但又戏谑的口吻回答了他做这件事的各种想法。这篇文章对我来说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确实折射了黄卫平的某种特质：在见识了自己的人生可以经历怎样的起伏，又见识了别人的人生可能有怎样的遭遇之后，对生命保持某种敬畏。这种敬畏值得他为之做一些事情，哪怕这些事情本身好像没啥

回报甚至还相当消耗。

不过黄卫平肯定不会口头承认这一点。他宁可把话说糙也不好意思说伟光正的宣言，一个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黄卫平聊天节奏很快，还擅长在自我吐槽和自我陈述之间来回横跳。聊完，特地关照我，你不要把我写成一个浪子回头的人！

需要补充的是，“手牵手”的“主业”是临终关怀，一个黄卫平其实没有太多信心、但依然持续投入的事情。信心指的是在中国社会范围内实现临终关怀的各种配置，包括公共服务和人的认知。就目前的状况看，医疗体系还在急症医院里——以看病为主，而不是看人——而很多国家已经把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从中剥离出来。种种现状说明，要做到“以人为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既然相当长远，你为什么还要做？我和黄卫平的对话就是从这个问题正式开始的。

黄卫平说，因为有证明自己的愿望。

这个愿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从完全放弃自己的时候。

严格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它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变换自我观察视角的故事。这种自我观察的能力，可能于黄卫平而言一直都在，只不过看在何时发挥作用。

以下是黄卫平的自述，内容顺序略有调整。

我零几年就已经就退出社会了，跌入非常低的低谷。中国最好的 20 年我都没赶上，我已经退出了。

我很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后来都是一个零一个零地在消灾。做生意下海，挣快钱。小时候家在华山路乌鲁木齐路，现在是华山医院门诊部，奶奶的房子。姐姐生在上海，爸爸妈妈都是上海人，爸爸是当兵的，复员之后分配去了外地，退休之后回了上海。我出生在山东，那时候全国粮票不值钱，户口就转了山东，后来又去了宁波石化。厂矿子弟教育，高考英语 14 分，只能上大专。哪个上海人会高考英语 14 分？现在户口也还在宁波。

大专之后在石化厂当一个流水线工人，上班上了三年不到，实在上不下去了，每天跟这些工人在一起讲讲男男女女的事情。我还是个有理想的人。我妈也管不了我，就把我弄到上海来，让我姐管着我，因为我姐从小就是别家的孩子，太优秀了，我也有点怕她，所以我们家只有我姐能管得了我。

一开始来上海啥都干，红马甲也当过，销售也干过，后来 90 年代中期开始就自己开公司，那时候比较简单，做什么都行，你只要胆子够大，做啥都行，对吧？赚了点钱，就有点忘乎所以。各种恶习都染上了。

你知道回顾人生很讨厌吗？现在就觉得，“那个人是我吗？”那时候没见过什么世面，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拜金、忘乎所以的人，觉得钱能解决一切。去商场随便买东西。

后来开始赌博。赌博就太快了是吧？一个晚上能全赌光。总有一天会赌到你承受不了。就折腾了一半（钱），然后自己也吓到了。也不是光接触了赌，你进入了那个圈子，然后慢慢就开始啥都来，就沉沦了，滑下去了，然后家门也毁了，生意也毁了。那时候你有个几千万，觉得可以活到天荒地老是吧？赌博、离婚再干嘛，钱就越来越少了。倒也不是因为钱少，到后来发现也没意思了。

生命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让你真的坏吧，也坏不下去。因为底色还在，毕竟还是读过书的，坏不到底，作恶也作不了。在黑暗之中，还想看到一点光明。那时候还经常送人去读书干嘛的。然后发现自己也好久没读书了，2006 年我就去读书了。因为我英语太差了，对英语没要求的只有一个心理咨询，就去了华师大。

2006 年去读，读了两年半，实在没兴趣。那些老师整天跟你讲怎么接个案，整天想着怎么挣钱，同学们也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作为职业，心烦吗你说？我其实想跟他们探讨人性，是吧？

不过这样正好就到 2008 年了，留了一级，遇到我现在的太太王莹，然后汶川地震，我就号召大家一起去汶川做援助。就王莹一个人跟我去了。她父母不同意，所以我们还是去找了一个正规的组织，我说我给你们扛包、当后勤，因为觉得自己水平肯定不行嘛。然后王莹给他们负责宣传。就这样，二十多号就冲过去了。

去的时候已经挖完了，有的地方都封着，进不去。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什么是心理援助没有任何概念，后来变成“防火、防盗、防心理”。在那边待了三个月。最早到德阳，然后跑了很多地方。

一起去的都是心理咨询师。比我大的小的都有，都没有经验。谁有经验？连团建都没做就去了，到那边天天吵架，争论工作方法。有的人还要争个名利是吧？有人去了三天

就回去了，到处做英雄事迹报告。

我跟你说，因为那时候阳光很好，每天（都感觉）很恍惚，早上起来坐着车出门的时候，阳光明媚，像一切都没发生一样，然后你到了这些人群当中的时候，又看到了他们的悲伤。我整天跟人家抽烟，喝酒，聊天，聊了就接业务。部队说你们可以给我们的战士们放松一下，我就回来说咱们明天去给那些战士们做团体活动。包括后来建的那种帐篷学校，因为高考延迟了，几个老师定期上下午各一场（心理辅导），持续一个多月的团体活动，还是支持到他们考上大学的。

这也不是一个必然的条件，就是说这些能够来学校（接受辅导）的（孩子），说明是想学习的，然后也解决了一个家长的后顾之忧，因为家长那个时候都在忙。国家说要前看，没有什么心理问题了，马上8月份要开奥运了，要把时间抢回来。

好多人的哀伤都无法处理。其实每年在“5·12”前后中期的时候，自杀率比较高，就是因为当时哀伤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当然很严重的我们也碰不到，那时候国家就很快介入了，就是有严重应激障碍的那些人，国家很快关怀起来了。

怎么说，这个东西就是个悖论。我碰到一个妈妈——那时候央视还报道过——她被一个心理学大师治疗过的，用空椅子技术。她每天梦到女儿，女儿不是被压死了吗？后来她每天坐在废墟那里，拿着女儿的照片看。我那天正好经过，反正当时看到人我就发点吃的或者别的什么。她就跟我聊天，我说我是搞心理的，她问我，你有没有办法帮帮我忙，她说，我现在梦不到我女儿了，被他们给弄没了，你能不能帮我把女儿弄回来。

我每天就得接受这种荒谬的事情你知道吗？然后你也看到有些人，别在这干活，他们不管，照样打麻将吧？抽钢筋、收废铁的人也照样，反正最早恢复的是网吧和洗脚房。灰色产业是最先发达起来的，啤酒的销量是最好的。人就是那么复杂。

所以那段经历让我对心理咨询这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觉得只要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大部分的认知，首先是要允许一个人去哀伤。那时候的人太想解决问题了，稍微觉得别人好像有点不对，就觉得要干预。但没办法，那个时候都没经验，团队都是稍微学了几个什么疗法就匆忙上阵了。

（所以为什么想做临终关怀这些事）有时候不太好说。好像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选择，有时候还真是觉得冥冥中自有定数。我现在越来越只能把它归为玄学，我觉得。

所以我就没（心理咨询）二级证，我只有三级证，而且那时候对心理咨询幻灭了，我就搞临终关怀了。当志愿者上瘾，想要去为别人服务，突然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在这个之前的七八年，完全是无价值感的状态，甚至都准备等爸妈死了我就死了算了。

而且我发现其实你要做关怀人的事情，并不需要专业——当然专业还是重要的——关键是看你真的愿意去关怀别人。所以来招募志愿者就放开了，尤其打击那些搞心理咨询的人。因为我发现他们学了几样东西就总想用，反而没有专业的人，更容易使用你自己，而不是使用那个技术。

“手牵手”就是这个时候做起来的。到现在15年。最早我还有点钱，想想这玩意也花不了多少钱，后来接了一些这一类项目，团队不断扩大，最多的时候到了10来个人。然后发现不对，我们俩也不是做管理出身的，招来的人不到一年就跑了，还得擦屁股……最早我们也承接过日托，也做过养老社区里的癌症关怀什么的，王莹做得很辛苦。我就觉得不对。政府项目相当于撒胡椒面一样的，跟我们想做深度有点不太一样。这些项目一年制的，就是一年一个项目，而且还想让你创新，其实哪来那么多创新，你要让一个关怀深入下去，没有两三年怎么行？

2012年开始，我和王莹意见不一样。她就想把这个机构能够维持下去，安全一点。我就离开了一阵子，去做了死亡体验馆，从2012年开始弄，到2016年开馆。

死亡体验馆是一个没有参照的事情，从零开始。以前做生意也好干嘛也好，有大环境在，对吧？我当时是逆着大环境来做事情。算是人生一次“非常美妙”的体验。如果你现在再让我来一遍我是不来的。

太难了。一开始想的很简单，开始以后钱也找不到，就自己投钱。我们从2013年开始造体验馆，到2014年底发现不对，又全部拆了，然后再投钱。是一个4D实体体验馆，在上海黄埔区公益新天地。

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方式。首先你叫“死亡体验馆”，本身就在打破除死亡禁忌——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就走了——还有，我们是觉得死亡这件事情，你没办法通过上一堂课或者科普就能明白。它必须来自于自己的体验或者内省，这样才能扰动你固有的认知。

我们最早落点都在硬件上，后来发现硬件也不是最关键的，所以还设计出一个游戏流程。一次来12个人体验，他们能够互相有价值冲突，每一轮结束投票，你就被投死了，

然后就可以体验后面的一个死亡流程，包括仿真版的焚化炉。不能选择死法，这个也有人提过，但是园区给我们的面积比承诺的小太多了，地方不够。

来的是想多了解一些死亡的人。有的离婚了来纪念一下，上午刚刚敲完那个证，下午就来体验了，说要牢记今天。有的刚辞了职想换份工，毕业的也来打个卡。人们想来寄托各种东西。好多人还把我们当鬼屋来体验。

不是密室逃脱和剧本杀，那都是后来才有的东西。我们是个哲学产品。其实我们的乐趣在创造，不在服务上。后来有人找来要加盟去别的地方开，我们理也不理人家，媒体也是，报道根本不在乎。后来我发现天天在想怎么卖票，因为我们团队没人去搞销售或者管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见过钱，小钱看不上，大钱又没本事，所以把自己搞尴尬了。到2019年底，我们撑满三年，就把它关了。

不过我有个发现。我开了馆，等于是让人体验我——就是来的人会把所有对死亡的疑问、对答案的探索压力全部投射到我身上。甚至我莫名其妙就占领了死亡这个话语权，要跟佛教PK，要跟基督教PK，要跟心理学PK。我相当于是个庙。这样不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死亡咖啡馆”活动是对的，是把“死亡”（话语权）还给你们的。

死亡咖啡馆活动其实在2014年王莹去德国学习了以后，就断断续续开过。它是一个沙龙活动。当时（我的精力）都在死亡体验馆上面，就忽略了这个事情，只是偶尔开开。后来我就跟王莹一起搞带领人培训。死亡咖啡馆在家里也能开，在野外也能开，在哪里都能开，只要你有一个私密的空间能够把大家聚起来，就相当于一个组织者为大家提供的一个场域，核心就是讨论死亡，唯一的主题。什么话不说，听一下午也行，也算是有个假设——假设你增加了对死亡的意识。

（和死亡体验馆）最大的不同是参与者有更多的代入。体验馆是按照我的流程走一遍，就像参展一样，死亡咖啡馆相当于你自己参与到艺术创作里。

不同带领人确实有水平差异，这反而是好的。因为每个人死亡都是不同的，没有人能够代言死亡这件事情，也没有一个人有唯一的答案，宗教都做不到，是吧？

所以这几年一直在推这个事情，因为看到它跟死亡的属性是最接近的，一样有不确定性。你也不知道今天办活动的带领人怎么样，心情怎样，背景怎样。

我们不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就给出个场域来让你能够讲出来。我们认为你能够讲出来，对你自己来说是好的，包括重新去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死亡咖啡馆不是实用主义的，因为解决问题的永远是有问题的人，这是自己要做的事情，不是别人的责任。

其实2019年培训的时候，我们想的比较简单，就跟志愿者们说，你们自己去开，毕竟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就把手册发给他们。结果没人去开。他们害怕，觉得说万一有人问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怎么办？还是给我们培训一下。其实“死亡咖啡馆”带领人的培训是这么来的，是我们鼓励志愿者们去开活动的时候，大家都还是按老的习惯，说需要培训一下，心里有底。

2019年民生银行还支持了一下，拿了个项目，跑了5个城市，根据国家的临终关怀试点城市来的。我们按照经验，最早都是从倡导开始，等到当地有条件了再开展临终关怀志愿服务，这么一步步地深入。那么死亡的议题就有可能进行得更深入，对吧？

结果2019年培训完了，几乎没人去开活动。当时培训很简单，就一天，还有一天弄了个安宁课堂。就是临终关怀和死亡咖啡馆是一起的。结果全军覆没，既没有人去做志愿者，也没有人去开活动。

还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你想想看，到今年居然还有的地方，带领人发死亡咖啡馆活动招募还被举报，就有人看到“死亡”两个字不舒服，觉得是负能量。还有一些阶段性的事情，比如去年开会，所有帖子都发不出去，因为带“死亡”。

2020年开始培训变成两天，后来又小班化，去年又升级一下，也就是第15期，90%的人都去开活动了。正好社会也到了一个需要这种类似支持方式的时候。就像汶川地震是中国公益的元年，疫情三年也是我们真正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为什么而活”这件事情的临界点。希望它是。

最关键就是很多人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而生活了。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小孩，开始从自己出发了。

以前你以为幸福一定是大房子、有车子、有保姆对吧？后来没想到，两个人有话说，在家里也有话说最幸福，对吧？两个人一起干着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也很幸福）。没有那种对明天的焦虑。有时候不光是自己，你知道如果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不够，对方会激发你的焦虑，你碰到一个老是不满意的人，也很心烦。

现在主要做死亡咖啡馆的推广，还有招募临终关怀志愿者。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政

府项目,靠筹款过日子,然后培训。你要不现在就成为我们的月捐人?我要做出一点姿态,不然王莹老说我筹款一点不积极。我出来一趟你得对得起我这个瘸子是吧?

不是,我本来(脚的问题)以为是痛风。就是之前——其实我本来已经在戒酒了——有个包头来的头部殡葬公司,它们也想做临终关怀,和他们吃饭,喝断片了,出来就把手摔断了。这是之前的事。然后之前做培训回来,拎行李箱,中间换了个手,结果绊了一下,没当回事。以为是痛风,后来肿起来,发现是骨折。

来,一杯奶茶的钱嘛……(找二维码,找了半天无果)……你看我确实不擅长跟人要钱。

其实跟你讲讲想起来了,当初也不完全是因为吃喝嫖赌,其实也有自信心受到打击。有一笔巨款没收回来,以前我做生意的时候也是不太擅长要钱,然后都是按信任做的,货要先押就押出去了,然后一直没踩过什么雷,然后最后踩了个大雷,就说是那家企业倒闭了。那件事很复杂。然后又经历了胃穿孔,整天吃喝,把胃吃坏了……被推进医院一刹那,也有点开了一个什么东西,突然觉得做生意这件事情没意思,对,突然有点不积极了,对,人生,很难讲……

Q: 最近在做什么事?

A: 做培训、做客服、养伤。

明年要开启一个子命题,也是来自于死亡的,“正确认识哀伤”。会更接地气一点,我发现人还是要解决问题,太抽象的离生活还是远了一点,能具体解决问题的也需要。

Q: 那你最近要解决什么问题?

A: 月捐人数。今年连基金会都开始卷了。我们是没有公募资格的,只能是提供服务来造一部分血,但是靠这个不行,我们还要靠筹款,筹款就必须有一个专项基金账号,所以我们要在这些公募基金会下面开设专项基金账号,那么他们对专项基金账号是有管理的,那么今年开始也有KPI了,要我今年一定要比去年人数多。

Q: 想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A: 我们天津的一个带领人邹似玉,就感觉她的人生整个转换了吧,也不一定是做了我们带领人的关系。反正各种折腾,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位女性,属于“人狠话不多”的那种。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 postpost 新店内的蘑菇雕塑

专栏

054 萧勇 一个网红店主的日常“战场”

杨樱 | 接力访问

他的商店最想做的事，
是让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攻击”。

萧勇挺好看的，用上海话就是“卖相好”。懂得捯饬自己，复古卷发，小胡子修得整整齐齐，在每天的袜子颜色之于造型怎么能又呼应又不抢戏这个问题上一看就是熟手。我们本来约在他家在羊肉胡同的书店，而后发现彼此都在北京 abC 艺术书展出摊，还离得很近，于是改为书展旁边的星巴克。四天书展每天 7 个多小时，萧勇一个人守摊，说今年还算轻松的，到了第四天还能聊天，以前更苦，带一大瓶水就这么站着说一整天，几天下来嗓子肯定完全哑了。

他带了一本书去书展，觉得肯定招人喜欢。书名叫《We are __》，每页一张可爱铅笔画，底下都带着一个 we are，横线部分是手写体，后面跟着括号。举例来说，我们都是汶川人，括号里跟着 2008。不过这是外国书。也有一些东西不带年份的。比如说我们都是 trolls。萧勇说虽然他在美国待多年，这词他不熟悉，上网查，发现是钓鱼的意思。那一页配的画儿是一个戴着小妖怪头套的键盘侠。trolls 作名词解，就是水军。比如詹姆斯的粉丝特别讨厌科比，就在网上故意发骂詹姆斯的帖子引战。萧勇举例完毕，说这种书他平时都会留一点，店里走货太快，得 hold 着点留给书展。没想到今年还得还回店里。

书店叫 postpost，写稿这会儿已经有两家了，新店在三里屯，地址“幸福三村五巷”，据说原来是电子厂的工人食堂，也有说是使馆区修建时的建筑工人食堂。这些都是写在公众号里的。[这篇新店开业预告](#)阅读量 1.6 万，第一条评论 id 定位在英国，说“都挺好的，但为什么要开在 fucking 三里屯”。有三条回复，包括萧勇那条都在老老实实解释这不是传统的三里屯商业街，要隔开点儿距离。只有一条简洁有力：用市场打败市场！

说这个话的人要么是萧勇的精神同路人，要么就是看了萧勇在上面写的一段宣言心有所感。聊天的时候萧勇特地翻出来那段话给我看。文章的最顶上，一段黑体字：“真正的激进批判力应在市场的缝隙中偷偷生长，布满伪装。这不再是天真的街头时代，美

术馆也早变得圆润可人。我们需要的是充斥着诱惑但内部满是倒刺的琳琅商品，和乔装打扮成销售员的刺客。市场才是真正可爱的战场。”

看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聊完了美术馆的那个部分，也聊完了旧金山。萧勇在旧金山应该经历过不少事情，但他最经常提起的是两件事。一个是自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过一个艺术书店，卖的东西和北京的差不多，客群不是艺术同温层就是苹果谷歌的 New Money。他学注册会计师，觉得这不靠谱。“如果挣一千个人的钱，每个人一块，风险就比较低，因为一千个人同时不买的可能性很低；但如果只挣 10 个人的钱，来个什么经济危机行业变动，很可能一下子就承担不了这种风险。所以觉得这么经营下去没戏。”

“另外就是，如果我的书只卖同行，只卖艺术爱好者，等于我对这种所谓的社会生活没有任何搅动，就仅仅是卖给同好而已。”

所以旧金山影响萧勇的第二件事就很重要，奠定了他的行动方法论底色。萧勇高中毕业去美国念书，靠卖复古相机养活自己，就此结识不少艺术家。念完注册会计师之后，朋友建议他去考艺术研究生，正好拿到了奖学金，他就去读了。上学体验乏善可陈，只有两三个老师让人眼前一亮。其中一个男的，是个小胖子。萧勇觉得这就很了不起：“你想旧金山那种氛围，大伙儿都是越瘦越好，越瘦越精英。得锻炼，得吃蔬菜，不能有吃肉的道德负担什么的。”

小胖子老师上课不讲 PPT，捏着几张小纸条。有一次问大家，你们看《行尸走肉》吗？别人表示不看，我是做艺术的，我看这个我还纯洁吗，我还能做艺术吗。小胖子老师就说，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都在阐释已经发生的事情，但马克思和之后的人都想改变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不看《行尸走肉》，不看《和卡戴珊一家同行》，你怎么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我就什么都看，看的时候也全身心投入。

“换在中国，就相当于问艺术圈的人，你看《乡村爱情故事》吗？”萧勇说。他在几个访问里都说过这事，有的时候会把《乡村爱情故事》换成《乘风破浪的姐姐》。大致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得在大众实际活跃的地方战斗。什么叫做战斗呢？“是把那些所谓左派的观点传达给不知道什么是左派的人，需要让这些不了解左右的人或者根本不了解左右的人，或者故意把这些方向搞错的人，能在一个地方看见他们不理解的、挑战他们日常想法的东西。这就是搅动。我觉得书店没有左右之分。有的时候一个东西真作用到某个具体的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导向是不好说的。”

这个时候他找出了那段宣言。

和这个理念相对的就是美术馆。“美术馆这东西它已经毛都被捋顺了，是吧？你想在里边发声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你在里边发声，大家会带着盔甲过来听了，或者说直接带着消解你任何毛刺的那个工具，所以你在里边发不出什么声音。发出的声音，也只是装饰性的声音。”

“这跟作品无关，只不过是因为这环境它消减了这作品本身的毛刺，如果你把这作品，好比说直接给他拿到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然后让人——比如说我——正购物或者正在这网红消费，突然看见一个我不理解的东西，这东西让你睁住了一两秒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你表示不解甚至表示愤怒。这个时候所谓的作品也好，或者你自己做的某个行为也好，才做功了——它让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攻击了。”

“美术馆最大的问题，它不会让你毫无防备。它会让你充满防备的情况下，接触到一些所谓左派的这种批判的声音。”

萧勇在毕业之后在旧金山的画廊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个注册会计师毕业之后为什么会去画廊上班，我没有问，可能也和复古相机带来的机缘有关，也可能不是。总之旧金山之后他回到了北京，postpost 于 2019 年开业。选址秉承“搅动大众社会生活”的宗旨，选在了羊肉胡同。

萧勇是一个表达能力很强的人，就“为什么是羊肉胡同”这种话题，他不紧不慢的语速恰好可以和挨个报出来的地名合围出一幅画面，让你觉得确实有点意思。

“它南边是金融街，算是北京的陆家嘴，一样行政规划出来的，国贸那是属于自然生长。隔壁是国务院机密邮件收发室。胡同西口是政协礼堂和政协礼堂演播大厅，东口至自然资源部，正对面是开心麻花剧场——开心麻花在北京也是在喜剧演出里地位很高的。东南边一点是一个老教堂，一到什么圣诞节之类的，戒严。然后自然资源部北边一点，过马路，是广济寺，北京求姻缘特别灵的一个寺庙。羊肉胡同以前是卖珠宝的，民国时期就是。建国以后可能就因为那是卖珠宝的，就把地质礼堂搬到自然资源部的旁边，可能是这样。”

“所以周中的时候，一天从早到晚来的人还挺不一样的。中午的时候会有政府机关的小年轻，工作人员，还没彻底被官僚体系的生活弄得无精打采，中午还知道出来逛逛，

喝杯水什么的。上午极偶尔会来那广义寺里的小和尚，我们还会给他们找点音乐，看一下他们的反应。后朋克，节奏比较清晰，但不太混乱，鼓点非常重，但非常整洁的，主唱的嗓音通常有点暗黑那种，想看能不能有什么反应。也没什么反应，至少不讨厌。下午就会有金融街的白领或者他们的头来开会，那种恶俗都市剧里那种情节，一说什么数字都很高，让身边的人乍舌那种。文艺爱好者可能起得晚，现在网红也比较多，也是下午和晚上，5点以后。”

搅动市场没有考虑上海？

“我天津人。毕竟北方人，人情世故还是日常饮食，还是得在北京待一段。”



店内的教堂椅



法院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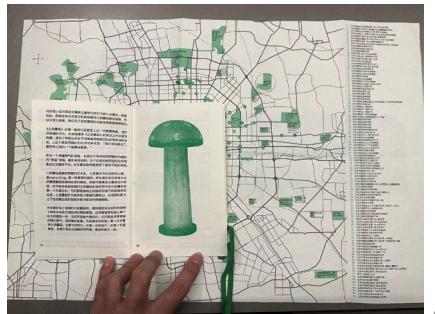
萧勇的店被称为“西城之光”。公众号“乌云装扮者”说的。“乌云装扮者”去看 postpost 的三里屯新店，把萧勇指点出来的每个彩蛋都很高兴地记录在公众号里：来自沈阳的教堂椅，背后可以放独立出版的小册子；来自斯洛文尼亚酒业协会直接推荐的红酒单，“搭配”齐泽克享用；店门口上方生锈的小铁牌，翻译过来是“危险！你即将离开西柏林”，是从柏林墙上下来的……

这些彩蛋让我思考了一下萧勇的“战场”。你当然可以说这些都是伪装之下的激进批判——柏林墙和齐泽克和整个书店——但是伪装和内核的配比应该是怎样一组数字呢？是一个皮很厚很厚一口咬下去也没看到馅儿的包子那样的伪装，还是脆皮雪糕外面那层脆皮一样的伪装？如果“战场”充满了噪音，人们是否能穿透伪装，到底取决于什么呢？就好像萧勇把来 postpost 拍照的网红——他们都举起一本以表情为主题的书挡住了脸，摆出各种 pose——又做成了一本书。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在看什么，不由萧勇说了算。但他是做这本书的人。这是他不一样的地方。



[推荐萧勇的 Dika](#) 对那本网红影集记忆深刻，她还提到的就是“蘑菇”，另一本萧勇做的小册子。

“蘑菇”其实很有名，它最早是个艺术项目，记录在北京街头寻找“蘑菇”的两个人对于这个城市设备的观察和思考。“蘑菇”是什么最终也没有一个官方说法，这就让它进一步变得有传播力，总体说来，它两米多高，冬天会冒热气，有人说这是一种热力装置，有人说这是核战爆发后的储备粮仓。萧勇和项目的作者共同决定，把这些有人说做成一套书，一本叫《北京蘑菇寻找指南》，另一本是它的别册，记录更多社交网络的回应，也邀请读者参与。



蘑菇

我觉得挺有意思，把这些都收集了，收集来之后，又上热搜了，上热搜之后就更有意思了，连“平安北京”都转发了。然后底下我又发现更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蘑菇书的作者之一，叫刘张伯龙，显然就是妈妈和爸爸一人一个姓氏。底下就有网友说，真不知道这日本人在干些什么鬼东西。我们就把评论加进到第二册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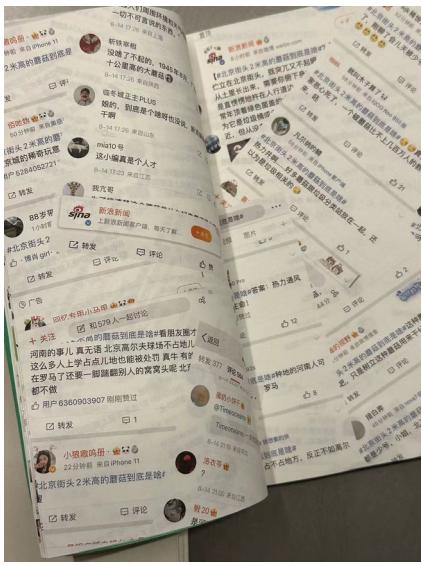
你知道更有意思是什么？你知道热搜里有一种评论，跟这条热搜本身没关系的，是因为另外一条热搜犯了红线，宣传口给拿下来了，或者有人公关，联系微博买掉了，但网民那愤怒还在，那帮人怎么办？就得找到现在热搜里比较弱的一个，在底下评论，宣泄他们的愤怒。

那条“蘑菇”底下就来了很多。当时有一条热搜被拿掉了，是河南某个大学用地被法院判为非法用地——这两年农田也变成了一个问题，什么退园还耕之类——然后这个大学用地就被判定为非法了，大家就非常愤怒，然后就来底下评论。有一些人就直接说这事，就说“为什么河南这个大学都算违法，还是北京人的命金贵，盖这种破蘑菇的地方都能白给，我们河南人建大学就不行”。

我们就把这些评论也收集来，放到第二轮的别册里，并且这别册绝大部分的内容是大家投稿。我们让大家也去找找自己附近的蘑菇，给我们投稿，一个是再加点文字，一个是你觉得它是干嘛，一个是你觉得它能被用来干嘛。因为我就觉得在国内好像很少那种公共张贴的地方，欧洲有那种给大家贴海报什么的，就是美国也有那种建筑的侧墙，咱都是玻璃铝合金的，中间贴报纸那种……就希望更多人参与进来。可能得有百十来号人投。

那天聊完，我去 abC 萧勇的摊上买了一套“蘑菇”。两本绿色小册子，质感挺好，盛惠 170 元。惊了一下。旁边凑过来一个女生：“这就是那个‘蘑菇’吗？”像个暗号一样。

postpost 其实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填补信息不对称，萧勇是个买手，他找到的杂志也好书也好服装品牌也好，在国内都是少见的，他不喜欢和别人卖一样的东西，另外



蘑菇

他还喜欢看一个产品的综合坐标。以书为例，除了这本书的内容本身，萧勇辉看它出现的时间和市场走俏（如果有的话）的时间，这些社会的综合反馈和书的内容本身一样，是一种叙事。“蘑菇”也是一个道理。

另一件事是联结。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是一次 T 恤创作。

我 18 岁的时候那会儿刚离开天津，一个同学送了我一大堆卡夫卡小说，当时就觉得酷，为什么？因为看过《海边的卡夫卡》，也没明白什么意思，就喜欢那本书。我到处吹嘘看过。然后特别好的朋友说，你喜欢，那我给你买个真的卡夫卡。来了一堆，当时看《城堡》、《审判》，也看不明白，然后当时注意到有一本特别厚的合集，里边有一篇小说叫《算了》。一段话，就讲有个人早晨起来到了一个陌生城市，他赶时间去个地方，迷迷糊糊走到一个钟楼，一看时间快过了，他就问警察说我想去这，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然后警察就露出诡异的笑容跟他说算了。

对，当时我不太明白，过了好多年我还不太明白。

但是疫情以后，我觉得这事已经不需要被抽象化把它变成象征了，它已经变成真的故事了。它都不是寓言故事，它是写实的。我想出小区，跟保安说我想出去，保安说你出去什么，这都什么时候，算了。

我就立刻想到了这个不太明白的故事。

然后我就想，这个事儿怎么能用上，然后又不太敏感。不如就跟人合作点非出版物类的，然后就联系了 7 个作者，各行各业的，有服装设计师，有建筑师，有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有漫画家。我就把小说给他们了，没引导他们往哪个方向想，就说你们可以随便看，看着这小说想到什么，就可以把你们思考过程用文字也好，图片也好，画画也好，任何类型材料给我一个反馈，然后我再把反馈给到一个设计师那里，让他 layout 到一个我们设计的衣服上。

从目前已经收着的东西来看，大家想法截然不同，有人完全没往政治方向想，有人往特别浪漫的地方去了，有的人就把它变成一个看似比较可爱，但实际上你往深处想又觉得比较诡异的东西。

疫情让萧勇担心，不光是担心自己，他觉得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不妙。他的发小在通用电气上班，疫情期间飞机航班量猛降，通用收益也受影响，因为日常收入很重要的一块就是飞机维护。再到书店隔壁邻居，卖饺子皮的，还有他自己，都是一样动弹不得。羊肉胡同的店 2023 年合约到期，不确定是不是能续约，也是开新店的一个原因。

不过以 postpost 的势头来看，新店最主要还是在解决产品不断扩张的问题。产品的背后是声量。萧勇的战场理论是一回事，商业战果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他也极为勤勉，产品的种类和轮换速度都是以海关放行速度和国际物流成本为代价的，这还不提他成天找来找去的时间。这其中当然有一万小时熟能生巧的信息积累，但最重要的还是热情。

自从萧勇提起小胖子老师的“战场理论”，我就觉得他有后半段没有展开——要把市场当成战场，“想”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就好像萧勇说小胖子老师，谈《行尸走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德勒兹，而且照样不用 PPT，2 个小时都能让人不走神。这是一种

能力。

那把教堂椅在“乌云装扮者”的图片集里也出现了（文章叫做《幸亏有了这些新店，三里屯又好玩儿了》），靠墙放，看着油亮，没啥破败感。原来放《圣经》的地方放着武汉艺术家子杰做的各种小册子。子杰挺高兴。萧勇也是。因为他终于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那些小册子太薄了，不太好放。放书架上容易倒，摞一块大伙总是翻最上面那本。如今很完美。

我原本以为萧勇会说，终于给这些总是过分言之有物的小册子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椅子是从沈阳一个倒闭的教堂里来的——很有双雪涛的小说感——挂在闲鱼上出售。萧勇和神父打招呼，神父啥也没说，先回了一句“以马内利”。吉祥话说过之后他们加了微信。因为神父回闲鱼实在太慢。椅子二米一，最后跟着从沈阳到北京的本地运输队到了萧勇手里。

“网红来打卡照相的时候，一坐下就能看到小册子。有的人就拿下来翻一翻，有什么用不知道，但至少解决了技术问题，还能平放。”

这让我想起萧勇和播客“余生皆假期”聊天，当时三里屯的新店还没开——其中一个聊天小标题是：“微博的书店，大众点评的咖啡店，小红书的背景墙”。嗯，厉害。

Q: 你最近做的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A: 另外一把椅子。也在新店里。机缘巧合，是从石家庄一个法院收来的法官椅。椅背高度一米七，我是从一个健身房老板那收来的，他家里有法院的亲戚，小城市退役下来的，就被他拿来在网上变卖。他还不想卖给我，说椅子 150 元，运费差不多三倍，我不能坑你。反正沟通一个半月，最后都沟通熟了，他都跟我说兄弟我失恋了，你再给我几天。然后寄来了。

寄来了看着就有意思，就想给它弄完，弄完之后感觉不平，也许是地不平，我就直接给前腿一边砍掉一截，然后我们邻居在装修，弄两块砖垫在右边，喷成金色的。我们正好在卖一个日本品牌的 10 年制笔记本，(比划一大截) 这么厚，正红色封皮，就给它插左边那个口。所以椅子现在前腿一边两块金砖，一边一本小红书。顾客问为什么这样，我说没什么，自己想的。

可以坐，当然可以，必须能坐才能被人打卡，才能被很多人看见。我们在做的事情就希望它获得最大程度的传播。

Q: 最近你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

A: 招聘。有很多文艺爱好者或者艺术从业者挺想来我们这儿工作的，做店员咖啡师之类。但我可能有刻板偏见，和以前经历也有关，就是学艺术的或者从事艺术的，一开始觉得还挺好，我来试试，人间观察一下，但工作一段时间就发现这就是粗鄙的劳动，还得刷杯子什么的，特别累，受不了。最近也有朋友的朋友，我就说了这些，他说认真考虑，我就在想是不是再给我自己一次改变主意的机会。

有人认为书店太好了，实际日常工作很辛苦，和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在打交道，又不能过于软弱，也不能过于强硬。然后想培养什么，我感觉我这也不是特别成功。

Q: 想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A: daze。他白日有正常的工作，工作之余又是播客“西海之声”的主播。在两种生活模式里自由切换对我来说就是公共性了。比如，如果民政局职员下班之后还能去 techno 场景 dj 一下，很难想象他白天还能以混吃等死的状态活着。我感觉在几个生活圈切换着生活对于产生共情能力挺重要的。很好奇他在 fruity space 主持西海周年活动时的精神头会不会出现在白天的工作岗位上。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文内图片来自 shifter 公众号



案都不合适。她要做成一个免费供人参观和布展的空间。

在解释的理由的时候，苗苗是这么说的：“我是 2004 年来的北京，经历过北京最好的时候，当过真真正正的文艺青年，也享受了这座城市最可爱的那些年。我觉得那时候营商环境很好，开一家店做什么都很容易，所以有些人在实体空间里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很多事情都在线下发生。可能当时没什么展览之类的概念，但只要是开店的人，多少都在为城市人文贡献一点什么。司空见惯。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觉得北京牛逼，因为它就是这样的。”

“那个年代之后几年，开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前年轻人在咖啡馆讨论剧本，后来开始讨论 AB 轮的估值，讨论互联网项目，开始变得没意思。北京从 2017 年以后整治拆墙打洞，那之后我虽然还生活在北京，但能感觉到开店人的变化，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不再有那个状态，没那个心气儿，就是因为没法有了，成本也高，迫于生计。”

然后就是过去三年。她说，这个展览空间有没有人领情不重要。虽然作为一个开在北京城中心的店，30 平方米无法产生任何坪效是件很不划算的事情，但这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分享欲，就好像你想去爱你爱的人，不会去图什么回报”。

我理解苗苗是在回报当年她喜欢的北京，一种曾经存在过的活力和亲切，至少是她感受到的那部分。

苗苗出生在 1988 年，宁夏石嘴山。她是这么介绍这个地方的：“宁夏只有两个地级市，省会银川，它的车牌是宁 A，然后另外一个宁 B，就是石嘴山。一个 1970 年代被我们国家生造出来的城市，面积巨大，全是移民，五湖四海的人生活在自己的小宇宙里。所以我们从小就说普通话，也没有自己熟悉的所谓地方风味，因为我们就是哪儿的东西都吃，同学哪儿的人都有，每家文化也都不一样，每天都有碰撞，就是这样一块长大的。”

论父亲那脉，苗苗应该属于安徽人。爷爷奶奶在饥荒的时候逃至辽宁阜新。爷爷在煤矿找到工作，因为石嘴山发现煤矿，又把全家都带到了这里。

苗苗是个成绩优异的“三线子弟”，小时候读书跳级，16 岁就考到北京，学的是历史。因为憧憬奥美，“忤逆”父母没有考研，去奥美实习。又因为另一个阴差阳错（主要是当年奥美过于景气招聘名额紧张一时没有办下来她的三方协议），她去了一家猎头公司上班。在描述当年入职决定的时候，苗苗是这么说的：“它在北京就是一个 office，总共也就是十几个人，但是去了以后我都惊呆了，我觉得里面的顾问和 director 就是我在美剧里看到的精英的样子，整个人受到了冲击，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体验！”

她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一年，同时还开着一家店，卖港式甜品，在北京胡同里。她是个勤奋的人，当时市场竞争也不充分，客户挺多，来的人也都不错，所以当他们知道苗苗突然把开了六年的店关了的时候都挺错愕的。而苗苗的理由听着也很像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会有的想法：我的同辈都在带团队开拓视野积累财富，我就守着这个店，没有更多商业经验，也没有社会参与感，我能给我的品牌带来什么？这样不行。

采访的时候我一直在感受苗苗的这种上进心。也不完全是上进心。就是那种很蓬勃的公司人气质。对商业文化的向往，以及以此构建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尝试——钱倒不

专栏

055 苗苗 一个高速发展时代的 进取青年在一切慢下来之后

杨樱 | 接力访问

她问自己，“我的社会参与感是什么？”

苗苗在 2022 年春天启用了店里那块空地。说是空地，其实是个美术馆那种白盒子，只不过苗苗把它刷成了灰色。

到现在为止，灰盒子里举办过五次展览，都跟自然人文有点关系：来自世界各地的树（摄影）、花的局部（油画）、北京的古建筑与其周边自然环境（装置）、丛林动物（玩具装置）。

最近一期的展览有点特殊，是来自田里的垃圾。某日朋友带了一个人，说对方想找一个展览的地方，用以展示他经年累月在田地里劳动时候清理出来的垃圾。这个叫做王子鹏的人在北京郊区有一个按照自然农法耕作的农场。他把各种土地垃圾收集起来，其中大多数是以前生活在此地的农民遗留下来的物品，比如塑料薄膜（数量巨大），还有农药包装袋、建筑垃圾、零食包装，甚至还有做农活时候的裤衩鞋袜……

这些东西听着脏兮兮，但苗苗听完王子鹏的叙述，觉得特别有意思，对他说：这个展览我来弄行不行？

最终展览的名字定为“当我们翻阅土地”。一个田间“考古”展。其中最特殊的展品，是一只小狗头骨，从牙齿看，死去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常见的中华田园犬。也许是某一任住户的家养小狗在此寿终正寝。展览之后不久，酒吧推出一套 farm to bar 酒单，酒的原材料——番茄、紫苏、罗勒、无花果——都从王子鹏的有机农场来。

苗苗是一个酒吧老板，灰盒子也在那家叫做 shifter 的酒吧里，叫 shifter silo。那原本是商场硬塞给苗苗的一处空间，整整 30 平方米，按照设计和施工方的主意，适合切成两个包间、4 个卡座，或者干脆做一个豪华私密包间。苗苗思考了 2 天，决定这些方

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规则和可能性。这一切是学习的基础，规则保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是有价值的，而可能性代表了自由和创造力。苗苗对奥美的向往并非没有道理。而这种感觉，在我和苗苗聊天的时候，已经不约而同使用过去时态来描述它。

苗苗关闭第一家店之后去了一家势头很好的互联网公司上班，给她 offer 的人是当年甜品店里的顾客，也是公司创始人。当时苗苗不过 23 岁。听苗苗复述在这家公司打拼的时光，一来是觉得自己仿佛在看青春职场剧，二来发现苗苗只要提起类似的公司往事，语气都是一样鸡血，仿佛昨天刚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一样。

2017 年，苗苗开始思考从来没想过的一个问题：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她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之前想做什么就去做，做了也真的能做成。那当那些顺理成章的事情消失的时候，她应该做什么呢？

她的答案还是开店。这就回到了我们聊天的开头话题：你作为一个不喝酒的人，为什么会开一家酒吧。也是邀请她接力的 Sally 给出的理由：苗苗身上的行动力，让 Sally 提出残障人士在 shifter 行动不开的时候马上就着手改造，而且作为一个不喝酒的人，对酒吧的热情也超出了她的想象。



shifter 店门口的无障碍设施

之前接力采访过的东威也说自己不喝酒，酒吧对他来说是一个让可能性发生的空间，比如邀请纹身师朋友来做驻点工作坊。对苗苗来说，开这个酒吧是个偶然——开店是必然，酒吧是偶然——当然她只想让自己回到实体店这个轨道里，她想过，这事她能开开心心干到死。而我后来意识到的是，苗苗是把开实体店这件事当成了挖掘自己的一种方式。当年在企业干活时候对创造力和学习的追求如今反向投入到了自己身上，而店不过是自己的外在表达方式。

酒吧的偶然性是这样的：苗苗遇到了一个业主，业主有一个三层小楼，希望差异化经营，留给苗苗的三楼必须是个酒吧。压力给到了苗苗这边，她接了，理由很简单，她对空间有感觉，她能想到她利用这个空间做的各种事情。这是她的过往经验培养出来的商业直觉。

后来这个酒吧搬到了金宝街，北京的某个 CBD，离苗苗心中的神话公司奥美一步之遥，也把她对空间的把握能力发挥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这条街上不缺乏大型品牌和高级消费，但是平静的、文艺的、有个人感情投注其中的消费场所却并不多。从市场定位的角度来说，shifter 的选址很不赖。

shifter 开业的时间是 2019 年，也就是它存活至今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疫情期间的种种不确定性搏斗。作为一家活过了疫情的店——其实不容易，因为酒类贸易的价格被互联网挤压殆尽，线下的酒吧必须有自己存活的方式，还得面临各种控制和行政压力——shifter 的发展速度在过去的苗苗看来不值一提，但现在她不会。“过去我会非要把自己一个雄心壮志，但在这三年之后，我发现应该顺势而为。在餐饮这种强执行型的工作，要处理一个品牌还要有创造力，你首先要照顾好你自己，然后再去工作，有的

时候也可以不要那么努力，只要大方针不变，你持续去做就好了。”

我以为苗苗要跟我说这是她面对不确定性之后的人生哲学。但是她的回答出人意料。

“我觉得不是过去三年发生了意外，而是这三年开始终于正常了。我们以前的人生不正常，经济需要多少速度，稍有跌落就有问题，一个月赚多少钱是正常的，少于多少就不是正常的，一个人要工作多少小时，少一点就是不正常的。现在大厂疯狂裁员，每个人也不会给自己设立多么高的月收入 KPI 了。这是正常的社会，去掉了癫狂发展中的幻觉。”

苗苗把这些话说给很多人听的时候，对方经常会被冒犯到。苗苗对此的理解是：“可能 80、90 后从出生开始，经历的就是一年经济比一年好，30 多年来已经固化了，就是一年会比一年好。然后个人说不要这么天真了，或者说没有这样的期待，你还可以更幸福一些，ta 可能就很生气。因为很多人依然希望自己活在一年比一年好的感觉中，这样还有希望。”这些听众有时候还会被激怒，以至于到后来苗苗就不再尝试表达类似的观点了。

她是从生活方式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供需的角度看待如今的社会状态。换句话说，她在探讨的是平常心问题。一个非常个人的视角，也是一个当年受益于高速发展经济的人可能会有的视角。这种安全感和乐观会激怒焦虑的人。大家希望增量可以解决已经存在的压力，当增量消失的时候，很多人的机会随之消失，几乎很难想象“慢下来”之后自己还会有“幸福”可言。

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是苗苗一种自我纾解的方式。她的心态正在往“健康”的方向调适，但她依然还是一个努力的老板。有点太努力了。

我们本来约在上海见面，因为她说她正好带着团队来上海探店——这是职业习惯，如今她花大量时间去学习酒吧运营和研发是怎么回事，也要知道行业的流行和动态——从早到晚探三三十个，也许会有几个小时的空档，让同事自己去逛，和我聊聊。

我们最终没见上。因为苗苗问我：晚上晚点儿方便吗？

我想了想，小心翼翼地问：八点算晚吗……

她回得很快：哈哈哈哈哈哈，要不咱俩还是回京后语音吧。

我又想了想，决定不问她说的“晚点儿”到底是几点了。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会开一个新店。

Q: 你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吗？

A: 好像都是工作上的问题，那就一个一个去解决就好了……最近在努力多约会，这算吗？就劝自己多给自己留点时间什么的，不能算问题。

Q: 想邀请谁来接力？

A: 王子鹏老师。关心土地的人不多，愿意亲自去做的就更少了。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Jean Béller](#) on Unsplash

专栏

056 小饼干 “不仅仅要有审美， 还得是个好人”

杨樱 | 接力访问

梅若每次面对媒体讲的都是女工伙伴的故事，
这次是她自己的。

小饼干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出门散步去”。这个号的介绍是：“一个在北京散步的女性主义文化小组，定期举办观鸟、城市游览、读书、观影、手工等活动。只有在散步时，我们才真正交谈。”

“只有在散步时，我们在真正交谈”。加上小饼干微信之后，我跟她说这句话挺好。她说，这是小飞机场呀。对哦，这是 My Little Airport。他们已经在内地消失很久了。

关于小饼干的功课很难做。除了公众号，几乎没办法准备什么。[邀请她接力的子津](#)说她们有一些“共同经历”，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我猜测是一些压力，不得不直面利维坦的荒谬和残忍。后来和小饼干聊起她的经历，大抵差不多。

和子津一样，小饼干也在 NGO 工作，主要工作是反家暴。她出生于 1995 年，最早参与 NGO 活动是在大学，还在研究生阶段专门学习了社会工作专业。接力访问里 NGO 是一个很常见的人物背景，但每个人涉足其中的契机都很不一样。对小饼干来说，NGO 是一类行业，并不是其中所有的人和事她都喜欢，但总体可以回答那个对她很重要的问题，“我该和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在大学的时候她就想知道，“除了赚钱之外，一个人还可以干点什么”。这当然是一种生存安全感，但也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有的好奇心。在她对 NGO 一无所知的时候就是如此。应当说，去做 NGO 是她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动机。

不过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小饼干的经历，而是她在描述这些经历时候的口吻。平和冷静，仿佛在说一个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干脆就是别人的事。子津说这位接洽者“勇敢又可爱”，确实如此。她好像不知道尖叫是怎么回事。

以下是小饼干的口述，出于阅读方便，顺序有所调整。

我是 2018 年上研究生，2013 年上本科。中间有一年去了乡下。

本科学汉语言文学，其实先学的是管理。管理我受不了，觉得好夸张，大一的时候同学们都在想怎么赚钱，我根本还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一口咬定要转系，其实老师对我挺好的，还给我介绍兼职什么的，让我去做家教挣点钱。我就说我待不下去了，要转一个让我读书的系，所以就转到汉语言文学去了。

我当时对汉语言文学学什么一无所知，我看到同学们都在看小说，我就想这样看书也没人说什么，挺好的，然后就去了汉语言文学。我很喜欢这个专业，它给了我一个极大的信心，就是人可以不想挣钱的事，这样合理而且高尚。就这样过了一两年，我又觉得它对社会的参与太少了。

我们考试题目都是那种“鲁迅 8 篇《故事新编》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有人就问学这个干嘛，老师就说，我们汉语言文学是不培养作家的。那时候大家就有点悟了。老师又说，虽然我们不培养作家，但是我们会培养出有审美的一代人。我当时听了有点崩溃，我不是仅仅想要审美的，我想要点别的，我至少得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什么。

然后我就在图书馆里看到一套书——其实很早就有了，但那个时候我才看到——是翻译过来的教材，华东理工出版社出版的，讲社会工作伦理。这样我才了解原来世界上有个学科是以伦理作为基石的，它要求你是一个好人。我觉得这个学科很好玩。

就这样看了一些社会工作的书，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接受它的价值观：不仅仅要有审美，还得是个好人。

当时也听说一些朋友是学这个的，他们就说社会工作会学习如何帮助别人，我听到之后就觉得自己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最开始要离开管理学位，是因为那要教我赚钱，完全以自己的目标为导向，然后社会工作的核心居然是利他主义的，我就觉得太离谱了，不是太离谱了，是太神奇了。

本科毕业了就参加了小鹰计划（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起的青年发展培养项目，“旨在发现支持具有天下襟怀的青年，沉潜中国乡村”）了，我记得当时的老师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做农村发展，会介绍一些他们在农村做的工作实务，还有实践经验之类的。小鹰计划本身是一个为青年人服务的项目，不是为乡村服务的，它只是把你送到乡村。

我有个双胞胎妹妹，觉得我去乡村是神经病。我猜她是有一种压力，因为我们是双胞胎，我小时候比她听话，学习也比她好，所以我是感受不到竞争压力的，但我妹妹可能一直都有。当时她是学生会主席，就一直说我很反动，如果我参加什么活动，她就会在家庭群里面转发，说你看姐姐又在干什么。

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阅读占领地铁，很中二的。我什么也没干，我妹就说，你看，姐以后是要来革我们的命的。我去小鹰计划的时候，她在家里发，“放任小孩成为白左小孩是不负责任的父母”之类的。我爸妈已经习惯了。

我先是在云南一个做困境儿童服务的 NGO 待了三个月，条件非常非常艰苦，去了一个星期就尿路感染。因为当时云南狂下暴雨，然后我的内裤没办法晾在外面，而且那个房子也不能开窗，我住的那家爷爷跟我说，开窗老鼠就会进来，然后我就吓得要死。但是晚上还是会被老鼠吵醒。后来我就习惯了。我在那做的工作是非常基础的，就是去小朋友家里看经济条件，是不是符合（NGO 的）资助要求，然后去学校里帮忙。

尿路感染，我的天，我当时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当时发高烧，医生一直说我是感冒，我就说这不是，因为我腰疼得都直不起来了。我当时用 App 搜，想找一个互联网医生看病。最后要骑摩托车去镇上（看病），然后摩托车又没油了，我发着高烧，吹着冷风，我同事让我在下面走，他自己推着摩托车，我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不惨了。这种情况就很搞笑。

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6 岁之前我是小镇小孩，之后才去城里面上学，但云南的贫困程度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

当时小鹰计划就很愁。我当时是和一个上海小伙伴一起去的，上海小伙伴去了一周就受不了走了，剩我一个人。其实我还是开心的，但是条件太艰苦了，项目组就担心我会不会在那里崩溃。

小鹰计划有一年时间，中间我们见了一面。当时项目组说，我再给你找个点，你想不想来四川？我也想去很多地方，于是就去了雅安戴河村，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在戴河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因为那边也没有 NGO。当时四川大学在那里做类似于建筑保育的工作，其实把本科生送来看一看这里的民居是怎么设计的，一个月来一次。那些老师是这里的贵客，做什么工作，就是来一下，村长请他们吃饭，然后就走了。

我那时候就得自己在这个村里找点事情干。先是去了小学，我说我可以给小朋友上课，然后老师就说好好，你过来吧。现在想起来，我在四川是没有做什么正经事的，后来小朋友又想要看书，我就在朋友圈里让大家寄点书过来。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和小朋友玩，带小朋友去露营、上音乐课，就这样待了半年。

露营就是一起去山上。我们那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山，叫海子山，其实是个高山草甸，要爬两三个小时。我就带小朋友去玩，在上面睡一夜再下来。家长（主要是爷爷奶奶）竟然都挺放心的，真的让我带着一群小朋友去山顶上过夜了。小学三四年级，有 10 个人左右。还有一个小伙伴和我一起，背了两个帐篷，还把琴带上了，带了几本书。高山草甸上面有几户人家，是小朋友亲戚，小朋友就会去他们家吃饭，我和我的朋友生火煮泡面吃。

考研去了中山大学读社会工作。当时去了以后，我的老师说要做一些实践工作。当时 NGO 已经非常体制化了，我感觉它变成了一个做表工作。来一个人，你问他有什么问题，快速分类，然后做表。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当时确信，至少我在云南那几个月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再复制的，就没有什么可学的。

所以相当于玩了两年研究生，玩着玩着又可以去交换，又去台湾，在一个叫“妇女新知”的 NGO。我觉得那个机构很厉害，倡导工作做得特别好。

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在推行“积极同意入刑法”，就是他们想把关于性侵害的定罪原则改成同意原则，要获取同意才能发生性接触。

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开过好几场研讨会了，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整理他们的资料，看他们怎么组织讨论怎么跟其他议题的关注者合作的。性侵害的法律涉及到方方面面儿童、残障、职场……他们要跟很多人协作，不同的人目标是不一样，关心儿童的人希望所有的性侵犯都要被重罪；关心残障的人可能更关心残障群体的自主权……妇女新知要把这个局给攒起来，而且要让大家把这些话都说出来，围绕着同一个目标：不仅仅是修改法律，更重要的是，相关群体是否能了解我们的想法。

我觉得特别厉害，哪怕反对者说话都很有水平，也是做了研究的，我觉得是真诚的讨论。

回来以后（去妇联实习），（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当时去的是妇联底下的一个信息站，叫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是直接跟妇女合作的，处理性别相关的问题。我当时想知道我们福利系统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以前我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志愿者，跟体制没有打过交道，我在想如果我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身份，我的工作会怎么做？他们又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就去妇联了。

去了就是接电话。特别累。因为需要做文书，如果每个电话说 20 分钟的话，信息量太大了，有点承受不来。每个小时都有两三个电话。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到最后我已经特别特别麻木了。先看有没有死人，对，是不是要堕胎，有没有严重伤害，有没有涉及到儿童的，有没有涉及到残障，会先看一下。就像那种出轨的什么的，同情心已经调动不起来了。因为到那一步，大家诉求也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要不就是想离婚，但是想多要点钱，有极少部分的人是想要挽回的。到那个阶段大家都在谈钱。

电话设置会让你先选，到我们这里基本上就是本市人了，流动人口和本地人我觉得是一半一半。

做了 6 个月，最后确实受不了。3 到 4 个月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当时以为这是很专业的工作，但是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培训就直接上岗，过了一个月我就要开始培训别人。我跟一个老师说，我能不能走了，老师就说，你觉得这几个月你见到的不同类型的案多吗？我说，真的够多了。老师说，那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走了。

他作为一个老师，想法就是这样了。我的话，再干下去就要休息 10 年了，这辈子都干不了社工了。我就走了。

我觉得那种工作方法不会提供真正的答案，只不过因为有这个定位，不得不接这些电话。其实就是在磨损当事人，让当事人对这个流程彻底失望之后，自己想办法。我现在做的 NGO 就会和当事人做特别多的讨论，当事人想做哪一步我们都不会先去评判，对与错，是否可行。我们不直接提供建议，而是先沟通想法，如果我觉得当事人可能没有掌握足够多相关的信息，就会尽我所能提供，然后再让他自己去做决定。

疫情结束的时候，我没什么事情可干，就去北京找朋友，前一两个月都是住在朋友家里的。我感觉当时精神上已经很难跟自己相处了……我本来过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但是因为做一些活动被频繁骚扰，我当时有个特别大的恐慌，就是怕自己疯掉，就想尽一切办法维系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恨不得天天打坐，像吃药一样去运动，但感觉影响还是太大了。

其实到北京之后，我也还是在想这个问题。躺平我是支持的，但我觉得那种“躺平”不是我想要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或者本身也很有负担。我其实当时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有个朋友是做自然保护的，她叫我去奥森（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她玩，那也是她的工作地点。然后我就去了，当时她就拿了一个望远镜出来，跟我说，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大斑啄木鸟。就把望远镜给我。

你有用过望远镜吗？我是第一次。望远镜很神奇，它不是让你近一点看一个东西，是完全让你进入另一个世界。因为找不到鸟，我当时发现树都很好看，后来发现鸟了。鸟好漂亮，太漂亮了！我感觉我的思绪都被抽空了，哪怕在去奥森的时候，我还迟到了一两个小时，其实我脑子里都在想那些很糟糕的念头。那个时候可能每天都是这样。但是在看见小鸟的瞬间我是平静的。

后来我朋友说，你来北京了要做点什么吗？因为我也做反家暴的工作，但是我当时真是不想讲那个，我就直接说，我要做观鸟的活动，周围没有人做这个，除了那些专业干这行的。然后我就在想要怎么进入观鸟活动，什么是那些专业搞这行的朋友还没有开展的，我就去看观鸟的历史，找了书来看。其实当时没有主动把观鸟跟女性社群联系在一起，没有想要去做一个跟女性主义特别挂钩的活动。

望远镜你随便搞一个 8 倍的就行了，10 倍的话手会有点抖，看到鸟的时候就看不太清。

鸟很神奇的。为什么春天对鸟很重要？就是因为小鸟在春天的时候经过北京，你就可以看到非洲的小鸟，可以看到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飞了几十公里的小鸟，那种感觉很神奇。

“出门散步去”和其他社群相比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相似的地方是大家都很想有一个社群，都会很努力地想要去维系这个社群。

不一样的地方是那种求知欲，还有大家对观鸟的热爱程度。我特别惊讶，有人第一次看了之后可以每周都去，看鸟的话要起很早的，夏天就更早了。我们群里面被各种各样的不同形态的小鸟塞满了，每次看我就觉得好放松，我不是不去再去谈女性的话题了，也不是不再关心女性的处境，但我真的需要这个地方，一个都是鸟的地方。

我现在是有安全感的，反正比我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好很多。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周围一有响声，比如说我没有点外卖，但是有人敲门，我就会把目之所及的电子产品全部都给格式化，其实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我还是非常紧张，想全部都删一遍。我的手机好像从去年开始就没有之前的记忆了，因为我不停地删东西。我甚至都不怎么拍照片，但现在就好很多了，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Q: 你最近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最近在看 Friends，因为要考雅思，但是我没有准备，然后我室友就说，她说 Friends 教会了中国一代人英语，要拜英语口语神的话，这就是对口神仙。她又拿了一个 Friends 的明信片叫我拜一拜。我说，好，如果我考过了的话我就把 Friends 看完，还发了誓，结果就考过了，所以我现在就在看 Friends。但是其实很难说它有趣。我觉得 Friends 就跟《哈利·波特》一样，可能过了那个时期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进入了。所以我有一种在还愿的感觉。

Q: 最近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我申请到了一个奖学金，去读一个发展学的硕士。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政治经济学打底的、研究不平等的学科。就在想“散步”以后要咋办，有没有什么办法继续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地方。因为我特别怕“关系”，“散步”几乎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虽然很累，但是好处是我不用去想和其他人是什么权利关系。如果我走了，这个小组要怎么继续维系，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

Q: 想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A: 纪实摄影师梁莹菲接力，我 2015 年就认识她了，她一直都在思考“我得做点什么”，也是一位很有才华、很真诚、很勤奋的朋友。前几天看她的朋友圈说，“关于创作，别人总是问我有什么想法，但是其实我不是因为有什么想法，而是因为有很多痛苦。我很同意，感觉这是关于公共行动和创造里最纯粹的那一面。”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文内图片来自手心咖啡公众号



益活动背后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公益行业里千人千面，老曲扮演的是哪一种？[推荐他的梅若说](#)，这位公益人不仅乐观，还能创新，在眼下这环境里，让她很是佩服。

见面之后聊天，知道手心咖啡因为疫情期间房东收回租地，不得不从市中心迁出，在努力活下去。老曲没剩多少钱了。但他眼下不为钱发愁。他说让他比较费心思的是一个问题：在“共同富裕”作为国家战略被提出之后，像他这样的第三部门从业者到底该怎么做？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正当性需要重新定义，做事的方法当然也是。大部分人都感受到挫败甚至绝望。这一点在老曲身上倒不明显。他只是困惑于很多问题。有些关于自己，比如自己的公益创业是否切实可行，如何应对市场竞争；更多关于社会，他正在面临一个怎样的社会，比如自己女儿这样的二次元年轻人，应该怎样理解她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应对世界的角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是他自我发展的一种方式。这么多年，也正是探索欲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让老曲有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乐观的。

以下是老曲的自述，他从大学讲起，一直讲到他对当下社会的担忧：

我 1973 年出生，哈尔滨的一个小镇青年。读了复旦大学法律系，主要是报志愿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女生考全省第一。每一次她都是第一名，我第二名，她每一次都比我强。后来她报了北大，我就说我不去，我去复旦。就是这么个原因。当时也不知道北大和复旦有什么区别。

毕业之后在一个很大的新加坡房产商，叫凯德置地，做法律和公司事务部经理。后来我想去做律师，自己干那种，然后就离开了，那时候大概 30 岁。然后就自己拉客户、跑业务、打官司什么的。

律师确实挺挣钱的。在上海那段时间，我其实也没有那么专心，因为我在 2000 年就开始接触到公益了，后来有很大的兴趣在公益上，即使是那样的，每年也还挺好的，买房养家都不是问题。

我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内心没有办法平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的内心可以平静的话，一边做律师一边做公益，既可以赚钱又可以怎么着，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干。我不行。

赚钱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挺努力的。在外企，我每年都拿全公司最高年终奖，我可以做到除了春节全年无休，那时候确实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去解决，但是人觉得很空虚，很恐惧，内心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感动，也没有柔软的东西——当然可能只有我是这样，其他人都没什么——我躺在床上，看着黑洞洞的房间，感受其实很恐惧：人活着，是不是一个把自己过度工具化的过程？

然后我有一个机会去社区弱势群体做法律咨询。当时内心感觉就特别好，特别的自在，也不用考虑钱，就是纯粹想帮别人。从本质上来说，我找到了觉得自己有价值感的地方。

当时我的价值感很多是来源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理解，刚刚开始参与到公益的时候，听一些教授在讲“三个部门”理论：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共同治理，形成一种善的社会局面。所以我做的事情看起来没干什么，只是在社区里干这干那，跟着居民搞各种事情，但它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发展，是构建第三部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普通的社区服务升华成了对社会的贡献。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我内心充盈了价值感。

后来作为合伙人加入了律师事务所，等于是做生意，也是一个非常工具化自我的状态，加班加到两三点，也很空虚。并且那个年代司法体系不完善，很多时候一件事怎么操作，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凭关系。我为了赚钱，就顺应着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内心总是觉得不满足。

专栏

057 曲栋 现在聊完了， 你能理解我的“乐观”吗？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人，对自我和所处的世界皆有一种旁观者态度，
但也不缺投身其中的热情。

我在大众点评里搜“手心咖啡”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蔡依林的粉丝。在我去的前几天，蔡依林来过，还在演唱会上推介了这家公益咖啡馆，这让手心咖啡“一天至少七八十个人”。放在别的咖啡馆，这不算显著业绩，但老曲已经觉得挺不错。平时这里除了公益机构和学校带人来参观学习，散客很少。地理位置也是个问题。作为一个不熟悉广州的人，我不知道“手心咖啡”算不算在郊区，只能说它所在的创意园区出去不远，就是一个高速收费口。

我在手心咖啡等老曲。接力访问已经做完，但我想看一看视障店员做咖啡是怎样的状态。收银台有提示，“点单的时候需要发出一点声音，否则店员很可能不知道你的到来”。除此之外这个店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宽敞、明亮，提供意式咖啡、手冲和小蛋糕。

我要了一杯热美式。点单的时候如果没留意店员停留在某一点的目光，几乎意识不到她是视障人士。后来老曲说，她的视力相当于要把普通人看到的字号放大 80 倍。日常会看到物体的轮廓，但无法看到细节。另一位男生负责做咖啡。吧台后就这两位。男生后来休工出门，带着一条拉布拉多导盲犬。

咖啡很不错。用时略长。这也是手心的特点。视障人士可以熟练操作咖啡，但不会那么快。除了我之外，店里还有一个在自习的客人，一位视力健全的店员。“蔡依林效应”没过，需要这样的帮手来收拾咖啡馆。

老曲比我晚一点到，条纹 Polo 衫，夹着一个包，看着挺东北。语音聊天的时候，我就想搞清楚他为什么会从一个富裕的企业律师变成公益创业者，以及他朋友圈里那些公

有老律师就说，你不要想那么多，钱赚到了就好了，但是我的内心就无法平静，所以就产生了各种冲突。冲突里面还包括对自己的否定。比如说某个官司输了，明明我觉得可以帮到当事人，当事人也挺有道理的，结果输了。我就会觉得我有哪个失误被别人抓住，是我不行，然后不开心。与此同时，公益那边反而让我觉得越做越开心，于是我就很投入。早期除了社区服务之外，我开始做一些志愿者培训、组织联络、也参加讨论。那个时候公益组织刚刚发展，像我这样的人会成为骨干，有很多机会出去考察学习——现在当然都没有了——当时每年都出国，特别开心。

2008年，我决心不做律师了。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人生要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到底做什么？内心的答案是要做公益，不想做律师，因为律师除了把钱装兜里的时候特别开心，其他就没什么了。那个时候正好广州以中山大学为体系的组织邀请我去工作。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处理了所有客户和尾款，离开了上海。

本质上我就是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想在内心反复审判自己。当时内心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就是我做另外一个事情也能行。我觉得我去做公益，肯定也是一个杰出的人，包括后来做残障，我心想残障我也会做得很好。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有孩子——后来离婚了——当时家人还同意我去广州，因为公益当时还有很好的前景，我还有资源，还被看重。当时并没有觉得自己会去做一个很惨的事，确实没有怎么太在乎钱。

适应广州简朴的生活，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回去上海的时候，我会发现上海确实比广州要发达，经济条件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上海内心老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既可以回忆起多年的青春，但同时非常不舒服，我还说不太清楚。总体来说，在我的认知里面，上海有很大的一种压力。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作为、多少钱、多少成绩才能怎么样。比如在离开律师行业以后挺长一段时间，我要见以前的同学，都要让自己显得还不错。不过同学大概也让我知道了他们有多少钱，我就看到了差距。他们都是几千万身价，甚至上亿，都是一个寝室的人……现在我回去偶尔也会跟他们吃顿饭，都是上万这样的饭局……简直是不知道多少倍的差距。我在广州吃个七八百块都已经挺奢侈了。

广州让我觉得比较踏实。去年在广州，几个复旦91级同学要聚一下，都是我们当时那栋楼一楼的。我出门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穿什么衣服。我平时穿得很随便，看起来肯定是要档次很低的那种，但见同学了是不是要稍微找找。后来还是随随便便就去了，结果一见到这些广州的同学，也都穿得随随便便，觉得特别好，感觉很放松。但是在上海就不行了，上海这种场合就得稍微讲究一下。

我刚开始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是那种公益行业里面资源很多的人。这边有中大的体系，不用我筹资金，然后做的事情有辐射面，我又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就带着团队去做了很多他们原来做不到的事情。反正我在这个圈里面也小有名气。

但是现在去看当时的我，我肯定不怎么喜欢。就是我的确在推动公益的发展，还能把这种推动的理论思路讲得非常的清晰，还在连接各种各样的组织去做事，但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在这片土地上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我只想象过在别的土地上的样子，我原来以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以为这就足够了，但它跟我自己的内心没有真正的连接，所以当时我比较傲慢，比较自大，讲各种大道理，还喜欢到处讲话，特别让人烦。

曾经我们认为广州是中国社会转型前沿，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但是一夜之间都变了……我看到了其中的脆弱，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大环境的原因，但我觉得这个体系本身是脆弱的。不管从做事情的真正效果、资源情况，还是人的参与状况，都是比较脆弱的。当时我就觉得公益不能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然后我自己也爆发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家庭问题，自己的状态问题，所以我人生的一个巨大转变就发生在那几年里。

后来我想脚踏实地地去解决社会问题，就开始做残障人士公益支持，不想再做那些理论上说起来挺好的，但是比较抽象的东西。

我彻底改变了自己，就开始学习用直觉、用感受，不再用头脑去理解和认识外界的事情。我当时也是用了一个非常强硬的方法，就是坚决不用头脑，然后也不上去发言，也不再做什么思维导图，也去内观中心学习做内观、做觉知，去看灵性的书。我就想知道，如果生命经验可以流动的话，它到底怎么实现的？

其实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些个人成长工作坊，对身心灵有认识，不深，但是挺喜欢的。后来我从2012年开始，用其中的方法去帮一些边缘群体，包括罕见病、性少数群体、劳工、艾滋病患者、残障等等，就帮他们去做一些自我接纳和调整心态，虽然我不是很专业，但是因为没有人帮他们，大家都很喜欢我，找我做了很多年。我做得不深，所以它有什么用我说不上来，但是效果挺好。我印象里做跨性别群体的内心成

长，这个是最有挑战的。

然后我就开始做残障群体的赋能，就是支持他们的心态转变。刚开始想用传统模式，就是缺什么给什么，还有维权这种权力视角——要求政府必须做什么那种。这两个都是走不通的，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仰仗别人，还需要用强有力的方式去对付它，就是让对方必须服从你，然后你才能做事。这是没有出路的。过去很多都是这样，觉得对方错了，你必须要改，其实听说自己错了的那一方，是不愿意承认的。它会觉得自己也做了事，你不满意，你提出更新的方法啊？

所以我们后来以残障人士的就业为切入点，创新就业，我们没有推动他们去传统就业体系，就是一个工厂招多少人那种，那不是真正让人有尊严的过程。我学德鲁克的管理学的时候，理解人就要呈现价值，并让人受益，这才是成立的。那残障人士的价值是什么？一个是他们特有的觉知能力，第二个是他们经历了巨大困难成长起来的生命经验。这些怎么转化成别人能感知到的东西，这就很有挑战。

我现在说的都是好几年后的总结，刚开始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一堆东西，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都是在打坐冥想，还有听科幻小说。我把刘慈欣所有的科幻小说都听完了。也不怎么出去交流，因为别人会觉得你奇怪，都在说大环境怎么不好，你在说不管好不好要创新解决问题，就挺格格不入的。



在2020年的时候，我意识到要把社会问题变成新的商业。于是我们就开了咖啡馆。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背景。原本我觉得公益至上，只有公益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的限制……这些年我一直在找看破这个的方法，现在我觉得我是清楚的，

第一阶段，我们认为咖啡本身就不一样，因为盲人冲咖啡时候的专注，以及他们的身体觉察的程度和他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其实跟其他咖啡馆的咖啡师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很有价值的服务，让人们觉得我愿意接受这种体验，我喝惯了星巴克那种忙忙碌碌的三下两下帮你弄好的，我再去看看这种慢的，也许有独特的价值。

但是商业情景里，这个想法不成立，于是我们开始想咖啡师的这种对自我身体的觉知，以及对生命的接纳，对各种困难的突破，还可以被运用到什么场景里，还可以在哪里去成为发挥它重要的产品……这个过程现在正在进行，其实这个有点慢了，前面也耗了很多钱，主要因为疫情的问题，和咖啡行业本身的竞争。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有星巴克和瑞幸，现在遍地都是咖啡馆。

我们做事的核心还是在人身上，就是我希望人过得好。我现在还录一个“老曲有约”的音频，这个跟我自己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有吃有穿肯定是好的，但生命的成长更重要，这个是我自己体会到的。

创业把自己的钱都投进去了，那时候也筹不到款，咖啡馆也一直亏损，就投进去了。创业就是不断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想这是怎么回事，就这样走了过来。

现在公益圈状况不太好，很多组织都不见了，我们依然还在。很多人就开始重视我们的经验，所以就有了睿思培训。我现在开始讲公益和商业的融合。有很多人反馈说看到了希望，原来可以有这样一种做法。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人生已经进入50岁了，我就跟自己说，没有退休这种事情。服务他人确实没什么退休不退休的。不过我的同学好像已经组团退休了，在江苏的什么地方都买了别墅，在一起生活。我曾经问过他们，你们在一起干嘛？他们说就是打牌聊天什么的。

同学真的……大家18岁就在一起，以前内心经常会自问，如果不做这个，或者我做这个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应该做那个？同学能够激发我这些问题，其他没什么。现在看，大家明显是不同的人生了。

50岁以后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残障这一类的弱势群体，他们身上特别的价值，尤

其是生命经验所蕴含的价值，如何通过一种商业化的方式被其他人接收到。这些弱势群体贡献给这个世界的能量，可以养活他们自己，也能让其他人通过这些面对各自的生命挑战。

我就是在解决各种问题，这是我的使命，所以没有什么是特别乐观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悲观……互联网发生各种集体性事件以后，我也有一个理解，在互联网时代，很多东西已经都走形了。如果说中国在转型，我们要去向哪里，我觉得要真正关心的是人生命本身的问题。

另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变化，就是政府提出“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也就是政府开始承担起促进“公平”的责任。而一承担就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有三个部门规划的基础逻辑。原本是政府和企业不管公平，然后需要有人来管，所以大家都要支持一个去管这件事情的人，这就是第三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政府带动企业都在考虑公平问题的时候，第三部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到底它要发挥什么作用？这些才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变革。

包括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品出来以后整个世界的变化。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可能会真的有一天活成一种宠物或者奴隶的状态。好不容易有了一辈子做人，却有各种不开心，各种内心冲突，各种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就觉得自己白活了，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我自己感知到我的使命，就是通过残障或者其他弱势群体，让他们的能量去帮更多的人，能帮到谁就帮到谁。

我想做的就是让他们的成长成为一种服务——不管是对身体的觉知，还是他们内在的成长。我们不想门槛很高，成长了还得去进入到现有的体系里，要符合这个那个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就是可以贡献价值的人。不想是这样。我们希望自己设定一个模式，现在还没解决好，这是很理想的状态。

Q: 最近你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最近这一期睿思训练营培训里面，我留了一个作业是“100 天收入一万块钱”。睿思是给公益组织骨干做的培训班，一年三期，现在是第二期。作业规则就是把他们擅长的、喜欢的、想做的事情变成产品，成为可以交易的、人家愿意买的东西。大家很兴奋。但我还没想好这 100 天里怎么支持他们。比如说信息支持、心态调整等等。

Q: 最近试图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A: 手心咖啡怎么变成一个比较赚钱的企业。比如移动咖啡亭可以到处去，在广州各种地方可以给人冲咖啡，实现盈利和进一步发展。

Q: 你想提名谁来接力？

A: 丸仔。他是一个特别活在当下的人，也是彻底尊重他人的人，我想听听他内心是怎么想的。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一，2023.07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